



第六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23(c)

消除贫穷和其他发展问题：妇女参与发展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

秘书长的报告

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着重讨论影响了妇女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新增发展问题，每五年向大会第二委员会提交一次。本报告是第七次《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大会在其第 64/217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更新《世界概览》，供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审议。这份《世界概览》的主题是“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它显示了性别平等为何必需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并为迈向经济、社会和环境上可持续的未来建议了具体政策行动，而妇女和女童、男子和男童都能在其中享有他们的人权。

* A/69/150。



目录

	页次
一.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的内容.....	5
A. 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协同增效和紧张关系.....	6
B. 这份《世界概览》提供的信息.....	7
二. 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	10
A. 导言.....	10
B. 具有挑战和机会的时刻.....	12
1. 不可持续发展和性别不平等的格局.....	13
2. 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	14
方框一：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性别平等.....	15
C. 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和概念.....	17
D. 在回顾中前进：从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汲取经验.....	18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三项重要政策辩论.....	19
E. 迈向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对政策行动的影响.....	22
1. 突出社会可持续性.....	22
2. 紧张关系和折中取舍.....	23
3. 问责制和延长的社会契约.....	23
4. 作出决策的准则.....	26
三. 绿色经济、性别平等和照护工作.....	26
A. 导言.....	26
B. 更加广泛的发展和政策背景.....	27
1. 经济和社会政策.....	28
2. 不平等和经济不可持续性.....	30
C. 探索他种办法：绿色经济和性别平等.....	31
1. 绿色经济.....	32
2. 妇女和绿色工作.....	33
D. 对不可持续性的他种应对办法：对公共商品和照护经济的投资.....	36
E. 扩大绿色经济纲领.....	41

四. 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	42
A. 导言	42
B. 粮食不安全状况：最近的趋势	44
1. 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况持续存在	44
2. 查明粮食不安全	45
方框二：关于粮食安全的数据：主要障碍	46
C. 粮食安全的结构性制约和决定性因素	47
1. 粮食充裕的悖论	47
2. 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	48
(a) 性别平等、权利和能力	48
(b) 农村生计和以性别划分的制约结构	49
D. 新出现的挑战：全球粮食体系	52
方框三：“圈地”造成的性别效应	55
E. 国家为保障食物权作出的努力	56
五. 人口、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	59
A. 导言	59
B. 人口动态	61
1. 目前的人口状况	61
2. 人口动态	62
3. 人口结构转型和计划生育	63
C. 人口和环境：政策和后果	64
1. 对人口、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问题的观点	65
2. 消费和生产格局	67
3. 减少生育率和“失踪妇女”	68
D. 扩大人口纲领	69
六. 对促进两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投资.....	70
A. 导言	70
B. 评估对性别平等作出的变革性投资	71
1. 评估投资风险	71

2. 评估投资的结果	72
C. 对促进两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投资的类别.....	74
1. 水	75
2. 卫生	76
3. 炉灶	79
4. 电力	81
D. 投资的机构背景	83
E. 为投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	85
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87
参考材料	93

一.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的内容

1. 建造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实现性别平等这两项同时存在的挑战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紧迫。在世界迈向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之时，这份《世界概览》不仅表明为何这两项挑战每项都那么重要，而且为何它们必须一起得到解决——以充分实现妇女和女童的人权以及帮助各国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2. 生产、消费和分配的主要格局都朝向极度不可持续的方向(见 [A/CONF.216/PC/7](#))。人类已经成为推动地球系统进程的主要动力并且过度开采自然资源、丧失主要生境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污染大地、海洋和大气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科学上的认识正在厘清当人类行为接近或超过所谓的“地球承载极限”时，气候变化和丧失基本生态系统服务等这些威胁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构成的巨大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 年；Rockström 等人，2009 年)。人类与环境的互动正在使人从洪水、干旱以及遭到破坏的城乡和生计感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而许多人和许多地方都已经遭到粮食、能源、环境和金融危机的交织运作造成的苦难。这些不可持续的格局加剧了今天的贫穷和不平等——特别是对他们的福祉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并对后世后代造成严峻威胁(Unmüßig、Sachs 和 Fatheuer，2012 年)。

3. 不可持续的发展格局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因为妇女和女童时常不成比例地受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压力的影响(Neumayer 和 Plümper，2007 年)。不可持续性和性别不平等两者的原因和背后的驱动力密切交织在一起。两者都是对监管不足及市场导向的特定增长形式给予支持的发展模式以及妇女与男子之间长期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造成的(Wichterich，2012 年)。这些发展模式依靠的是性别不平等、剥削妇女劳动力和无酬照护工作，此外，它还会加剧这些现象。这种推动发展的模式还造成环境问题，因为市场参与者都借助过分开采自然资源和污染气候、土壤和海洋的方式寻求和取得利润。这种市场导向的作法正朝着社会和生态不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并最终造成经济的不可持续性，破坏未来取得进展的条件。

4. 当前日益增多的国际辩论表明，需要在更加可持续的道路上推动经济和社会向前，不论是通过避免发生危机和灾难或借助“绿色经济”取得繁荣的办法。至今采取的政策并未始终强调要实现人权就必须指导这些努力或优先需要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这些辩论中，时常没有论及利弊得失的问题。提出可持续性的方式时常似乎能够明确作出政策解决办法，然而却有许多进退两难之处：例如，对不同低碳能源政策的供资问题；土地用于生产粮食或生物燃料的优先次序问题；和保护森林以减轻全球气候变化或满足本地人民生活需要之间的问题等等。在许多情况下，旨在促进可持续性或“绿色经济”目标的政策方针能破坏妇女的权利

和实现性别平等。解决这种进退两难的办法对谁得谁失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各个社会团体以及地方、国家和全球利益。

5. 然而，这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刻。全世界有许多例子显示确实存在他种发展途径，在迈向可持续性时，也可达成性别平等。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能相互有力促进(Agarwal, 2002 年; Buckingham-Hatfield, 2002 年; Cela, Dankelman 和 Stern, 2013 年; Johnsson-Latham, 2007 年)。

A. 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协同增效和紧张关系

6. 近几十年来，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妇女权利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认。这项认识见于一些国际规范和协议，包括 1992 年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¹ 的原则 20，其中指出，妇女的充分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随后，会员国在 1995 年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² 中，呼吁各国政府将性别关切问题和性别观点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方案。性别平等的中心作用还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2012 年通过的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自来》的成果文件中得到阐述，其中包括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在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中的重要性，并决心促进性别平等和推动妇女充分参与各级可持续发展政策、方案和决策(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7. 基于以下若干理由应将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第一，在道德和伦理上的必要性：达到性别平等和实现不同妇女群体的人权、尊严和能力是一个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的中心要求。第二，它对纠正加诸妇女和女童不成比例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压力使其无法享有她们的人权和发挥她们能在家庭及社区作出的重大作用至关重要。第三并且最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妇女的能动力和能力，促成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成果之间更好的协同增效作用。

8. 目前，越来越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在性别平等与经济、社会及环境可持续性之间有了协同增效作用。例如，当妇女发出更多声音和更加参与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时，公共资源就越有可能分配给人类发展优先项目，包括儿童保健、营养和提供就业机会(Chattopadhyay 和 Duflo, 2004 年)。确保妇女得到和控制农业资产及生产资源对达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计至关重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2011 年)。妇女的知识、能动力和集体行动是寻找、显示和建立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更可持续的方式用以管理本地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和生产及得到粮食和取得可持续的水、卫生和能源服务的核心。

¹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一。

²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9. 妇女的充分参与越来越被认为对作出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她们切实参与社区林业管理机构的工作对森林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都取得了积极成果(Agarwal, 2010年)。此外，性别平等的某些方面，例如女性教育和妇女就业份额等，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取决于增长战略的性质、经济结构、妇女就业的部门组成和劳动力市场的划分等各种因素(Kabeer 和 Natali, 2013年)。

10. 不过，尽管性别平等能对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产生催化作用，但反过来并不一定成真。因此，不能假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之间有简单的双赢关系。事实上，有些经济增长模式的先决条件是维持性别不平等，例如维持性别工资差距和加深性别歧视规范、价值观和体制(Seguino, 2000年；Kabeer 和 Natali, 2013年)。此外，由于各国政府和捐助机构越来越将妇女作为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推动力；她们作为小农和作为可持续粮食生产的主力；和通过限制她们的生殖权利，将妇女作为解决人口—环境问题的办法；这有可能加深性别成规定型观念和性别不平等。

11. 将妇女作为“可持续性救星”看待的政策措施借鉴和加强了妇女在家庭、社区和环境中的作用的成规定型观念。这样的政策办法时常增加了妇女已经沉重不堪的无酬工作，而没有赋予她们权利、资源和惠益。性别关系中的权力不均情况决定了妇女的行动和工作能否转化为实现她们的权利和能力。尽管妇女的参与至关重要，但妇女参与实现可持续性的政策制定工作并不会自动增进性别平等，特别是在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基础维持不变的情况下。

12. 不过，有许多他种办法可同时促进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有些办法根植于妇女和男子每日取得、控制、使用和管理自然资源以维持生计和福祉的作法。例如，在亚马逊流域进行的国家和社区联合举措具有保护森林多样性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力，而同时为妇女和男子提供当地可持续的生计(Rival, 2012年)。其他办法显现于各种运动和集体之中，其中许多都由妇女领导，以建立粮食和资源主权以及可持续的社区和城市。例如在南亚，一个基层妇女领袖组成的网络正致力于加强她们社区减少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和脆弱性的能力和建立一种复原文化。³

B. 这份《世界概览》提供的信息

13. 这份《世界概览》旨在阐述性别平等为何和如何必须居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以及为达到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所需采取的行动。这份报告的总体信息是：

(a) 确认任何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必须包括对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妇女在其概念和实施中的权利作出明确承诺；

³ 见 <http://huairou.org/south-asian-network-grassroots-womens-leaders-community-resilience-formally-launched-kathmandu-nepal> (2014年6月26日查阅)。

(b) 达到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以及了解可持续性的三个层面之间以及与性别平等结合之间必然存在的紧张关系和折中取舍；

(c) 为达成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进行取舍和谈判政策困难需要采用包容性的审议进程和方法，以监测排斥和取舍情况。民间社会和妇女组织、社区及关心的个人积极参与、发挥领导和创造力是进行这些审议的关键所在。

14. 这份概览并不打算阐述与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各式各样重要和必要的问题。相反，它探讨一组对妇女生活至为关键、对达到性别平等具有战略意义以及与可持续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密切交织的议题：增长模式、创造就业和提供“公共商品”；⁴ 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耗；人口和妇女身体完整性；水、卫生和能源。因此，各章在顾及性别平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总框架内，讨论妇女可持续生计的不同实质要素。

15. 第二章着重说明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对决策的意义：确保当前和未来人类福祉和尊严、生态完整性、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认识到各国政府需要评估复杂的政策选项，其中必然涉及到紧张情况和折中取舍，这份概览为决策人员提出准则，使其能够用以评价达成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政策。

16. 其后每章都显示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与性别不平等如何相互促进加强。关于绿色经济、性别平等和照护的第三章阐述增长模式与不平等加剧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指出女性劳工由于低工资和依赖大量无酬照护工作遭到剥削的情况。

17. 关于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的第四章表明全球经济与市场中的系统性动态如何与性别关系发生交叉作用，从而对家庭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产生不良后果。然而，占有主导地位的观点——自 1980 年代以来在许多国际思维和政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生产者观点——使食物权的问题边缘化。本章显示世界谷物市场的波动、低工资和艰难的生计正与环绕资源的权利、取得和控制的性别制约发生互动。气候变化以及为出口作物和生物燃料进行大规模土地投资的影响更增加了这些制约。女性农民处于为其家庭生产粮食和维持能够生产这种粮食的生态的中心位置，但她们却必须在日益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这项工作。

18. 关于人口、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问题的第五章显示将环境退化和生态威胁归咎于日益增多的人口的政策观点继续发挥主导——和事实上，延续了这种观点。这些观点转移了对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并从而支持这种模式——及不平等状况的注意，它们产生的环境问题实际上远大于众多的人数。本章讨论

⁴ 公共商品被认为是具有不能被轻易限于单一“买方”和使用者的好处的惠益；公共商品使其他人受惠。它们是人们共同而非单独享用的商品，例如没有疟疾的环境、清洁空气、教育、卫生等。

了狭隘的人口政策的危险，这些政策将妇女生育视为造成环境退化的原因及解决环境退化的办法，可以加以强制解决和进行处罚，而不需支持——并时常损及——妇女的权利、尊严和对其身体的控制。

19. 每章还都说明朝可持续方向——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迈进的他种方法都是可行的。它们得到他种观点和价值观的支撑，这些观点和价值观不仅强调利润和增长，也强调可持续性、性别平等、包容性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它们涉及公共、私有和民间社会机构的不同组合，需要国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国家作为责任承担者应在下列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兑现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提供适当的政策内涵、设定标准和监管资源使用、要求私有部门负起责任和特别重要的是为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提供公共服务和投资。社会运动是推动和要求采用这种替代办法和形成维持这些办法的集体行动组成的关键。

20. 因此，关于有酬工作和公共产品(见第三章)，强调了推动和建立绿色经济和绿色变革的公共和私有联盟。在这方面，正在出现联系低碳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筹资、技术和投资并尊重生态限度的增长格局的行进方法。在现有做法和政策提案的基础上，本章着重指出基于性别平等对捡拾和回收废物等环境服务工人以及与健康照护有关的个人服务提供者给予更好的收入和工作条件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好处和惠益。关于粮食(见第四章)，这份概览强调对保障食物权的强力关注。这一关注包括对小农特别是女性小农的农作给予政策和公共支持，使他们能够进行无害生态的耕作、维持土壤肥力和确保他们的生计。成功的例子时常结合了对本地生态状况、土壤和种子的知识、生产和供销合作社以及使贫穷农人能够得到适当投入的信贷给予支持。国家进行的干预，比如设定最低工资和监管价格，以及就出口补贴和维持储备粮以抵消价格波动等问题进行国际谈判，也都支持粮食的取得和食物权。

21. 关于进行投资以实现促进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章(见第六章)表明最穷困的妇女和女童能够得到满足其每日对水、卫生、清洁烹饪和电力所需产品和服务的权利的途径。这些投资对环境可持续性和对增进人的能力、尊严和健康都有巨大裨益。公共投资是进行这些举措的关键，但同样重要的是以创新的办法寻找适当技术并调整它们使其符合本地社会和生态状况。本地知识发挥的作用以及基层创新和行动证明也是在这方面的关键。所以，面对的挑战是公平扩大行动，而同时继续集中力量于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

22. 每一章都强调妇女的能动力是这些可持续发展途径中的许多途径的关键。在社会运动的前沿时常有抵制不可持续的模式和要求采取他种办法的呼声。它们的知识、创新、行动和能动力是在寻找、示范和建立管理本地生态、适应气候变化、生产和获得粮食以及得到可持续的适当饮用水、卫生和能源服务而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上更可持续的途径方面的关键。要使这些途径真正可以持续和要推动性别

平等以及提高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及能力，则生活和福祉受到影响的人必须通过社区团体、妇女组织和其他集体行动和参与形式参加决策进程和作出领导。

23. 这份概览最后就迈向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具体政策行动提出建议。鉴于决策人员运作的环境的多样性，这份世界概览除了提出观点之外，还列出三项准则，用以评估为达到可持续性采取的政策、方案和行动是否可能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不可持续性造成的代价中，可能承担不成比例的份额的边缘化群体的权利。这份世界概览的总体信息是抱持乐观和希望的信息，认为这个世界能够塑造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更可持续的未来，而妇女和女童、男子和男童都能在其中充分享有他们的人权。

二. 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

A. 导言

24. 实现性别平等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明确列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文件：

我们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对于可持续发展和我们共同的未来很重要。我们再次承诺确保妇女的平等权利以及平等参与和领导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的机会。……我们强调，妇女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认识到妇女的领导作用，决心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确保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各级可持续发展政策工作、方案和决策(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31 段和第 45 段)。

25. 这份概览说明何种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能作为全球现阶段的“各级政策工作、方案和决策”。在这项工作中，它对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全球状况进行了反思，在此期间，赤贫和饥饿、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和气候变化等大都是当前经济模式和作法造成的后果对实现妇女权利构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并产生了进一步破坏其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可持续性的风险。从这份概览讨论的许多问题发现——经济增长和工作；人口和生殖；粮食和农业；水、卫生和能源——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不但会加深性别不平等，也证明无法持续。不过，这份概览的总体信息是有希望的信息，认为有可能通过各个国家、妇女和男子、民间社会组织、私有部门和全球机构参与其中的有力民主商议的办法，构建他种发展模式，其中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能有力地得到相互促进。

26. 关于妇女和女童的人权以及性别平等的国际规范和标准为进行加强妇女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所采取的行动提供了稳固基础。基于性别的歧视在所有主要国际人权文书中都受到禁止。《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⁵ 规定，

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妇女的充分发展并提高其地位。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通过的各项公约持续增进妇女的工作权和在工作地点的权利，包括最近促进家政工人的权利。

27. 1990 年代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会议提高了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国际规范和协议、增强了妇女权能和推动了妇女和女童的人权。

28. 1992 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对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框架提供了一个划时代的论坛。它启动了《二十一世纪议程》，这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也推动了三项全球环境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⁶ 《生物多样性公约》⁷ 和《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⁸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¹ 的原则 20 指出，妇女的充分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公约》认识到，将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结合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不仅在本质上重要，而且也能提高干预措施、方案和资源的效用。

29. 1993 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权会议，它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确认“妇女和女童的人权是普遍人权的一个不可剥夺、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A/CONF.157/24 (Part I)，第三章)。

30. 1994 年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⁹ 标志着翻开人口、人权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篇章。会议成果是将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作为全球优先工作并强调个人的福祉是人口和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的焦点。《行动纲领》指出一些推动性别平等的关键领域，包括普遍获享计划生育服务、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并享有生殖权利；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机会；和妇女与男子平等共担育儿和家务责任。

31. 1995 年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² 为妇女人权、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设定了一个划时代的全球议程。该《宣言》指出：“提高妇女地位和实现男女平等是人权问题和社会正义的条件，……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公正和发达的社会的唯一途径”。《行动纲要》呼吁各国政府将性别关切问题和性别观点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方案。即将对《北京行动纲要》执行情况进行 20 年全球审查和评估，这提供了一个对加快行动重新作出承诺的重要机会。

⁶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⁷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⁸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⁹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4 年 9 月 5 日至 13 日，开罗》(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5.XIII.18)，第一章，决议 1，附件。

32. 1996 年通过的《关于世界粮食安全的罗马宣言》¹⁰ 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敦促各国政府“确保一种以男女全面平等参与为基础、最有利于实现所有人可持续粮食安全、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为消除贫困并为持久和平创造最佳条件”。

33. 2000 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根据 1990 年代各次主要首脑会议和世界大会的成果再接再厉。在《千年宣言》中，会员国重申对国际关系极为重要的六大基本原则，它们是自由、平等、团结、包容、尊重自然和分担责任，并呼吁在各个关键领域采取行动，包括发展和消除贫穷、和平与安全以及民主和人权等领域。各国政府还重申，它们决心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以此作为战胜贫穷、饥饿和疾病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大会第 55/2 号决议)。

34. 最近，妇女参与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决策的重要性在全球层面受到确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在 2012 年通过一项决定，提高参加缔约方大会各届会议的机构和代表团的性别平衡的目标和将性别问题及气候变化作为缔约方大会议程的常设项目(见 FCCC/CP/2012/8/ADD.3，第 23/CP.18 号决定)。

35. 大会最近通过的各项决议进一步重申性别平等对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改善农村地区妇女的境况的第 68/139 号决议中，大会敦促会员国将性别考虑因素纳入自然资源治理工作的主流和在管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时借助妇女的参与和影响力。该决议还呼吁各国政府支持向小农妇女提供支持，为她们获取推广和金融服务、农业投入和土地、水净化和灌溉服务、市场和创新技术提供便利。在同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第 68/227 决议中，大会鼓励各国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平等享有充分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的机会。

36. 同样，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商定的结论也推展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框架。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敦促各国政府促进男女作为推动者和受益者充分和平等地参加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见 E/2014/27)。委员会还强调各国政府需要重视、减少和重新分配无酬照护工作，为此优先推行社会保护政策，提供便于获得、负担得起的社会服务和发展基础设施，包括提供对环境无害、节水和节能的技术。

B. 具有挑战 and 机会的时刻

37. 目前越来越清楚的是，主要发展和增长格局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都不可持续(A/CONF.216/PC/7)。这些格局已经导致越来越艰难的生计，致使 12 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联合国，2013 年 a)并有更多人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和社会保障。目前

¹⁰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报告，1996 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WFS96/REP)，第一部分，附录。

的增长格局已经在世界各国造成了财富、收入和能力日益不均的状况(联合国, 2013 年 b;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2013 年 a)虽然一些收入日益上升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赶上发达国家, 但后者的收入依然比这些“趋近国家”的收入高出许多。高收入发达国家最贫穷的 5% 人口似比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富有。收入依然“取决于国籍和地点”(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发所), 2012 年 a)。在这种背景下, 横跨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长期四处存在。

38. 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地球系统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并显示于自然资源的耗竭和退化; 关键生态系统、生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土壤、海洋和大气遭到污染; 和气候变化, 即在人类活动趋近或超过被人认为的“地球承载极限”时随之产生的严峻和不可预测的天气状况(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3 年; Rockström 和其他人, 2009 年)。近年来, 这些进程已经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这反映在洪水、干旱、遭到破坏的城乡景观和生计上——使许多人和许多地方都遭到粮食、气候和金融危机交织合成的磨难。不可持续性的这些危机有可能影响到所有人, 并为今世后代带来深远的风险, 这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1987 年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已有说明(A/42/427, 附件)。

1. 不可持续发展和性别不平等的格局

39. 不可持续性和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和后果密切交织在一起, 并根植于主导的经济模式(Fukuda-Parr、Heintz 和 Seguino, 2013 年)。这些经济模式涉及生产和金融活动的经济自由化和集中, 以期达到短期利润; 无限度的物质消费; 无与伦比的军力扩张; 和公共货物和服务的私有化——并以牺牲国家监管和重新分配为代价。这些进程已经在许多地方造成照护危机, 这意味着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维持、照顾和教育自身及今世后代的能力的瓦解, 损及人民的权利和尊严(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 2014 年)。

40.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许多国家已经生根, 并已在世界各地产生严重影响, 这种状况突出了自由化和金融化的市场模式固有的风险和脆弱性。这些风险和脆弱性破坏了即使按照其自行方式进行的市场模式的可行性。经济增长的成果也一直分配不均。过去 30 年间, 各个国家和区域之间及其内部的经济差距都已扩大。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 1% 人约占世界资产的 40%, 而比较贫穷的半数人仅占全球资产的 1%(开发署, 2013 年 a)。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包括亚洲、南非和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也已看到在不平等方面快速上升。不平等本身就威胁到经济可持续性, 助长动荡和冲突并破坏稳定, 使经济增长所需的运作空间和消费需求消失殆尽(Stiglitz, 2012 年)。

41. 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不仅在经济上不可持续, 而且在社会和环境上也无法持续, 使性别和其他不平等状况长期存在并损害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劳工组织, 2012 年; A/CONF.216/PC/7)。1999 年《世界概览》指出, 工业和农业许

多领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已促进了女性劳动力的参与(A/54/227)。¹¹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和隔离以及对这些市场监管力度不足，已使妇女限于承担低薪和工作条件低劣及难以得到社会保护的工作。这些状况更加强了妇女作为家庭中次要收入的地位(Chen 和其他人，2005 年)

42. 此外，市场能够如常运作，因为它们依赖使家庭和社区得以持续的照顾儿童、病人和老年人及主持家务等无酬工作(社发所，2010 年)。然而，没有这些时常看不见的无酬工作，经济增长不可能发生。占有主导地位的增长模式也依赖开采自然资源，似乎这些资源是取之不尽的。生产的环境成本，诸如污染、有毒废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等都转嫁给他人。这就是，“气候变化像其他环境问题一样，涉及外部因素：温室气体排放损及他人，但却对排放此种气体的人不产生任何成本”(Stern，2006 年)。这些发展模式创造了利润，却以环境为代价——不论是通过支持工业、能源和汽车业且同时产生温室气体和造成气候变化而被一直使用的化石燃料系统，或通过开垦土地和耗用水资源取得短期利益的工业化农业，都是如此。这些模式采用的做法无法持续，它们会破坏未来的生产和消费并威胁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和复原能力(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 年)。

43. 生态系统服务和生产能力的下降会使人们当今和未来世代的生计和健康处于危殆。在追求利润之时，生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转嫁给国家、个别家庭和地方社会，或转嫁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变化的成本和后果都呈现在不同的性别不平等形式之中。自然灾害，包括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难都对贫穷妇女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Neumayer 和 Plümper，2007 年)。妇女除了照顾家庭的负担之外，她们还时常承担解决与气候有关的冲击和压力或家庭和都市污染产生的健康问题。曾经公共拥有的土地、森林和水资源已越来越封闭、私有化或被商业投资“攫取”，因此，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特别是生计依赖于此的妇女——遭到边缘化和流离失所(White 和 White，2012 年；Levien，2012 年；粮农组织，2012 年)。在这项进程中，可持续生计、健康、权利和尊严——不论在农村或都市或在牧民、农业或林业社区之间——都受到了危害(Unmüßig，2014 年)。

2. 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

44. 日益增多的国际注意和辩论已经认识到确有需要更加可持续的道路上推动经济和社会向前，不论是通过避免发生危机和灾难或借助绿色经济取得繁荣的办法。在设法监管温室气体排放的尝试中，对碳排放量进行了计价并在世界市场进行交易。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认为受到破坏的生物多样性能经由在他处创建类似的生境得到补偿。对使用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收费，收得的费用用来补偿养护和

¹¹ 见《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全球概览：全球化、性别和工作》(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9.IV.8)。

保护水资源和森林等基本自然商品的社区和个人。这样的机制旨在将自然资源标定价格，使其能列入经济计算之中。不过，由于权力差异和未能参与决策和谈判，最后促成的交易和市场时常证明不符穷人和土著人民的利益，也不利于妇女和男子平等取得和享有自然资源(McAfee, 2012年; 社发所, 2012年b)(见方框一)这些机制通过对土地、水和绿色的“夺取”，更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Unmü ßig, 2014年; Fairhead、Leach 和 Scoones, 2012年; Mehta、Veldwisch 和 Franco, 2012年)。

45. 妇女的知识、能动力和集体行动是寻找、显示和建立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更可持续的方式用以管理本地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和生产及得到粮食和取得可持续的水、卫生和能源服务的核心。在决策和政治中，妇女越来越被认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她们切实参与社区林业管理机构的工作对森林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都取得了积极成果(Agarwal, 2010年)(见方框一)。因此，各国政府和捐助机构将妇女作为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动力；妇女作为小农，将妇女作为可持续生产粮食的主力；以及通过限制妇女的生殖权利，将妇女作为解决人口—环境问题的办法。事实上，多年来，从保护生物多样性、水和土壤到建立社会和环境上可持续的服务，将妇女狭隘地视为“可持续性救星”的观点至为明显。

方框一

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性别平等

森林景观清楚表明经济、社会和生态进程在形成改变之间的相互作用。植被和质量反映出生态与人的生计的动态互动。同样的森林和树木可能被不同的人由于其木材和收集的产品、其提供的阴凉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或其文化价值而有不同的价值。

森林长期受到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影响，对性别平等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从殖民时期以来，国家、捐助者主导和非政府组织推动了各种方案，以期达到从持续提供木材和非森林产品到保护水源和生物多样性等各式各样的目标。最新的干预措施集中于减轻气候变化。其目的是管理森林，以期保护和增加碳储量，将其作为抵消工业界产生的碳排放的手段。许多已经出现的机制，在不同程度上会同联合国关于降低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的合作方案（降排进程）、清洁发展机制、已验证的碳标准或没有得到认可的私人买卖，都已将森林作为在新出现的市场中交易的碳商品的来源重新评定价值。当这些森林碳项目在发挥作用时，它们一直试图满足全球可持续性的需要，但却时常排斥了本地森林使用者和破坏了他们的生计，造成他们一无所有（Corbera 和 Brown, 2008年; Corbera 和 Schroeder, 2010年）。其结果时常对本地使用者比对外来机构和全球行为者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对降排加+* 的最新研究认为，妇女并不是“降排+的关键利益攸关方或受益者，因为看不到她们

在森林部门的存在——这个部门大都是男性主导的部门”（妇女变革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组织和其他人，2013年）。

他种办法一直侧重于在社区进行联合森林管理。这种办法有可能促进和支持本地享有的权利和能力，包括妇女的权利和能力。然而，社区进行森林管理对性别平等产生差异相当大的不同结果。在许多情况下，森林管理中关于性别的利益和价值一直从属于男子和社区领导人主导的机构所推动的普遍化“社区”概念。不过，在尼泊尔和印度古吉拉特邦进行的工作显示，在联合森林管理进程中的性别平等与推动森林生态和促进性别平等的积极成果有关（Agarwal，2010年）。与性别有关的不平等（除非采取具体措施减轻这种不平等）时常与森林管理委员会内的合作程度低或未能合作有关。在妇女作为完全成员参与委员会的结构并拥有声音和权力时，随着更加公平地分享惠益和改善森林的可持续性，她们能够更公平地获得资源。

* 联合国关于降低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的合作方案（降排）旨在为森林储存的碳设定金融价值，以便使发展中国家减少林地排放和投资可持续发展的低碳途径提供经济刺激。降排+的范围不止防止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它还包括森林保护和持续管理以及增加森林碳储存。见 www.un-redd.org (2014年6月29日查阅)。

46. 然而，将妇女视为可持续性的救星这样的办法具有风险。这些办法所根据的假设是妇女的时间有“无限弹性”（Elson，1996年）和她们有无穷尽的资源能用于照顾人和环境，而不对妇女自身的健康和福祉以及竞相要求她们提供时间的状况给予应有考虑。基于妇女在家庭、社区和环境中的照护作用的成规定型假设制定的政策将妇女都作为没有变化的单一群体对待。它们忽略了形成妇女利益、知识、价值观、机会和能力等其他不平等的重要领域。性别关系中的权力不均状况——在行使权利、获得和控制资源、参与决策方面——决定了妇女的行动和工作是否能使她们受益，也就是增进她们的权利和能力、尊严和身体完整性。因此，妇女参与表面上针对可持续性的政策制定工作并不自动意味着取得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相反，加重妇女惠及社区和环境的工作可能会加深和恶化性别不平等状况。

47. 尽管决策人员在应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方面有一些不足之处，但这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刻。全世界有许多具体例子显示确实存在他种迈向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的途径。其中有些办法来自妇女和男子为维持他们的生计和增进他们的福祉在取得、控制、使用和管理森林、土壤、水和城市地貌方面的每日作法。

48. 妇女已经是并能成为迈向可持续性和绿色变革道路上的主力。然而，极其重要的是，这决不是指将环境保护工作添加到妇女无酬照护工作之中。它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她们的知识、权利、能力和身体完整性并确保她们的作用符合她们的权

利、对资源的控制和决策权力。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能相互有力促进，并且为政策行动制定这样的途径和具体领域正是这份《世界概览》的中心目标。

C. 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和概念

49. 这份概览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1987 年划时代的报告提出的定义一致：可持续发展应“能满足我们现今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的需求的能力” (A/42/427, 附件)。这项定义将可持续性的是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结合在一起。在促进目前进行的 2015 年后发展框架的审议的若干重要领域中，这份《世界概览》根据这项广泛的定义往前更进一步。它再次强调规范价值，如下所述，在人权和人的能力的框架内进行政策分析，并强调平等和正义这两个问题对后世后代都至为重要。在这两方面，性别平等是关键所在。

50. 因此，可持续发展是确保当前和未来人类福祉和尊严、生态完整性、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51. 这份概览对性别平等的理解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作出的说明，其中指出：“……仅仅采取正式法律或方案的方式不足以实现委员会解释为实际平等的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此外，《公约》要求男女起点平等，并通过创造有利于实现结果平等的环境赋予妇女权力” (见 A/59/38, 第一部分, 附件一, 一般性建议第 25 号)。因此，实质上或事实上的平等使妇女平等享有她们的权利，特别是关于结果和成果方面。为确保取得成果，各国不仅必须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包括结构性和历史性的歧视，建立正式或法律平等的基础，而且必须确保实现她们的各项权利。

52. 这种实质上的性别平等概念与能力框架产生强有力的结合，这种框架注意到人们必须具有“过他们认为值得过的生活——和有这种价值的理由”的实质性自由 (Sen, 1999 年)。人权和能力框架分享一种共同的动机，那就是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并且两者与具有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完全不同，这些经济模式强调扩大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为其主要目标 (Vizard、Fukuda-Parr 和 Elson, 2011 年)。基本能力遭到剥夺，这可能反映在过早死亡率、营养严重不良和普遍存在的文盲 (Sen, 1999 年)，继续是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状况，甚至在高度经济增长的国家也是如此。在权利和能力方面遭到的这种剥夺也能发生在妇女和女童身上，她们可能属于并不认为是贫穷家庭的成员或在总体水平上不认为遭到剥夺，这说明需要观察平均值和总体数据之后的真相。尽管从基本福祉中排除这种不平等极其重要，能力框架如同人权问题也注意到妇女能动力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以及因为“妇女积极能动力的有限作用严重困扰所有人的生活——男子和妇女，儿童和成人” (Sen, 1999 年)。人权和能力框架都强调妇女能动力和福祉成果之间的潜在协同增效作用及其权利的不可分割性。

53. 代际正义问题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可持续性定义的关键部分，它依然是今天的重要关切问题，特别是在危机后的局势中，因为在这种局势中，为年轻人和后代实现体面和可持续的生计的权利至为渺茫(联合国，2013年b)。代际正义问题要求当代采取的行动不会危害到未来世代能够过上充实生活的能力。Anand和Sen(2000年)指出：“不过，如果我们对未来世代——目前尚未出生的人——的福祉深表关切，却忽略今日穷人的困境，这是极其怪异的事”。这种关切致使对今日的不平等现象给予注意。今天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多重不平等现象的深度和广度都需要采取行动应因。不平等及经济活力和扶贫，能够触发经济危机，造成社会排斥和制造政治紧张和冲突。需要将解决不平等及实现人权和能力的再分配措施优先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议题。边缘化群体的参与和声音在各级决策中也必不可少(开发署，2013年a)。

D. 在回顾中前进：从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汲取经验

54. 自1970年代初期以来，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地的社会和环境运动主要都集中于经济发展对地方和土著人民的生计、权利和福祉造成的不利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阻挡建造大型水坝和伴随的迫迁以及防止埋设地雷和毁坏森林(Doyle, 2005年)。在喜马拉雅山区阻挡工业伐木的Chipko运动主要是一项保护森林和生计的运动。这项运动不断扩大，成为非暴力环境抗议和妇女参与其中的意义的著名象征。肯尼亚的绿化带运动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这个运动在1977年由旺加里·马塔伊建立，用于鼓励农村妇女集体为可持续生计和森林养护种植树木。

55. 在发达国家，这些运动主要都针对污染、资源耗竭和生境丧失以及军事化、核电和促进和平等问题。这些运动随同《寂静的春天》(Carson, 1962年)和《增长的极限：向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的困境的项目提交的报告》(Meadows和其他人, 1972年)等深具影响的出版物，使公众和政治人物日益关注到目前采用的经济模式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

56.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供了一个划时代的论坛，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能在其中辩论各种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地方21世纪议程”构想一种由下而上，通过地方政府、社区团体和妇女及男子推动的可持续性。它在世界各地推动了不计其数以社区为基础及国家—地方可持续发展联合项目和方案，其内容都环绕在可持续农业和土地使用、水、渔业、林业、野生动植物、城市环境等问题上。这些举措都包含了对地方资源权利和集体行动的重要确认。然而，许多举措都受制于对“社区”这个概念的过分单一看法，未能了解在社会及性别上相异的各种观点和优先次序(Dressler和其他人, 2010年；Leach、Mearns和Scoones, 1999年)，或只让妇女在项目管理委员会中担任微不足道的任务。在今日许多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中，仍然没有注意到性别不平等和其他各种不平等状况(Harcourt, 2012年)。

57. 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前的筹备工作中，一个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组成的大联盟，包括妇女环境和发展组织、妇女参与发展新时代新途径运动等，推动将性别关切问题纳入到新的可持续发展辩论中。妇女参与发展新时代新途径运动等团体要求将基于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Wiltshire, 1992年)。“21世纪妇女行动议程”作为各种团体的一个平台，批评当前的发展途径和自由市场想法，认为应支持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并需要将每日照护工作和资源正义联系在一起(Wichterich, 2012年)。然而，妇女团体和网络在全球妇女游说团中提出的许多替代办法，由于对当时经济效率、技术和市场的乐观看法，而没有得到重视。

58. 《21世纪议程》和从1992年以来的辩论认识到妇女在环境保护和减少贫穷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往往将妇女作为工具使用。妇女被认为是本地环境的主要使用者以及有效的管理者和保护者(例如，Dankelman和Davidson, 1988年; Rodda, 1991年)。基于妇女特别接近自然的这种假设，这支撑了妇女应被视为“可持续性救星”的看法。妇女与环境的连接关系——特别是在拾柴、担水和耕作等家庭和维生活动方面——时常都被认为一种自然和普遍的现象，而不被视为是特定社会和文化规范和期待的产品。随之进行的项目和政策时常调用和利用妇女的劳力、技能和知识，加重她们无酬的工作，而不过问她们是否有权、有声和有能力和控制项目的惠益。

59. 这些制定政策的历史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第一，决策人员应该避免对妇女和男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出广泛和成规定型的假设。相反，政策应该符合具体社会状况和两性权力关系。例如，妇女密切参与收集野生食物和森林产品的活动，这可能反映出劳力和土地保有权的关系以及她们没有能用来购买食物的收入，而不是反映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Rocheleau, 1988年; Agarwal, 1992年)。第二，政策应对各种妇女和男子团体如何运用土地、树木、水和其他资源的方式作出反应。第三，政策应特别注意到妇女保有土地和财产的权利以及在家庭和社区内对劳力、资源、产品和决定的控制。最后，政策应确保妇女公平参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和平等享有从这些项目得到的惠益，并积极解决根深蒂固的歧视性成规定型观念和不平等状况。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三项重要政策辩论

60. 在1992年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前的筹备工作中，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是在气候、粮食和金融危机范围内进行审议的议题。在这个范畴内，许多政策和商业行为者，以可持续发展的名义，通过绿色经济的概念，积极使经济增长与环境相互配合。社会运动在另一方面对气候变化、水的私有化、转基因生物、生物多样性和“圈地”等问题提出他种观点并赞同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正义问题密切连接在一起的发展途径。在这个背景下，关键行为者之间就气候变化、

“地球承载极限”和绿色经济等议题的辩论一直都在持续进行。以下阐明这些内容，并侧重于性别方面的问题。

61. 19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挑战之一。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及谈判进程的相对成功和挫败、在减轻具有深远影响的威胁方面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面临的困难以及必须适应与气候有关的冲击和压力的人的困境及应对战略都迫使公众作出反应。¹² 这种反应呈现出从地方到全球持续进行全面的和社会和环境运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性别平等问题着墨不多。尽管性别平等倡导者持续参与和作出努力，但随后为将两性平等问题纳入气候变化辩论的主流所作的努力却始终时有时无(妇女署和玛丽·鲁滨逊基金会——气候正义，2013年)。

62. 气候变化对两性平等问题的应对办法往往是将妇女视为气候影响的受害者或强化妇女作为维持其社区复原能力或采用低碳办法的自然照护者的这种成规定型观念和作用。尽管性别和阶级关系、权利和不平等产生了妇女和男子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差异，但也造就了在减轻和适应中作为代理者的机会(Agarwal, 2002年)。在歧视加深的状况中，妇女的积极参与和决策力量都受到限制，不过将妇女正式纳入低碳技术的技术委员会能作为这方面的起步，然而，要使妇女的参与发生效用和具有意义，则相关两性权力关系必须得到转变并对妇女的具体知识和能力给予注意和支持(Wong, 2009年; Otzelberger, 2011年)。

63. 在两性平等和气候变化的辩论中，许多辩论都集中在适应和地方层面的脆弱性问题。不久之前，在涉及大规模技术、市场举措和气候融资的讨论中，才对两性平等观点给予有限的注意(Schalatek, 2013年; 世界银行, 2011年)。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的承诺，比如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作出的各项承诺，并没有在国家适应政策或低碳发展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Otzelberger, 2011年)。这种效力不彰的整合正反映出并转而加强了采用简单化的解决办法的政策趋势，而不是作出重新引导气候不可持续性和性别不平等的途径所需的更具结构性的政治经济改变。

64. 目前第二个辩论环绕着“地球承载极限”这个概念。目前已经查明九个“地球承载极限”，这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系统中的生物物理进程。这些承载极限共同将地球维持在所谓的人类“安全运作空间”之内。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分析指出，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人类纪”。这是一个新纪元，人类活动在其中已经

¹² “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有差别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它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它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它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见原则7，《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年6月3日至14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和更正)，决议1，附件一。

成为许多地球系统进程的主导动力，包括气候、生物地球化学周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有人认为，可能造成灾难的临界点已经临近，这提供了新的紧迫感和权威力，认为增长和发展途径必须与维持这些临界点的生物圈能力重新结合 (Folke 和其他人，2011 年)。

65. 尽管这方面的科学仍在发展，但“地球承载极限”这个概念已在政策辩论中起了影响力。但这个概念也遭到批评，有些行为体将其视为是抵制增长和发展的概念，而另一些行为体指出，“地球承载极限”认为普遍存在的全球环境问题应比各式各样的地方性问题更优先得到处理，认同从上到下的干预办法，即以人及其生计为代价，保护环境。如这份《世界概览》就人口问题所显示的内容，有些“地球承载极限”的解释所指的即将到来的稀缺性和灾难的新观点能为限制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政策作出辩护。在“地球承载极限”之内的这种有控发展不应损害 Raworth(2012 年)提出的尊重人权的包容性发展，他的“圈饼”概念运用了“地球承载极限”这个圆圈，并加了一个“社会基础”的内圈。这些圆圈之间是人类“安全和公正运作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应开展可持续的发展途径(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2013 年)。Raworth 特别将性别平等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一个层面，但除此之外，关于“地球承载极限”概念的讨论和推动大都没有涉及两性平等问题。

66. 最后，绿色经济现在受到各国政府、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的热烈讨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在 2008 年启动了它的绿色经济倡议。它指出，绿色经济是一种会改善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的经济，同时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性；这种经济具有低碳、高效率使用资源和社会包容性(环境署，2011 年)。这种一般性定义将经济、社会和环境关切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在实践中，这份概览显示，有多种绿色经济思维。占有主导的绿色经济思维认为，应通过增进能源和资源效能及防止丧失生态系统服务的绿色商业投资和创新，继续和甚至加强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有人指称，到 2020 年，新出现的绿色技术经济每年将值 4.2 万亿美元。¹³ 其他论点强调应通过“自然资本”财务估值、为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碳及生物多样性信贷及抵消交易机制的方式，为保护环境采用基于市场的办法。

67. 其他人认为，由于各项环境制约，需要重新思考增长和市场战略。环境署和其他人(Fischer-Kowalski 和其他人，2011 年)提出的脱钩概念建议，经济增长应与增多消耗物质资源脱钩，例如建筑用矿物、矿物燃料和生物质等。Jackson (2011 年)认为，应朝减少或没有增长的繁荣和福祉转移，其中投资于服务和照护以及可持续粮食生产及清洁能源领域的绿色行动是关键所在。

¹³ 见 <http://nupge.ca/content/%5Bnid%5D/economy-or-environment-its-false-choice>。

68. 界定和发展绿色经济的主流办法对其对妇女和男子有不同意义的注意不多(Guerrero 和 Stock, 2012 年; Cela、Dankelman 和 Stern, 2013 年)。许多性别问题分析员和活跃分子批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失去了与“一切照旧”的全球经济模式脱钩的机会, 这种经济模式造成环境破坏、社会剥削和不平等(Schalatek, 2013 年; Wichterich, 2012 年; Unmüßig、Sachs 和 Fatheuer, 2012 年)。他们认为, 绿色经济是一种基于市场的办法, 它认为将资源和共有财产商品化、破坏生计和剥夺本地人民——特别是剥夺女性粮食生产者——是合理的做法。性别平等倡导者转而呼吁推动尊重共有财产和生计的绿色发展(Agarwal, 2012 年); 和呼吁在绿色经济辩论中, 承认和重视照护的价值(Vaughan, 2007 年; Mellor, 2009 年)。

E. 迈向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 对政策行动的影响

69.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有可能涉及折中取舍, 这需要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公开讨论(开发署, 2011 年)。在这种谈判中, 可持续性的各个社会层面——惯常遭到忽略的层面——必须被充分纳入谈判之中, 并且国家和其他有力行为体也必须负起责任, 落实可持续发展。

1. 突出社会可持续性

70. 要达到可持续发展不仅意味着要调和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 也意味着需要将社会可持续性作为优先事项。今日和未来要实现妇女人权、能力和福祉需要特别注意照护经济——这种经济就是通过家庭、市场、非营利部门和公共部门和/或国家提供照护——特别是非市场性工作或无酬照护工作的“私有”领域。社会如何组织这种工作是其社会可持续性的关键。政策制定者除了被人认为有助于人力资本的正规教育之外, 很少考虑为经济造就人力资源, 但如果没有这种时常看不见的无酬工作, 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Folbre, 1994 年; 社发所, 2010 年)。在所有社会中, 妇女通常都比男子耗费更多时间在这些非市场性活动上, 特别是处于环境压力和恶劣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因此, 有酬工作和无酬工作上的两性分工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重大结构原因。

71. 大量无酬照护工作由妇女和女童承担的这个事实已经大大影响到她们实现有权得到教育、有酬工作和体面的生活标准及政治参与的能力(见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A/68/293)。在这个领域和其他领域, 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交叉存在, 并且就是这些来自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妇女和女童的能力和权利最常受到损害, 并需要得到实现。贫穷和排斥增加了无酬照护工作的数量和强度, 这是由于得到的公共服务有限和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欠缺资源支付照护服务和使用时技术的缘故。在处于经济危机、健康危机、环境退化、自然灾害和基础设施及服务不足的情况下, 更增多了无酬照护工作。一个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会认识到无酬照护工作的存在, 使其通过统计数字为人所知, 并制定政策对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作出适当公共投资以降低工作的辛苦程度, 以及在家中男女之间和更广泛地在家庭与社会之间重新分配这些工作。

2. 紧张关系和折中取舍

72. 关于可持续性应相互结合和考虑到可持续的办法的好处的领域，应该认识到，在可持续性的不同层面之间以及与实质的性别平等上可能存在紧张关系和折中取舍的情况(参见开发署，2011年)。例如，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加了国内总产值，但由于多重因素，也加重了各种不平等。尽管这些经济模式可能会在各个区域长期存在，毫无疑问会增加国内总产值，但它们留下重大环境和人力代价的事实意味着这些模式无法持续，并阻碍了为兑现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作出的努力。

73. 在追求可持续性的工作中，什么得到持续和谁得到惠益是关键问题。然而，时常见到的挑战都在技术和管理层面，设法使技术、价格和法规到位，而非对改变不可持续的格局所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及两性权力不均问题作出更加深远的改组。如何解决这些挑战对谁得谁失都有深远影响——涉及各个社会群体及各种地方、国家和全球利益。

74. 对许多政策难题需要作出协调，以便确保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政策中得到考虑。例如，严格保护碳汇以减轻全球气候变化的作法可能会妨害生活在森林附近的男女本地生计所需并增加妇女无酬照护工作。生物燃料生产政策也可能与本地粮食安全所需背道而驰。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的国家的碳减排政策会增加消费者的支出，这会对比较贫困的家庭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它们已将全部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支付电费(Gough, 2011年)。基于市场的办法试图利用估定自然的价值和对其标上价格的方式来纠正和防止环境退化及减缓气候变化，但这可能更会加剧这些办法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减少这种风险，就需要制定全球和国家治理和监管政策框架，并对男女的本地知识和做法给予适当注意(Unmüßig, 2014年; Fairhead、Leach 和 Scoones, 2012年)。

75.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权利倡导者呼吁采取尊重共有财产和本地生计的办法，承认和重视照护和社会再生产，重组生产和消费模式并为绿色变革铺平道路(Agarwal, 2010年; Wichterich, 2012年; 妇女主要团体, 2013年)。最近对欧洲消费模式的研究显示，妇女排放的温室气体平均比男子少，这是因为妇女更加依赖公共运输、肉的消费量少、能源贫穷程度高的缘故，其中有些因素可能与妇女的收入较低有关(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 2012年)。不过，同份研究也显示，妇女对环境、健康和气候的关切比男子高。这些研究结果完全可用于全球范围，比如可能会促成更好地提供可持续和能得到的公共运输，以及使人人得到现代能源服务。

3. 问责制和延长的社会契约

76. 调和政策难题以便实现具有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能够进行审议、发出基层声音和存在多元问责机制的有力民主空间。妇女发出呼声以及参与不同

论坛，两者作为一个正义与平等问题，具有关键重要意义，并且由于妇女的积极参与能将两性平等问题置于议程之上，并能促使在满足可持续性的三个层面方面采取更有效的集体行动(Agarwal, 2010年)。不过，使妇女能够有意义地参与其中并不意味着妇女单独承担可持续发展政策中优先处理性别平等问题的责任。所有决策人员、妇女和男子都必须负起责任。

77. 迈向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需要各色各样行为者在许多层面采取行动，并只有通过国家、决策人员、捐助者、私有和民间部门以及妇女和男子之间的民主联盟才能实现。要使这些联盟发挥效用，必须要有国家的影响力和组织力量。可持续发展途径能由非政府组织、捐助者和私有企业进行构思、启发和试行，但只有国家能够将它们推广和普及，使其达到贫穷和处于边缘化的人和提供监管和体制力量以确保可持续性。不过，为了确保国家真正能够交付，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必须要有使决策人员负起责任的空间和机制，这需要延长国家与其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其中国家作为责任承担者落实它的义务，而权利拥有者诉求和享有他们的人权。

78. 要使这些社会契约发生作用，有利的全球环境必不可少。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整合的程度已经增加了一些行为体(例如，多国企业或国际金融机构)使许多国家享有人权的影响力。这些行为体对保障劳工标准、发展基础设施、获得公共服务、保护自然资源和获得信息都具有影响力——所有这些要素对妇女和女童能否享有人权至关重要。因此，全球治理必须确保这些行为体采取的行动与各国政府推动实现权利、增进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取得一致。

79. 国家需要利用它们的能力，以尊重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的方式，而非依靠市场力量，达到这些要求。这需要问责制框架，以确保在工作和就业、生殖和保健、粮食和土地以及自然资源保有权等领域的人权、性别平等和不加歧视。各国政府在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支持保健、教育和照顾儿童、老人和病人方面也能发挥关键作用，它们对人的能力以及确保可持续性和照护工作都至为重要。还必须进行公共投资，以便培育和扩大促进两性平等的公共商品的各种关键创新，例如提供现代能源服务、水供应和适当卫生设施。

80. 各种企业和私有部门目前有更多机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办法——正如新出现的“绿色经济”的前景强调的那样。然而，这些办法时常需要有力的国家支持，至少在早期阶段。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伙伴关系和合作生产安排——其中私有、公共和民间社会行为体联合提供保健、住房或能源服务，或管理森林、生物多样性或水——时常更加有效。要使这种共同生产安排有效推动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妇女居于中心地位参与规划和实施就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必须使妇女能够参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目标，也需要有足够的财政资源(Schalatek, 2013年)。参与性和两性平等的预算编制办法提供了在资金分配

决定中作出两性平等决定的前景，并确保用于追踪和报告与性别具体有关的筹资基准的问责。

81. 国家政策的制定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机制和框架、全球化进程和跨国政策转让和经验教训的影响。国际人权框架对国家承担责任提供了重要标准。不过，要实现以性别平等为其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将妇女权利更加充分地纳入政策框架。至今为结合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全球努力大小不同，其程度从“排斥在外到名义上的包括在内” (Cela、Dankelman 和 Stern, 2013 年)。通过妇女权利倡导者和应对国家之间建立联盟的办法，以及妇女运动与其他致力于社会正义、平等和可持续性的运动之间的联盟，需要将更多性别平等关切和妇女参与目前国际政策进程的问题包括在内。

82. 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分析显示，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从全球范围到国家和地方范围的治理和行动。这指出，从地方到全球级别的机构中，需要将性别平等和代表妇女利益的问题包括在内。社会运动的行动和压力在挑战和改变政策机构和组织中常见的歧视性文化、作法、偏见和成规定型观念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83. 事实上，环绕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运动的增多是近年来最有前景的发展之一。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劳动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正在组成力量，以抗衡占有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倡导——和事实上示范——他种模式。这种例子正在迅速增多，其中包括“农民之路”。自 1990 年代以来，它已成长为全球性的网络运动，在大规模企业式农业的压力下，捍卫小农的权利。推动小规模耕作的想法根植于农业生态技术、地方市场和“粮食主权” (Borras, 2004 年; McMichael, 2009 年)，其中有些——尽管不是全部——强调妇女作为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权利。拥有 1 万名会员的智利农村和土著妇女国家协会与“农民之路”结合，为培训南美女性小农，正在组成一个农业生态学院。¹⁴ 其他例子包括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城市的贫穷城市居民团体发起的运动，这些运动将拥有住房和生计的福祉和权利与体面、可持续的空间设计联系在一起 (Satterthwaite、Mitlin 和 Patel, 2011 年)。在贫民窟居民国际协会的这个案例中，环绕妇女储蓄和信贷协会以及垃圾捡拾者合作社组成的团体已经合组成一个联合会式的全球结构，这个结构目前覆盖 33 个国家，目前联接到与推动各项全球议程有关的地方行动。在他种经济和团结经济、粮食和土地、水和能源方面，正在出现许多其他例子。

84. 在这些例子中，集体行动、组织和合作为他种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途径提供了基础。建立联系和联盟提供了各种途径，通过这些途径，妇女和

¹⁴ 更多信息，见 <http://viacampesina.org/en/index.php/main-issues-mainmenu-27/women-mainmenu-39/1549-chile-women-farmers-to-teach-the-region-agroecology> (2014 年 6 月 24 日查阅)。

男子在各种不同地点就工作、工业、土地、粮食、水、能源和气候采取的每日行动和知识能开始与适当的国家支持结合在一起。

4. 作出决策的准则

85. 鉴于决策人员运作的环境的多样性，这份世界概览除了提出观点之外，还列出三项准则，用以评估为达到可持续性采取的政策、方案和行动是否可能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不可持续性造成的代价中，可能承担不成比例的份额的边缘化群体的权利。

86. 第一项准则涉及妇女的能力及其人权的享有，特别是最穷困的人和处于最边缘化的群体的能力和权利。作为一项核心准则，为可持续发展进行的政策、方案和投资应在它们是否符合人权标准和能否增进妇女和女童的能力的情况下进行评估。只要发展方式降低了妇女的能力和不让她们享有人权，这种发展方式就不能视为是可持续的。例如，以人口政策为例，限制妇女作出生殖选择和(或)采用不当避孕方法使她们遭受健康风险的计划生育方法不符合这里提出的可持续性的最低标准。

87. 第二项准则涉及对妇女和女童无酬照护工作的影响，特别是来自穷困和处于边缘化的家庭和社区的妇女和女童。如果用于增进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和方案无意中增加了妇女的无酬照护工作，则这些政策和方案就不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尽管明确和迫切需要使全球经济减少对碳的依赖，但这也应注意到本地生计和性别平等问题。例如，严格监管使用森林的作法会破坏本地生计和加重妇女无酬照护工作，这种作法无法持续。相反，对适应本地条件和符合生态要求的技术进行投资，使妇女得到水资源，同时确保水资源负担得起和水质良好，并尽量缩短水资源和住所之间的距离，这种投资是明确需要的。

88. 第三项准则涉及妇女作为塑造她们的生活以及她们的家庭、社区、国家和世界的未来的行为者、领导人和决策人员全面、平等和切实地参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在粮食安全领域，使国家和本地有足够粮食以及发展使用少量农药和进行环境可持续的农业——从生态可持续性的观点希望达到的目标——的政策努力需要与小农特别是与妇女进行磋商，了解她们的优先次序和各种制约，而不是假定她们的利益已经与先入为主的政策目标和观点一致。

三. 绿色经济、性别平等和照护工作

A. 引言

89. 增长轨迹应以它们能够产生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加以评价。为了确保以性别平等为其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任何发展政策框架除了促进增长之外，还需达成一些目标：减少性别不平等，以及基于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工

作和可持续生计；内部承担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费用；和提供公共商品和支持照护经济以确保人类福祉。

90. 因此，本章阐述增长和性别平等问题，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结合到对它的分析之中。它评价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是否已经通过为妇女创造可持续生计和体面工作的方式促成增长和发展，考虑他种绿色经济模式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影响，以及目前的发展模式对人们在世代之中和之间相互照护的能力的影响。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本章除了讨论“绿化”工作的潜力之外，还认识到由于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需要作出更加基本的改变，以达到可持续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主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也必须改变。因此，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指出需要建立新的生产系统，这个系统通过提供社会保护和其他公共商品以及对照护经济进行投资，这对实现权利、性别平等以及生态完整性提供了支持。

B. 更加广泛的发展和政策背景

91. 过去二十年间，世界各国国内以及相互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一直都在增加(开发署，2013年a)。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都是那些推动快速增长战略一直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战略将它们推向高收入国家的类别(开发署，2013年a)。导致这种日益不平等的理由之一是劳动力市场的性质改变。过去二十至三十年间，各式各样国家赚取工资者都失去了主导地位，而利润和租金在他们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国际劳工研究所，200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013年a；Stockhammer，2013年)。在此同时，非正规职业在世界许多地区都非常盛行。¹⁵ 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妇女似比男子多，甚至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内，男子一般都会赚取工资，而妇女更多是承担更不稳定的非正规自营职业(Vanek和其他人，2014年)。

92.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大都是全球化进程推动的，即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这些进程削弱了相对不易流动的劳工与完全流动的资本相比较的议价地位。不过，国内政策选择也发挥了它们的作用。一些与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大的趋势背道而驰的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在拉丁美洲——的经验显示，有可能在继续与全球经济结合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发署，2013年a)。

93. 在全球层面，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依然十分不均。2010年，占世界人口仅16%的高收入国家创造了近55%的全球收入；与此相较，低收入国家创造了略多于1%的全球收入，尽管它们占世界人口的72%。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人均国内总产

¹⁵ 不属于正规安排或正规安排不足的就业情况，包括在不付工资时缺乏保障、强迫要求加班或额外轮班、解雇时不发通知或工薪、工作条件不安全和缺乏养恤金、带薪病假和健康保险等社会福利。

值 2 014 美元与欧洲联盟的平均人均国内总产值 27 640 美元和北美的平均人均国内总产值 41 399 美元的相差极大(联合国, 2013 年 b)。

94. 不平等程度上升不仅对人权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令人感到关切, 它也对经济、环境和政治产生高度不利影响(联合国, 2013 年 b)。例如, 国内存在的高度不平等状况使社会很难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穷。此外, 如 2008 年看到的情况, 各国国内以及相互之间的高度不平等状况, 由于这会造成消费不足和各种破坏经济的所谓“泡沫”, 在有些情况下, 能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的催化剂(Galbraith, 2012 年; Saith, 2011 年)。

95. 添加到社会和经济挑战的是来自另一个正在出现的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危机造成的风险, 即气候变化, 它有可能会加强现有不平等状况。世界上的穷人特别易受气候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暴雨和荒漠化的蹂躏。穷困家庭和其他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也最可能成为得不到足够清洁水的群体之一, 因为清洁水越来越受到降水状况的改变、融化的冰河和干旱的影响。尽管造成这些多重危机的原因各不相同,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过去二十年中, 许多资金都涌入房地产、矿物燃料和附带衍生产品的结构性金融资产, 但相对较少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公共运输、可持续农业和土地及水的保护”(环境署, 2011 年)。

1. 经济和社会政策

96. 如以前出版的《世界概览》充分阐明的情况, 宏观经济政策会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见 A/54/227; ¹¹ A/64/93¹⁶)。本章阐述造成这些性别偏见的原因, 并将这项分析的重点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环境层面。

97. 过去三十年居于主导地位的宏观经济政策纲领的特点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经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这个核心三部曲。¹⁷ 经济自由化是指使国内市场自由化, 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 以及使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作为有前景的发展战略和创造就业的动力, 已经减少了进口控制和促进了出口(贸发会议, 2010 年; 2013 年 a)。在投资方面, 自由化已被用于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和短期资本流动。宏观经济稳定普遍被认为是根据政策机制简单地达成价格稳定(有别于例如就业稳定), 有时指通货紧缩, 这往往会削弱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

¹⁶ 见《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 妇女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获得财政资源, 包括小额信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09.IV.7)。

¹⁷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政府和中央银行作出的干预政策, 以便通过它对整体收入、全部支出、投资、信贷、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等产生的影响对整个经济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分为财政政策(政府的开支和税收)和影响货币供应量及是否提供信贷的货币政策。其他政策领域——例如, 贸易和金融市场政策——也具有对整个经济发挥效用的作用。

98. 首先，关于货币政策，当今中央银行一般都明定通货膨胀目标，试图尽量压低通货膨胀。如果低通货膨胀率是唯一的目标，这可能会导致高利率。其结果是使失业率高于它原本应有的程度。这种货币政策可能具有性别偏见。一项根据 17 个中低收入国家数据作出的经验分析，评估了 51 种“降低通货膨胀办法”产生的就业机会(Braunstein 和 Heintz, 2008 年)。这项研究在每一种降低通货膨胀办法中按性别了解实际就业趋势，并将这种趋势与长期就业趋势进行比较。它查出两个重要结果：第一，通货膨胀下降期间非常可能与妇女和男子失去工作有关；第二，在就业机会减少时，以百分比而言，妇女比男子失去更多工作。此外，在少数几个采取降低通货膨胀办法期间而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中，妇女获得就业的机会也不比男子快。这些结果表明，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的紧缩货币政策时常对妇女就业造成不成比例的消极影响。

99. 占主导地位的财政政策和公共部门改革限制了国家提供社会福利的职能，这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具有消极影响。这种占有主导地位的政策集中于采用减少举债偿付公共开支的作法并尽量降低私有企业的税务负担。强调私有化的作法破坏了政府的行动。有人指出，政府的开支不仅具有通货膨胀作用，同时也会排挤私有投资。这种观点忽略了公共投资能“拉拢”或鼓励私有投资的事实，例如，当政府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或信贷时，这使私有投资机会更具吸引力。这种情况在有大量市场缺陷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尤为真实。相对于社会和经济最理想的状况，市场提供的公共商品不多，因为它们的社会回报大于私有部门的回报(Sen, 1999 年；联合国, 2013 年 b)。

100. 限制国家提供公共商品能力的财务制约时常对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和儿童)产生不成比例的消极影响，这部分是由于她们在家中的地位，部分是由于她们的工作内容与照护经济密切相关(Ortiz 和 Cummins, 2013 年)。从许多受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采取 2010 年后财政紧缩措施的状况都证实了这种现象：妇女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取消住房补贴、儿童/家庭津贴、老年津贴和照护服务的沉重负担(妇女署, 2014 年；世界银行, 2012 年)。这种观点还忽略了公共部门历来都是就业的重要来源的事实，它提供妇女相对优质的就业、较高的工资和提供养恤金和其他社会福利(Lund, 2010 年)。劳工组织的数据证实，历来妇女在许多国家都占公共部门工人的大部分份额(时常高于她们在整个就业市场的份额)，并在有这种数据的国家中，显示妇女占发展中国家公职人员的 35%、经济转型国家的 46% 和经合组织国家的 50%(Hammouya, 1999 年)。公共部门裁员对妇女的正式就业机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并有可能使妇女更加集中在较非正规、非经常性的工作(Lee, 2005 年)。

101. 从社会可持续性转到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国家丧失提供社会福利的职能也使气候变化易于发生并加强了其严峻程度。国家提供给基础设施、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资金不够，这意味着为适应气候变化或建立复原能力所采取的考虑到性别平

等和社会正义的措施，例如对防洪进行投资或对抗旱种子进行研究等措施，都将面临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因此，国家监管和管理与环境有关的各种政策领域并收取费用，以便为有效养护提供资金，这至为重要(开发署，2011年)。

102. 合并来看，这些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作法创造了一个通货紧缩的经济环境，其特征是减少就业的能力、紧缩财政和有限的公共政策空间，这影响到实现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在这种背景下，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的最佳途径或唯一真正途径是致力于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已经出现的两种新的经济发展状况使落实外向型的议程甚至更趋复杂。第一，由于更多国家转向为出口市场进行生产，世界各个角落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已经加剧。这转而对工资和与工资有关的各种福利产生压力，特别是在劳力密集部门，例如雇用大量妇女的制衣业、服装业和电子业(Seguino, 2000年)。因此，为社会可持续性实现体面工作的作法受到了破坏。将生产进程转到发展中国家进行，这就将污染的生产进程的生态和保健成本也转移给环境法规较不严格的国家(贸发会议，2013年b)。第二项最新的发展是全球不平衡状况更形加剧，这威胁到本章现在讨论的模式的经济可持续性。

2. 不平等和经济不可持续性

103. 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日益上升，使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无法持续，即使是在这种模式有限的条件下。对有些国家而言，储蓄长期减少和私人债务积累增多，尽管受益停滞不前，这增加了消费，导致经常账户大额赤字。在此同时，经常账户顺差国家在缺乏国内足够总体需求的情况下，利用出口市场作为维持国内就业的办法(Blecker, 2012年；贸发会议，2010年)。总体成果是有些区域消费不足，但部分由于经常账户顺差国家向逆差国家供资造成全球资金流动，另一些区域则借贷过度。这项进程由于金融化趋势的高涨¹⁸和将强调重点从生产转向金融盈利而被进一步推动(Cripps、Izurieta和Singh, 2011年)。

104. 这种生产和交换方式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并已导致全球不平衡，¹⁹在最近全球经济危机中扮演了重要作用(Bernanke, 2011年；贸发会议，2010年)。虽然全球不平衡没有触发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它们促使了它的蔓延。尽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各国特定情况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使工资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这在全世界北方和南方各国都造成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Blecker, 2012年)。它们显示出依赖工资停滞不前的出口来推动增长和发展的系统性悖论。

105. 在发达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增长依然迟缓，失业率高，因为许多政府采用紧缩政策以期降低赤字和恢复经济信心。在发展中国家中，受全球危机影响最

¹⁸ 金融化的范围超过金融市场的扩散和相应的投机活动，而是指这些市场延伸到不断扩大范围的活动和部门，例如养恤金、保健、住房等(Fine, 2012年)。

¹⁹ 全球不平衡是指一些国家之间大量经常账户逆差和顺差的分布情况。

严重的国家是经常账户赤字不能承受危机造成的资本流入下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贸发会议, 2010年)。但对与全球资本市场关系不大的低收入国家以及对经常账户有盈余和/或有足够国际储备的国家而言, 金融危机造成的消极影响并不严重, 时间也不长。例如, 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采用反周期性的货币和金融政策, 改而利用国内需求来抗衡全球贸易的下降(社发所, 2010年)。这些国家事实上带领了全球复苏, 但增长、贸易和就业机会的重现仍未来临(世界银行, 2014年)。在很大程度上, 全球生产和消费都已转向大型新兴经济体, 它们转而提供了新的出口市场, 帮助了无法依赖本国需求的小型经济体(Gereffi, 2014年; 贸发会议, 2013年a)。

106. 不过,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完全不够支撑一个出口导向的增长机会的新时代。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确实增加了全球需求, 但面临的问题依然是规模和结构的问题。例如, 以规模而言, 中等收入国家的需求要取代作为全球消费增长动力的大型发达国家仍有漫漫长路要走(Cripps、Izurieta 和 Singh, 2011年)。以结构而言, 工业化国家的需求变少意味着从对制成品的需求到原料、能源和粮食的需求减少, 所有这些都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中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这种对原料、能源和粮食的需求的转变对全球商品价格——价格将会上升——以及对贸易条件——劳力密集型制造商将购买较少的进口品——都会产生影响(贸发会议, 2010年)。

107. 在“褐色经济”的基础上恢复增长和就业机会, 以其对能源效率低和不可持续能源的依赖,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刚摆脱危机之后, 就对恢复汽车工业制订刺激政策, 而不对公共运输和可再生能源作出投资, 这令人感到关切。这种投资有可能重新产生导致发生多重危机的不平衡和脆弱性, 而没有利用这个危机作为带领经济和社会沿着更加持续的道路前进的机会。大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 当前的消费模式正在耗竭关键的自然资源, 并将无法持续的沉重负担加诸地球生态系统之上。因此, 迫切需要进行讨论、设计和采取各种设定明确的资源和环境限度和将其纳入经济和社会系统的政策(Jackson, 2011年)。

C. 探索他种办法: 绿色经济和性别平等

108. 鉴于全球不平衡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并不看好重新开始出口导向的增长, 应该考虑应达到何种再平衡。贸发会议在《贸易和发展报告》(2010年)中主要阐明两件事: 第一, 经常账户有盈余的高收入国家需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和开始增加进口, 落实促使工资和消费增长的政策; 第二, 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转移到由工资带动并支持扩大国内总体需求的增长体系。对国内市场不够大的小型经济体或低收入经济体而言, 出口到更广泛的各类进口者, 或在以前的全球出口主导模式不再适用的区域集团内进行贸易, 这都可助长增长和发展的动力。

109. 不清楚的是, 如果根据贸发会议(2010年)建议的方式通过扩大国内需求重新平衡全球经济是否会改善妇女的就业机会。有些研究报告指出, 扩大国内总体

需求能够提高女性工资，降低工资的性别差距，而又不牺牲经济增长(Blecker 和 Seguíno, 2002 年; Seguíno 和 Grown, 2006 年)。此外，鉴于妇女收入与支付基本需求的开支之间的关联性，当减少对进口品的需求时，也可能会对国内生产产生积极的连带影响(Benería 和 Roldán, 1987 年; Blumberg, 1991 年; Haddad、Hoddinott 和 Alderman, 1997 年)。不过，尽管从偏重出口导向的战略转向到更加依赖国内需求的模式，但国际收支的束缚依然存在。妇女收入增多后所导致的能力提高有可能补偿外汇的损失，这种情况比较有可能在低收入农业经济体而非在半工业化经济体出现(Seguíno, 2010 年)。

110. 另一个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是：需求导向的增长模式是否对环境可持续性更加有利。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何种需求得到鼓励：例如，以低碳和适应气候能力强的商品和服务为特点的需求与基于矿物燃料和开采自然资源的需求非常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向需求导向的增长转向，其本身似乎不可能解决与持续增长有关的环境成本，除非低收入群体从这种转向得到的较高工资和收益用于较不依赖矿物燃料和开采自然资源的商品以及增加高能效部门和技术的公共支出和投资。这就是推动绿色经济的提案受到关注的原因。

1. 绿色经济

111. 与居于主导地位的增长模式有关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促使各方对可持续的其他发展模式进行研究。一个好例子就是绿色经济纲领，其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绿化投资和公共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环境保护，并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劳工组织，2012 年；贸发会议，2013 年 a)。不过，绿色经济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112. 占有主导地位的绿色经济模式认为，应通过增进能源和资源效能及防止丧失生态系统服务的绿色商业投资和创新，继续和甚至加强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其他模式则强调，应通过自然资本财务估值(例如，自然资本委员会，2013 年)以及为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碳及生物多样性信贷及抵消交易机制的方式，为保护环境采用基于市场的办法。对这些办法的支持者而言，市场未能为自然资产和生态系统服务设定价格，但它们毕竟像资本和劳动力一样，都是生产要素。其结果是，相对于社会和经济上的最理想方式，这种自然资本遭到过度滥用。在这种背景下，消极的外部因素使市场结果不具社会效率，各种市场干预力量，例如征收碳税或制订给予地方社区管理森林的权利等，都是为了设定自然资产的适当价格和确定财产权。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他们将市场导向的增长进程与环境价值更加密切地取得一致(世界银行，2012 年)。

113. 从社会观点而言，这些基于市场的办法会有问题，对本地使用者比对外部行为体和全球行为体更加不公平和不公正。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发所)最近的报告指出，支付生态服务费用、联合国关于降低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的合作方案(降排)有关的进程和生产生物燃料的各种刺激措施时常必须与

小农农业、生物多样性、生计和粮食安全作出取舍。此外，基于市场的办法时常推动企业利益，这可能会对促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监管改革的范围造成制约(社发所，2012年b)。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基于市场的推动绿色经济的办法中，可持续发展的各个社会层面没有进行足够的整合。

114. 环境署认为，绿色经济是结束赤贫、提高福祉和增进社会平等并同时能减少对碳的依赖和生态系统退化的经济，并能进一步推动包容各方的可持续增长(环境署，2009年；2011年)。这个定义同对可持续发展及其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层面的一般性了解相一致。绿色凯恩斯主义，它也作为绿色刺激措施或“全球绿色新政”的面貌呈现，认为应将政府开支导向到加强保护环境和提高效率的技术和就业机会方面，例如，改建能效不高的建筑或基础设施(例如，环境署，2009年)。这类绿色投资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中受到许多讨论和各方推动。环境署的提案强调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经济转型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因此，公平和公正的全球绿色新政，基于效率和公平的理由，应考虑包括发达国家在金融、贸易、技术和能力建设领域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额外支持”(环境署，2009年)。性别平等在大多数这类提案中都不太受到重视。

115. 上文提到的对绿色经济的他种构思是与环境正义运动有关的工作，它们认为保护环境是了解和纠正多种不平等形式的一种机会。例如，维持作物的生物多样性使以后的粮食生产者能处理威胁粮食供应的新害虫和疾病。今天，作物的生物多样性大都由南方国家的农人维持，但他们没有从这种极具价值和有利生态的服务得到补偿(Boyce，2011年)。补偿全球南方国家的农人为促进长期粮食安全作出的贡献应获得绿色经济倡导者的认同，同时，这种作法也直接涉及以经济上公平和有利穷人的方式促进发展和可持续性的问题。将妇女在农业方面的传统工作明确包括在内——例如，选种和保存种子以维持作物生物多样性——都是这些分析中重要部分。此外，在土地所有权和获取资源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以及无酬照护工作的负担——都对以可持续和有利穷人的方式绿化农业造成重大障碍(Herren和其他人，2012年)。

2. 妇女和绿色工作

116. 绿色增长纲领的部分目标是扩大绿色工作，这主要是以其产生的环境影响来理解的，但也设法遵循劳工组织关于体面工作的概念(可持续发展国际劳工基金会，2009年；劳工组织，2012年；环境署和其他人，2008年)。²⁰ 关于约占80%绿色工作的工业，为数不多的制造业消耗了大部分资源和能源，并排放了大部分

²⁰ 体面工作包括提供优质就业机会；工人权利，包括免遭歧视；获得社会保障；和在各种经济和民间社会组织中持续进行社会对话(劳工组织，2012年)。

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国际可持续发展劳工基金会, 2009年)。这包括能源、建筑、运输业及铝业和钢铁业等其他基本工业(劳工组织, 2012年)。

117. 在预期增加的就业机会中, 估计大多数会来自与转向低碳经济有关的活动, 包括开发可再生能源、制造更省燃料的车辆、建造和改建建筑物、交通工具和基础设施以及废物管理和回收使用。在制造业中, 强调采用清洁处理技术和控制污染, 而较少强调对就业造成的明显全面影响(国际可持续发展劳工基金会, 2009年)。绿色工作一般均属中等技能工作, 扩大中的各个行业比其传统业界的同行需要更高技能和知识; 随之而来的工资和福利也较高(Chan 和 Ching Lam, 2012年; Muro 和其他人, 2011年)。这些特征使绿色工作与体面工作之间的联系似乎是自然的结合, 不过, 在有些行业, 这种结合比其他行业更密切。例如, 农业依然是就业的单一最大行业, 也是农村就业的主要部门, 其中世界大多数穷人和赤贫的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在其中。因此, 对农业投资可能非常有前途。改做绿色工作有时也被视为是妇女进入非传统但工资较高的行业的机会, 例如, 工程、建筑和制造业, 因为这些行业被视为较不易受到根深蒂固的性别成规定型观念的限制(国际可持续发展劳工基金会, 2009年)。

118. 尽管使工作绿化的目标令人称道, 但可能不会自动惠及妇女, 而对妇女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需要明确加以考虑。鉴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隔离的严重程度, 而在妇女只占全球劳动力 30% 的业界更是如此, 推动绿色工业的努力不仅可能会使妇女无缘参与, 而实际上会使她们处于不利地位。以扩大绿色就业为目标的各个行业, 例如, 能源、建筑和基本工业, 绝大部分由男性主导, 而最近的趋势显示, 行业中的性别隔离情况正在增加, 而非减少。²¹ 在已经存在的绿色工作中, 妇女任职的人数似乎不多和/或担任附加值较低的工作。例如,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一半以上的大学学位都由妇女得到, 但仅有 30% 的科学和技术学位(研究绿色工作的关键领域)授予妇女。在发展中经济体中, 妇女高度集中在附加价值低的现有绿色工作, 例如, 作为废物收集和回收使用的非正规工人(Strietska-Ilina 和其他人, 2011年)。

119. 构想环境上可持续的产业转变, 这意味着作为广泛的体面工作纲领的一部分, 为妇女设定具体的技能发展和教育, 并确保同工同酬和消除工作场所的歧视(劳工组织, 2012年; 国际可持续发展劳工基金会, 2009年; 环境署和其他人, 2008年)。还必须为破除成规定型观念作出努力。性别成规定型观念向来存在, 并遍及整个社会: 家庭、学校、媒体和每日社会交往和互动, 都存在这些观念并加强了这些观念。在中学和大学, 这促使男女集中到不同的科目。各种不同的研究报告已经显示, 女性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人数少与她们的态度有关, 而非她们的能力: 例如, 女童的数学成绩不低。尽管可以发现职业选择的差异与

²¹ 见 [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employment-trends/WCMS_195447/lang--en/index.htm](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employment-trends/WCMS_195447/lang-en/index.htm)。

学习科目有关,但男女职业上的隔离在从大学教育到就业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例如,在经合组织国家,即使女性选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科目,她们也比男子不愿追求科学生涯,尽管在工作表现上男女没有差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12年)。

120. 有几个将女性包括在内的绿色工作的例子。例如,在南非的“水利工作”项目中,其扩大的公共工程计划的一部分是提供培训,清除外来入侵植物以便增加供水,最成功的努力是具体征聘妇女、青年和残疾人参与工作(Strietska-Ilina和其他人,2011年)。在孟加拉国,作为安装家用型太阳能系统在农村地区供电的大型项目的一部分,妇女接受安装和修理太阳能板和电源插座的训练,使她们以完全异于传统劳动力市场标准的方式作为“农村电工”(劳工组织,2012年;Sidner,2011年)。在美利坚合众国,有一些方案通过技能发展和建立网络的方式鼓励妇女担任绿色工作,其中包括非传统职业女性学徒方案,它向让女性学习非传统职业的社区组织提供奖学金,例如最近强调绿色工作的见习方案。

121. 尽管这些努力有指导作用并具有前景,但它们并不直接解决与低工资、恶劣工作条件和无法接触这些新颖但规模小的举措的大量男女的艰困生计有关的结构性的不平等问题。以废物捡拾者而言,看到了一些前景,使工作绿化的努力超过了解决非正规性和可有可无的拼凑技能发展。

122. 在发达国家,废物管理和回收再用是高度规范化和自动化的行业,这些工作都由男性主导。但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估计有1 500万至2 000万名废物捡拾者,他们大都是妇女和儿童,由于贫穷而被迫从事这项工作,从别人丢弃的废物中寻找能再加使用和可回收使用的物品,这为公共服务有限但经历快速都市化的地区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服务(劳工组织,2012年;Samson,2009年)。这项工作大都是非正规、收入低和不稳定的工作,一般都遭到社会蔑视并且非常贫穷,甚至工作条件十分危险(劳工组织,2012年)。例如,每年丢弃2 000万—5 000万吨含有贵金属的电子废物,其中大部分废弃物都出口到中国 and 印度等国拆解。这些废物时常都被运到非正规的小型家庭工厂或其他非正规设施进行处理,在这些地方,知识有限,而危险性高(劳工组织,2012年,第120页)。不过,废物捡拾者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贡献至为巨大:他们提高了公共健康和卫生;从废物源头取得有用物质;减少对新材料的需求;提供城市非常符合成本效益的废物管理系统;和为穷人和边缘化的人提供了生计。²²

123. 废物捡拾者通过自身努力和在劳工组织等全球机构的帮助下,将全世界废物捡拾者组织和联合起来,这种努力说明了一个有用的办法,将绿色工作为更大的社会融合的渠道(劳工组织,2012年)。妇女似乎比男子更愿意参加废物捡拾者

²² 见 Waste Pickers, 2014,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参阅 <http://wiego.org/informal-economy/occupational-groups/waste-pickers>, (2014年1月24日查阅)。

组织，或许这是因为她们大都从事收入低的废物捡拾活动，并且她们的收入一般比男子从事同样的工作低。废物捡拾者组织起来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尊以及收入。有组织的废物捡拾者更能绕过中间商，为他们的物品与买方谈判公平的价格。他们集合在一起，更能防止遭到骚扰和暴力。也有人试图将废物捡拾者更好地纳入废物管理和回收使用的价值链，而不是将其推往与焚烧和填埋技术有关的商业化作法。这种尝试在于推动零废物战略，以达到最大的回收使用，并对穷人提供体面就业的机会(劳工组织，2012年)。作出这种尝试的例子在世界各个区域比比皆是，其中最注重的是来自集体组织、合乎法律和与城镇建立正式关系所提高的社会力量和安全，并增加了获得社会保护。

D. 对不可持续性的他种应对办法：对公共商品和照护经济的投资

124. 促进两性平等的绿色经济会增进妇女的就业机会和工作质量并符合体面工作纲领，这是解决社会可持续性和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措施。但这还不够。为了纠正性别不平等现象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决策人员需要注意对公共商品和照护经济作出投资。

125. 自2007-2008年危机以来，各方普遍呼吁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改变全球金融体系，也需要改变主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如果结束危机的措施只是为了设法恢复增长和贪婪，则这些措施终将失败”(Elson, 2011年)。需要制定更加精密的准则来评估取得的成就，而不是仅以国内总产值为衡量标准。

126. 目前出现要求推动生态宏观经济学的呼声，其起点是假设永续的消费增长不再是经济稳定的唯一基础，并查明确定可持续经济的条件，包括强有力地应对外来冲击和避免在经济衰退期间造成社会紧张的内部矛盾；保障平等的生计；和保护生态系统的方式可持续地使用资源(Jackson, 2011年)。

127. 在全世界，增加私自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一直作为成功的象征，而不是增加人权、扩大的能力和福祉的享有。妇女也以能够购买更多消费品来使她们了解性别平等和拥有权能(Elson, 2011年)。时常作出的假设是，决策人员应该首先尽量做大经济馅饼(国内总产值)，然后再通过重新分配这个馅饼的方式来解决平等、福祉和公正等问题。另一种假设认为，创造财富的最好办法是求取利润的私人企业在以促进这种企业之间竞争的方式受到监管的市场内推动业务。以人权和能力为基础的办法有不同的目标：扩大人民过他们有理由认为值得生活的实质选择。这意味着能够享有更多权利，而不是仅仅来自消费更多商品得到的欢愉。这将包括免于贫穷和饥饿的权利、拥有健康和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的权利。

128. 女性主义经济学包含了许多人权和能力办法的价值观，但这种经济学特别强调一种经济体系，其中不仅包括付酬工作，也包括非市场性的无酬照护工作

(Grown、Elson 和 Cagatay, 2000 年)。大多数用于决策的主流经济办法都以市场生产为主。无酬工作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女性主义经济学对这种排他性提出挑战,认为在女性主义经济学以及市场经济和国家中,决策人员需要将无酬经济考虑在内,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基于社会义务、利他主义和互惠 - 有时基于胁迫 - 为其家庭、朋友和邻居提供商品和服务。在这种无酬经济中,人们生产粮食和缝制衣服、担柴取水、煮饭、清洗和照顾他人,特别是儿童、体弱老人和生病的人(Elson, 1998 年; 2011 年; Folbre, 1994 年; 2001 年; 开发署, 1995 年; 社发所, 2010 年)。有两个理由需要强调无酬经济对决策的重要性: 第一, 它对人们的福祉作出基本贡献, 这是社会可持续性的关键; 第二, 尽管无酬照护并没有在统计中得到适当呈现和考虑在决策之内, 但它影响到经济其他部分的运作, 包括私人(大型和小型)企业、公共部门和非政府部门, 对运行这些实体所需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它创造了经济可持续性的基础(Elson, 1998 年; 2011 年)。这种对经济成功和失败的其他思维引起对作出决策至为关键的两组问题的注意。

129. 第一, 决策人员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即人们通过现有权益关系、通过有酬工作或维生耕作等得到的资源不足, 如何能保证他们行使他们的人权和发挥他们的能力(营养良好、健康、识字、能够参与社区生活等)。他们从市场得到的收益不足,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酬劳低的经济部门工作或承担无酬照护劳务, 使他们无法赚取适当收入, 或由于他们没有资本或土地, 使他们无法从自营职业得到足够收益。但也有结构因素能时常用来解释这种失效的权益关系: 例如, 高度不平等和歧视性的财产关系, 使许多人特别是妇女无法得到土地和其他生产资产; 结构性失业、就业不足和非正规性就业程度高, 使人特别是妇女无法实现他们的工作权和在工作场所应享的权利。

130. 近年来, 世界不同地区的决策人员为应对这种失效状况, 已将他们的注意力朝向社会安全体系。²³ 从 1990 年代初通过各种经济情况调查查明贫穷的有针对性目标的安全网已经汲取了许多有用经验: 在行政能力薄弱的情况下, 进行经济状况调查在管理上可能耗费庞大; 对家庭状况缺乏了解增加了这种做法的复杂性, 并可能将穷人排除在外(通过所谓的“遗漏错误”); 社会支助措施需要制度化, 而不是临时措施, 和在可能情况下根据有力的征税和转让制度提供资金; 和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 基础广泛的通用系统比具有针对性目标的狭隘措施更加有用、更加透明和更加有效(Mkandawire, 2005 年; 社发所, 2010 年; Sepúlveda 和 Nyst, 2012 年)。

²³ 社会安全和社会保护的定义和用法在各个学科和各个国际组织差异极大。《世界概览》运用劳工组织的办法(2014 年), 将这两个用语交替使用, 表示对以下情况提供保护的措施: 由于生病、残疾、怀孕、工伤、失业、老年或家人死亡导致没有工资收入(或收入不足); 没有健康照护或无法负担保健; 家庭支持不足, 特别是对儿童和成年家属的支持不足; 普遍贫穷和社会排斥。

131. 事实上，正如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倡议所认识到的状况，目前对改变的状况作出应对的社会安全体系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殷切。不断出现的多重危机已经说明社会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它能暂时缓解突然失去收入和就业的困境。此外，快速的都市化、家庭结构的改变、人口的变迁、移徙和各种健康危机都需要具有能够在这些新挑战面前保护人们和帮助他们作出调整的新办法。在这项工作中，社会保障措施不仅能推动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也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变革(社发所，2010年)。

132. 然而，社会保护措施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全世界只有27%的人享有全面社会安全，而73%的人只部分享有或完全不享有(劳工组织，2014年)。同样，估计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无法得到任何健康照顾，并对更多人而言，保健费用是他们的一项重大负担，也是将家庭推向贫穷和负债的重要因素。促使女童在中学就读、有技能的保健专业人员帮助接生的数目和获得经改善的水源和卫生设施所取得的进展也各不相同。尽管许多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间在这些指标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低收入妇女和女童取得的成果远落后于高收入的妇女和女童(联合国，2013年b)。令人不安的是，不同收入类别的妇女之间的不平等在有些国家已经加大，而非缩小(Elson，2014年)。

133. 与男子相比，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不成比例地无法得到社会安全和社会服务的影响(Razavi和Hassim，2006年)。在公共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尤其明显，因为妇女受到更多收入、储蓄和资产方面的制约，这使她们更加不易使用私营保险机制，并更易受到使用社会服务费用的影响。缺乏适当的公共支助也加重了对非正规社会安全体系的依赖。从性别平等的观点而言，依靠家人和社区网络的做法大有问题。在一方面，这些网络在相当程度上通常依赖妇女的无酬照护工作。在另一方面，目前的社会规范和家庭及社区中的两性权力关系极可能限制了妇女自身的需要得到确认和解决。

134. 国家加大参与力度及其本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在得到公共社会安全及无视性别的社会服务方面，性别的差距不胜枚举。在有些情况下，提供社会安全和服务的方式会使妇女而特别是来自贫穷、少数族裔、残疾和具有土著背景的妇女处于边缘地位、受到蔑视或负担过重(Sepúlveda和Nyst，2012年)。因此之故，妇女享有基本人权——包括享有适当生活标准的权利——严重受阻。国家加大监管、资助和提供社会公共商品并不是促进实质性别平等的充分条件。从人权观点而言，国家必须是保证人人享有人权的义务承担者。人权体系认为国家负有尊重、保护和落实人权的积极义务。²⁴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人权的

²⁴ 这种句子似乎来自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Sub.2/1987/23)。

一般性评论中就使用了这些原则，其中包括教育权；保健权；供水权；工作权；和社会安全权。²⁵

135. 第二个需要得到政策关注的要素是生产和消费体系。至关重要的是，应严格审查具有主导地位的生产体系以及建立支持实现各项权利和性别平等以及生态完整性的新生产体系。

136. 这种替代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要素是需要对社会生产、投资和消费给予更大注意(Elson, 2011 年)。这是指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的生产，例如合作社、社区企业、社区森林和灌溉系统的管理以及社区厨房和保健中心的生产。尽管国家可能积极从事其中一些安排，但它们不是唯一的行为者。采用这种混合体系的好处是这种体系能回应所有人的需要和需求，不论其收入和财富。“时常认为，私营生产更能符合消费者的需要，但这种生产只为了满足有钱的消费者”(Elson, 2011 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不仅要符合生产者的权利和利益，也要符合使用者的权利。这需要加强使用者的权利和建立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直接联系。

137. 社会生产和投资对生产足够的公共商品至关重要，这表示这些商品将惠及并不直接使用这些商品的人：教育、公共卫生、良好的公共交通运输、供水和卫生以及清洁能源系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可持续的气候是一种重要公共商品。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是可持续的照护系统也是一个重要公共商品(Folbre, 2001 年)。大部分这类照护都是在无酬的基础上提供的(Budlender, 2010 年)。不过，有酬照护服务也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和就业中日益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在妇女就业方面(Razavi 和 Staab, 2010 年)。²⁶ 提供照护服务——不论是通过家庭和社区无酬提供，或通过市场和雇有照护人员的公共部门提供——都是向所有人提供福祉的重要部分。当照护工作得到体面报酬和保护时，它能满足照护工人的利益，也能满足服务使用者的利益。它也能减轻妇女和女童作为无酬照护者的负担。

138. 今日，照护经济已大都脱离不断进行的关于绿色经济的辩论。部分问题是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增长。根据一般增长模式的标准，发展进程仅仅是一项资本累进和生产力增长的进程。尽管近代增长模式的确纳入了一些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但人力资本却很少被作为投资的一部分得到重视。²⁷ 此外，虽然为增长提

²⁵ 见 E/2000/22 和 Corr.1, 附件一, 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 E/2001/22, 附件四, 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 E/2003/22, 附件四, 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 E/2006/22, 附件 C, 第 18 号一般性意见; 和 E/2008/22, 附件七, 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

²⁶ 有酬照护工作包括工作人员需要为接受者发展人的能力提供面对面服务的职业。“人的能力”是指对本人或他人有用的健康、技能或倾向，其中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身体技能、认知技能和感情技能，例如自律、同情和关心等。照护劳动力包括教师、护士、儿童护工和治疗师等(England、Budig 和 Folbre, 2002 年)。

²⁷ 两种重要例外模式是 Braunstein、yan Staveren 和 Tavani (2011 年) 和 Seguino (2010 年) 这两份文件中提出的模式。

出的解决办法几乎都要求作出技能投资，但这种呼吁受到需要提高正规教育的限制。这种增长和发展办法忽略了大量无酬和有酬照护工作，这些工作维系着人一日复一日和一代复一代的生存。

139. 一种能够支持照护经济的政策是转向采用照护密集或社会服务密集的活动，这对环境也有裨益，因为提供照护通常不会大量使用环境资源(Jackson, 2011年)。在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是妇女和男子的最大雇主，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也日益成为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推手。不过，服务业高度不平均。在新兴经济体，附加值高的服务(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一般比它们的附加值产生非常有限的就业机会(贸发会议, 2010年)。与照护有关的服务——除了它们的附加值外——都是劳力密集的服务，也是妇女的传统就业来源，因此，增加了妇女就业机会的机会。

140. 政府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潜力。例如，在大韩民国，自2000年以来，政府为照顾儿童提供政府津贴和为老年人普遍提供长期保险的方式，大幅增加社会照护经费。这些做法以及为支持照护经济采取的其他社会政策措施，例如法定育儿假，都被视为是通过国家、市场、家庭和社区之间更加公平地重新分配照护责任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Peng, 2012年)。

141. 另一个例子是巴基斯坦的“女保健人员”方案，这个方案将家庭和保健服务建立起有力的联系，特别是为行动不便的农村妇女建立这种联系。这个方案也成为该国妇女的一个主要雇主，因为在该国妇女的就业机会相当有限。受雇的妇女在合格医生的指导下，在距离最近的初级保健中心接受为期15个月的培训。随后她们能在家中执业，接待社区成员、举行会议和存放基本药品，包括避孕用品。女保健人员每周工作平均30小时。这个方案是这些妇女定期得到可预计的收入的重要来源。它还加大了妇女的流动性，并增进了职业妇女的能见度和公信力(Khan, 2014年)。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被视为是作出积极改变的催化剂以及通过国家支助的扩大保健职业增强权能的来源。不过，应该注意到，这些工作人员的收入低于国家最低工资。

142. 巴基斯坦女保健人员在工资方面的经验完全不是独一无二的。照护行业的特点是收益相对低，并在工资上被认为是“照护处罚”。照护处罚是指照护工人的工资有系统地比需要提供类似级别技能和教育的非照护工作的工资低(Budig和Misra, 2010年; England、Budig和Folbre, 2002年)。20几个发展中国家小学教师和护士能够相互比较的薪金显示，许多小学教师和护士在2009年的薪金都接近贫穷线(Chai、Ortiz和Sire, 2010年)。对照护行业工作人员的工作规定和条件需要作出更好的监管和改善(Folbre, 2006年)。这需要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监督，但需要建立公众对这种服务的信心以及维持其适当融资的照护工人组织，并且照护使用者组织也需要发挥关键作用。

143. 在提高妇女在服务行业就业的机会的政策中，特别是增加妇女从事与照护有关的职业的政策，必须包括解决劳动力市场整体性别隔离以及这类工人工资相对较低的政策。缺乏这种政策会使妇女限于承担少数几种职业，并会加剧职业的隔离。因此，对照护行业的公共投资需要同时采取减少职业和行业隔离的政策，并改善这类工作的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对妇女开放更多的选择。要真正地可以持续，对照护需要和对性别平等采取的经济战略也必须使照护工作成为体面工作。因此，国家必须带动这种转变，从基于市场的和大都非正规的以及剥削性的“自愿”提供照护的战略转向到培育专业照护和具有体面工资的战略(社发所，2010年)。

144. 为此采取的一项重要步骤是国际劳工组织《家政工人公约》(第189号公约)。这项公约在2013年9月开始生效，在历史上首次将基本劳工权利扩大用于大约5300万家政工人，其中83%都是妇女，而许多人还都是少数族裔(劳工组织，2013年)。至今，已有14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并在其中9个国家开始生效。尽管使更多国家批准这项公约显然是优先工作，但也应该认识到，其他国家也已采取重要步骤监管家政工人并确保这些处境不利的工人得到体面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在纳米比亚，不同于许多国家，该国家家政工人受到劳工立法的监督，同样享有就业保障、周休和产假等权利(劳工组织，2013年)。不过，落实这些权利依然是一项挑战。为了解决这项挑战以及为了加快批准这项公约，纳米比亚政府在2012年设立了薪资委员会，对家政工人新的最低工资作出建议并对其他工作条件进行调查(Hammerton，2013年)。

145. 在环境服务和照护服务之间有一些共同因素。这两种服务基本上都在传统市场领域之外，但它们都越来越商业化，其市场价值也无法真正反映它们的社会价值。在一个相关的意义上，它们都是具有积极外部因素的公共商品，这些外部因素使市场机制无法在经济上有效裁定这些服务的使用状况。由于这种市场机制的失效，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受到目前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刺激下，有可能遭到过度使用。

146. 这些状况显示国家需要采取行动，对市场进行监管，以便更公平和更准确地设定生态系统服务和照护的社会价值，并提供具有公共商品性质的这些基础设施和服务并对其进行投资。不进行这种干预，市场运作就会缺少生态和照护服务，这种短缺最终会造成危机的出现。

E. 扩大绿色经济纲领

147. 正如近年来显示的多种危机，居于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对社会、环境和甚至对经济可持续性都造成严峻挑战。目前的经济模式一直局限于减少性别不平等和推动实现人权。决策人员需要沿着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能在其中相互促进的新途径推展经济和引导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项政策的目标必须是在有利的

宏观经济框架政策内，创造提供体面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及提供社会保障和具有发展前景的绿色工作。

148. 在创造绿色经济的环境中，目前推动绿色工作的努力时常忽略了向妇女提供体面工作和可持续生计的潜力。如果要扩大绿色工作机制的范围和影响，这些机制就需要更加包容妇女和更加达到两性平等。这意味着务使绿色增长政策能使妇女而特别是贫穷和边缘化的妇女更加容易在可持续的低碳产业中得到优质工作。结合绿色经济和照护经济的潜力大都未被尝试，但如给予适当的资源和支持，它能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要战略。

149. 要使这项战略能够推动性别平等和人权，扩大妇女的能力以及认识、减少和重新分配照护工作将成为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摆脱目前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需要强调通过营利机构以及各种应对人们的需要和需求而与其收入或财富无关的非营利机构参与其中的混合系统进行社会投资、生产和消费。主要优先工作是对各种公共商品作出投资，包括保健、教育、粮食、水和卫生以及可持续能源等，以及建立有力和两性平等的照护系统，以确保社会可持续性。

四. 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

A. 引言

150. 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中，实现粮食安全是其中的关键。人们有能力实现他们的食物权，喂饱自己，是今日关键之事，同样至为关键的是，未来世代也有能力行使他们的食物权。要结束营养不良和饥饿就需要集中力量于农业及粮食生产体系及其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全球和国家经济结构和政策。要达到这项目标，也需要分析具体社会关系，包括制约个人和家庭获得食物的不平等两性权力关系。

151. 自 2007 年粮食危机以来，饥饿和营养不良这两个问题又重新获得世界领导人的注意，但这种挑战根植于长期以及短期的政策失效。本章讨论粮食安全问题，认为粮食安全是以性别平等为其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部分，因为免于饥饿是一项人权，并且得到适当的营养属于一种基本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得到使生活能够充实的许多其他机会。妇女和女童的食物权尤其必须得到支持。

152. 食物权在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大会第 217A(III)号决议)中首次得到承认，并随后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见大会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中进一步得到引伸。这项国际公约重申食物权及可提供性、可获得性和可利用性这三项要素以及人人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发表的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解释了适当食物权的规范性内容(公约第 11 条)，强调了文化适当性、营养足够性和持续获得性等各项要素的重要性，并概述了国

家和国际社区在加强食物权方面的义务(见 E/2000/22 和 Corr.1, 附件五, 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

153. 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10 通过的粮食安全定义指出需要优先达到粮食安全, 系指人人随时都能从物质、社会和经济途径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 满足饮食需要和口味, 以便能过上积极健康的生活。粮食安全的四个组成部分或支柱是粮食供应; 经济、物质和社会获得食物; 粮食的使用; 和这三项要素的长期稳定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文件进一步加强了食物权(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 附件, 第 108 段)和指出“需要促进、加强和支持既可增强粮食安全, 消除饥饿, 又具有经济可行性的更可持续的农业, 包括作物种植、畜牧、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 同时保护土地、水、动植物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能力”(第 66/288 号决议, 附件, 第 111 段)。

154. 过去 20 年间虽然在减少发生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但目前在粮食消费和生产方面的趋势却对实现可持续的粮食安全的前景感到忧虑。以前形式的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状况持续存在, 而新的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形式正在出现。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影响到粮食生产, 特别是对粮食不安全的大多数家庭产生影响。同生物燃料和新的财务机制的竞争造成全球谷物市场价格波动的同时, 外国投资者对农地的需求殷切有可能使小农和牧民无法获得维持生计所需的土地。

155. 目前应优先对遏制饥饿和营养不良作出投资的辩论都局限于生产和人口之间的不平衡——或全球性短缺 - 的问题, 而不是个人无法获得质和量都充裕的粮食的问题。许多国家和全球政策制定者及研究人员都呼吁到 2050 年增产粮食 70%, 以便喂养届时全世界 90 亿人的估计人口。重点是关注全球整体状况, 而不是只关注个别国家和国家以下团体的状况。这种论点主导了公众以及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的辩论, 认为饥饿是生产短缺造成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是人口过多、战争和干旱等因素造成的, 气候变化和增加生物燃料的生产更加重了对这些因素的压力(Tomlinson, 2013 年)。

156. 粮食生产显然是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 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Amartya Sen 指出, 30 多年前, 饥饿是“没有足够食物吃, 而不是吃的食物不够”的问题(Sen, 1982 年)。粮食安全取决于是否能够得到粮食。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情况下, 粮食生产者和粮食购买者都可能不易获得粮食。必须分析难以获得适当数量和质量粮食的原因, 并据此制定关于粮食安全的政策纲领。粮食安全必须作为公共商品看待, 各国必须确保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提供这一商品。

157. 性别分析对了解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原因至为重要, 因为妇女在粮食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 食物的生产、加工、准备、消费和分配(粮农组织, 2011 年)。

然而，妇女遭到歧视，并时常在这些作用中的谈判能力有限。当性别不平等与其他各种不平等交织在一起时，歧视更得到了加强。在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中，性别关系决定了供消费之用的食物的分配和取得。性别不平等决定了生产食物所需的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取得以及家庭收入用于食物和其他粮食安全要素如健康的分配情况。性别关系还决定了改变中的市场条件对粮食生产和分配产生的后果。

158. 将粮食安全的挑战作为生产和人口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来对待，这掩盖了本地和全球粮食市场受到性别影响的复杂动态关系、家庭内的食物分配情况和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生产体系。没有妇女在粮食体系中的能动力和决策以及不认识到和克服她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受到的制约，就无法取得可持续的粮食安全。政策挑战是评估生产者对粮食安全以及重新引进人权和有权获得食物的性别观点问题的办法，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强这种观点，本章重点指出导致粮食不安全的多层面结构因素——从家庭到全球因素，其中包括两性权力关系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它提请注意作为结束饥饿的优先工作来解决这些制约所需采取的政策。

B. 粮食不安全状况：最近的趋势

1. 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况持续存在

159. 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将全球饥饿人数减少一半的目标1被认为并不十分过分。监测这项目标的进展情况显示在1990-1992年和2011-2013年期间持续下降，营养不足的人口比例²⁸从18.9%下降到12%。因此，约有8.42亿人或每8人中有1人营养不足(粮农组织，2013年c)。不过，这低估了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严重程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指出，全世界26%的儿童或每四名儿童中就有一名儿童发育迟缓——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出现的症状，营养不良破坏了儿童的心身发育。²⁹目前估计，有20亿人患有微量营养素缺乏症，例如欠缺维生素A、锌和铁(Von Grebmer和其他人，2013年a)。由营养不足和缺铁及其他微营养素造成的贫血状况影响到全世界42%的孕妇，造成孕产妇死亡和婴儿出生体重不足(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08年；儿基会，2008年)。

160. 卡路里摄入不足的总体数据反映了一年中摄入营养的平均数，因此，它没有体现各个区域、国家以及特别是国家以下群体不均衡的状况。进行粮食安全评估得到的调查数据呈现出一幅明确的图像，显示家庭难以满足它们的食物需求。这些调查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即使根据总体粮食供应量认为粮食安全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美国2012年进行的家庭粮

²⁸ 食物能量摄入量没有达到最低标准的人口比例。这项指标衡量国家一级粮食安全程度，它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设定的指标。

²⁹ 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儿童信息》，请查阅<http://data.unicef.org/nutrition/malnutrition> (2014年5月8日查阅)。

食安全调查发现，在所有家庭(1 760 万户家庭)中，14.5%的家庭报告有粮食不安全的状况，曾发生过无法向家中每一名成员供应足够的食物。而在这 1 760 万户家庭中，700 万户家庭的粮食安全程度非常低(Coleman-Jensen、Nord 和 Singh, 2013 年)。由妇女单独一人养育子女的家庭占有所有粮食不安全家庭的 35.4%，而男子单独一人持家的比例仅占 23.6%。调查显示，肤色不同的妇女尤其处于不利地位(Coleman-Jensen、Nord 和 Singh, 2013 年)。在南非，2012 年进行的家庭调查发现 22%的家庭(占人口 26%)得不到足够食物(南非统计局，2013 年)。这与粮农组织调查存在营养不足情况的指标数相差极大，该指标数显示，南非在 2010-2012 年属于这个类别的人数极少(低于 5%)(粮农组织，2013 年 a)。

161. 此外，一种营养不良的新形式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各个区域国家的紧急挑战：肥胖。肥胖作为营养不良的一种形式，时常与营养不足同时存在，来自于从本地传统饮食改为盐、糖和脂肪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饮食的缘故。肥胖会增加引起心血管疾病和许多癌症的风险。全球所有区域发生体重过重和肥胖并存的情况都在上升，1980 年至 2008 年，成人的发病率从 24%上升到 34%。儿童中肥胖的发病率上升得更快，在同一期间，从 6%加倍为 12%(粮农组织，2013 年 b)。在同一户家庭中，体重过重和体重不足的情况能同时存在，在印度和菲律宾等营养不足人数多的国家，这种情况正在上升(粮农组织，2006 年)。

2. 查明粮食不安全

162. 粮食不安全集中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两个区域合在一起约占全世界营养不足人数的 60%(粮农组织，2013 年 a)和占四分之三发育迟缓的儿童(儿基会，2013 年)。尽管南亚取得的进展至为可观，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却步伐缓慢，罹患营养不足的总人数最近才刚开始下降。

163. 不过，粮食不安全受到严重关切的国家并不限于这些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例如，危地马拉、海地)、东南亚(例如，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东帝汶)和中亚(例如，塔吉克斯坦在)的一些国家都被列入 2013 年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全球饥饿指数内属于“严重”、“担忧”或“非常担忧”的 56 个国家之中(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3 年 b)，这个指数综合衡量营养不足、儿童体重不足和儿童死亡率的状况。在危地马拉，全国营养不足的人数在 1990-1992 年至 2010-2012 年间几乎加倍，从 16.2%上升到 30.4%(粮农组织，2013 年 a)。此外，5 岁以下土著儿童的营养不良比率几乎是非土著儿童的一倍(65.9%比 36.2%)(儿基会和中央财政研究所，2011 年)。尽管在印度的调查显示，在同一期间营养不足的儿童人数下降三分之一，从 26%下降到 17%，但更详细的数据显示，男童和女童发育迟缓以及出现其他营养不足、体重不足和贫血的状况持续存在，挥之不去，影响到四分之一到一半以上的人口(粮农组织，2013 年 a)。由于国家和全球数据至为有限，这意味着有关饥饿的性别层面信息非常少(见方框二)。

164. 饥饿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估计占全球饥饿人数的 80%——小农(50%)、无土地的劳工(20%)和依靠放牧、捕鱼和森林资源维生的人(10%)(开发署, 2005 年)。粮食生产者及其子女挨饿的谬情发生在南非商业农园的女性农工及其子女身上, 她们普遍处于粮食无保障的状况。面对生产成本螺旋上升, 商业农场主对劳动力精打细算, “毫不手软地设法节省劳动力成本”; 这对女性农工能否得到有酬工作以及对她们的低工资都产生严峻影响。³⁰ 在其他各处, 妇女也受到粮食不安全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妇女都体重不足(Von Grebmer 和其他人, 2013 年 a)。饥饿与其他各种脆弱性和排斥行为重叠发生。在印度, 这集中于低阶种姓和在册部落的妇女, 她们都属于两个底层财富阶层以及生活在农村的妇女(Gillespie、Harris 和 Kadiyala, 2012 年; 粮农组织, 2011 年)。

方框二

关于粮食安全的数据：主要障碍

数据差距对性别分析以及对监测食物权的落实都构成重大障碍。例如, 在最常用的和收集的国际数据系列中,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和体重不足的比例的数据几乎都不按性别分类。在国家层面, 只对国际可比较的有限指标收集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例如体重和某些微营养素缺乏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制定了一组广泛的指标, 用于确定粮食安全的多种决定性因素(粮食供应、经济条件、实际获得、使用权、脆弱性)和成果(获得粮食、使用权)(粮农组织, 2013 年 a)。不过, 在 40 个指标中, 只有 1 个指标可被视为是性别指标: 孕妇贫血。为了评估妇女实现食物权的状况, 应该列入按性别分列的决定其粮食安全的要素, 例如妇女获得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情况、用时和决策能力。

此外, 为全球总体情况也完全制定了关于粮价和市场的经济数据: 监测和公布世界市场每月玉米、稻米、糖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这对了解总体市场状况具有价值。不过, 在很少进行前后一致的监测而对了解人们获得粮食的情况至为重要的领域, 需要有更多分类的信息, 这包括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的价格以及收入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³⁰ 例如, 见 Fatima Shabodien, “Women farm workers dying for food”, Oxfam online discussion essay series on making the food system work for women (2012), 请查阅 <http://blogs.oxfam.org/en/blogs/women-farm-workers-dying-food> (2014 年 7 月 18 日查阅)。

C. 粮食安全结构性制约和决定性因素

1. 粮食充裕的悖论

165.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饥饿都被视为是国家和全球层面供应短缺的问题。例如，1974 年举行的世界粮食大会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任何时间世界都有基本食物的足够供应，足以维持持续扩大的粮食消耗和抵消生产和价格的波动”（联合国，1975 年）。

166. 不过，即使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全球产量增加和食物价格下降的时代，依然存在着饥饿现象，这种粮食安全的观点遭到许多粮食安全和政策专家的挑战（Hoddinott, 1999 年；Longhurst, 1988 年；Sen, 1982 年）。因此，饥饿越来越被认为是分配和获得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生产和供应问题。Amartya Sen 提出的解决饥饿和饥荒的权益办法（Sen, 1982 年；Drèze 和 Sen, 1991 年）以及国际人权规范建议的办法都为基于人权解决粮食安全的办法提供了知识和道德基础。Sen 认为，即使有充裕的供应，也会发生饥荒，因为个人和家庭失去获得食物的手段（权益）。有三种获得食物的手段或权益得到确定：工资交换、自行生产和社会转让，这也适用于饥饿和营养不足普遍存在——或根深蒂固和持久存在——的情况下（Drèze 和 Sen, 1991 年）。

167. 获得良好营养的能力不仅取决于获得食物及其享用，也取决于其他各种能力，例如身体健康、拥有知识、对家庭的决策有发言权等。饥饿和营养不足取决于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到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消费和享用质和量都足够的食物。获得食物的稳定性是另一项关键因素（Drèze 和 Sen, 1991 年）。

168. 家庭收入、国家收入和经济增长是达到粮食安全的重要动力。食物花费占去贫穷线以下的低收入家庭近一半或超过一半的家庭支出。丰富的生产迫使国内供应和进口食物的价格下降。但两者之间的连接不是自动的：在丰富的悖论中，尽管有大量和越来越多的生产和收入，但饥饿和营养不良却持续存在。第 171 段至 173 段阐述的三种趋势说明了这种悖论。

169. 第一，粮食生产在所有区域都超过人口增长的步伐，³¹ 并且过去 20 年间，全世界每人拥有的粮食都有了增加。在国家层面，足够的粮食供应与出现营养不足的状况密切相关——后者是根据卡路里供应量建模的估计结果。但供应量与其他营养指标无关，包括发育迟缓（粮农组织，2013 年 c）。有足够食物能量供应量的国家可能会有严重发育迟缓的状况，例如孟加拉国、加纳和尼泊尔。这种持续存在的营养不良状况时常是被消费的食物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缘故。但这也可能反映出国内和家庭中的食物分配不均。

³¹ 设定 2004/2006 年为 100 的粮食生产指数在 2012 年为 118.0，而在 1994 年为 75.3。

170. 第二，饥饿和营养不良持续存在，后者更以肥胖的形式在美国等富裕国家以及在南非等中上收入国家上升。这种营养不良状况上升显示出家庭获得食物的能力在目前收入分配、价格水平、社会转让和营养食物的实际存在方面的差距，而营养食物的供应正越来越受到全球食品工业和超级市场链的驱动。随着人们日益依赖购买加工食品来取代传统含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多的食物，摄入的饮食正在改变。中等收入国家，例如加纳、危地马拉、纳米比亚等国，遭到曾经是最严峻的饥饿问题。这种状况在危地马拉有所恶化，其 2013 年的全球饥饿指数比 1990 年的指数更糟（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3 年）。

171. 第三，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是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但自 1990 年以来营养不足人数的减少(9 个百分点，从 24% 下降到 15%)并未与收入贫困的减少(23 个百分点，从 47% 下降到 24%)步调一致。此外，通过多国分析显示，高度贫穷与营养不足的人数多有关，但其差异很大。在考虑到发育迟缓和微营养素缺乏症时，收入多寡和饥饿之间并无关联就更为明显。例如，加纳在减少发生家庭收入贫穷和卡路里摄入不足方面都取得了快速进展。但营养不良的状况持续存在，2011 年发育迟缓的病例仍影响到近四分之一 5 岁以下的儿童，尽管这比 1994 年发育迟缓的儿童占儿童人数的三分之一已有改善(粮农组织，2013 年 c)。

172. 尽管家庭收入有了改善，但营养不良持续存在，这时常是基本健康状况和环境条件，例如没有清洁饮用水和卫生环境，以致未能善用食物造成的(粮农组织，2013 年 c)。但对结构性制约进行性别分析之后，还可能显示出其他理由，特别是有营养的食物在家中分配不均的问题(Drèze 和 Sen, 1991 年; Harriss, 1995 年)。

2. 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

(a) 性别平等、权利和能力

173. 纳入食物权和权益办法中的是能动力和平等原则。正如权益办法侧重于个人失去获得食物的手段所造成的饥饿，食物权“不是得到最低卡路里口粮的权利……或被喂养的权利。它是关于得到自己喂养自己的权利的保证……”(De Schutter, 2011 年)。人权概念中固有的观念是个人满足这种营养需要及其达到这种需要的能动力的选择。个人获得营养食物的能力因此与其能力和权利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

174. 允许将个人而非整体(例如，国家、社区、家庭)作为侧重点，人权观点就能用于粮食安全的性别分析。这能开始研讨家庭中按性别和年龄作出的食物分配、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以及社区粮食的生产、管理和决策。

175. 妇女在粮食生产和家庭食物管理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两性关系对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已有大量文件记录(Agarwal, 2012 年)。几十年来各项研究结果明确显示，妇女作为生产者在能够获得土地、共同财产资源、机械和牲畜、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及改善的投入等生产性资产方面都遭到不平等的制约(Agarwal, 2012 年; 粮

农组织, 2011 年)。“制约结构”(Folbre, 1994 年)和妨碍妇女的决策力量及控制资产和收益的不平等状况大都来自社会和经济体制, 特别是: (a) 歧视性法律、社会规范、价值观和不平等地分配权利和责任以及取得资源的作法; (b) 将无酬照护工作和无酬家庭农业劳力的重担不平等地加诸在妇女和女童肩上的性别分工; (c) 在劳动力市场限制妇女获得体面工作的性别歧视; 和(d) 基于性别的在私有和公共领域随处可见并限制妇女和女童决策力量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如下所述, 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制约在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中更得到了加强。

176. 这些妇女面对的有系统不利条件与其他基于低收入、群体特征(族裔和种族)和所在位置的不平等和排斥形式交叉存在。例如,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土著妇女在她们获得土地和住房方面可能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Hernández Castillo, 2002 年)。同样, 种姓阶层低的妇女常常受限于从事劳动力市场工资最低的工作(Harriss-White 和 Gooptu, 2001 年)。

177. 这些交叉性和结构性的不平等妨碍了妇女获得足够食物, 不论通过以下何种方式: 自行生产、通过收入购买食物的能力或有效诉求社会转让的能力(例如, 现金转让或提供实物)。除了这三条途径之外, 家庭中的食物分配情况能将女童和妇女置于不利地位——得到比男子和男童少和质量低的食物——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南亚(Harriss, 1995 年)。有力的社会规范和潜规则造成了这些家庭内的转让。然而, 问题是当这些规范和潜规则不具公平性时, 妇女无法申诉她们的人权, 因为问责机制并不存在, 并且时常也没有纠正的办法(Elson, 2002 年)。

(b) 农村生计和以性别划分的制约结构

178. 小农自行生产是世界许多地区粮食安全以及整体生计的重要来源。农业仍占南亚总就业人数的 47%(2010-2012 年)和占有统计数字的大多数撒哈拉以南国家 50%以上, 尽管这个行业对国内总产值的贡献不多(南亚占 18%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占 14%)(世界银行, 2014 年)。

179. 与高收入发达国家发生的从农业过渡到制造业(和过渡到服务业)的经典过渡方式不同, 在目前全球化的状况下, 发展中国家的制造行业无法吸收被迫离开农业的劳动力(社发所, 2010 年; Li, 2011 年)。在此同时, 小农农业作为可行的生计基础, 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导致严重的农村贫穷和人力外流。在环境退化的情况下, 时常是男子在出现困难时离家出外工作, 留下妇女耕作产量日少的土地, 同时还要维持家庭和家人的生活(Skinner, 2011 年)。沿着各种环境驱动力, 如下文所指, 这项进程中的另一个要素是政策环境的转变, 其中自由化的政策导致公共投资的撤离和对农业支持的停止。

180. 妇女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遭到长期存在的制约之外, 还同时遭到新的制约。许多制约都是系统性的, 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国家不再支持提供改善的技术、信贷、投入和市场有关。其他制约与社会结构及权力关系密切相关, 包括不稳固

的土地权利、薄弱的家中谈判地位和不能公平地取得资源和进入市场(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国际劳工局, 2010 年)。在发展中国家, 大多数农人时常在边缘化的环境中在小农场作息或工作和/或作为佃农。历史上对妇女土地所有权——通过继承、购买或经由土地改革方案 - 的体制化制约都有记录可考, 这种制约现在还在持续(Jacobs, 2010 年)。尽管没有全球性的数据能够说明在获得和拥有土地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情况, 但目前一些国家在土地所有权上的性别差异显示出世界不同地区有巨大的差距: 在尼泊尔, 妇女拥有土地的比例只占拥有土地的农家的 14%; 在中国, 70%没有土地的务农者都是妇女; 在肯尼亚, 只有 5%登记的土地所有人是女性; 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 男户主拥有的土地超过女户主拥有的土地一倍以上(Agarwal, 2012 年)。

181. 最近对三种不同区域状况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厄瓜多尔、加纳和卡纳塔克邦(印度)三地个人资产的数据, 以说明在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厄瓜多尔, 妇女占全国土地所有人的 52%, 在加纳占 36%, 在印度卡纳塔克邦只占 20%(Doss 和其他人, 2011 年)。从这些情况呈现的差异表明婚姻和继承对妇女土地所有权产生的强烈影响。厄瓜多尔有“部分共有财产”的婚姻制度, 这意味着除了继承的财产之外, 配偶任何一方在婚姻期间购买的财产均属双方共有。加纳和印度卡纳塔克邦采用“财产分开”婚姻制度, 规定在婚姻期间购买的财产归属购买的一方所有。在厄瓜多尔, 子女均可继承土地, 而在加纳和印度, 大都由男孩继承。此外, 从同样这三种情况调查的结果显示, 妇女的土地所有权与其参与农作决策(耕种何物、出售多少、使用何种投入等)的程度有关(Deere 和其他人, 2013 年)。因此, 当妇女拥有土地时, 似乎对她们生产何物以及她们是否用它满足家庭的食物需要拥有更大控制权。

182. 最近几十年间, 除欧洲外, 在所有区域妇女务农的比例一直都在增加, 在亚洲已经达到 43%(大都是男子——而非女子——放弃务农, 改在其他行业寻找工作)。妇女依赖农业甚于男子; 在 2008 年的全部劳动力中, 亚洲 57%的妇女和非洲 63%的妇女都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Agarwal, 2012 年)。更加具体地以粮食生产而言,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印度和中国的时间使用情况调查显示, 如将耗用在粮食生产、加工和准备的时间归总计算, 妇女的大部分劳力都用于烹煮食物(Doss, 2011 年)。不过, 大多数妇女都耕作维生, 并“困于低产量的周期”(Agarwal, 2014 年)。

183. 妇女作为农业生产者具有重要地位, 她们的工作对国家农产产生积极影响。许多人可能都认同“妇女生产世界 60-80%的粮食”的这种说法, 但这无法凭经验加以核实(Doss, 2011 年)。但是, 统计上的数据“掩盖了复杂的基本事实, 那就是妇女用于农业的劳动力无法与她们用于其他工作的时间清楚分别开来; 没有办法与男子的劳动力分别开来; 妇女用于农业的劳动力也没有办法得到适当了解, 除非了解她们在获得土地、资本、资产、人力资本和和其他生产资源上的差

异”(Doss, 2011年)。需要有更好的数据,这不仅是为了解女性农人对粮食生产的贡献(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重大的贡献),也为了解她们面对的各种制约,以便制定直接解决这些制约的政策。

184. 气候变化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已使依赖农业维生的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各种制约。妇女拥有土地所有权不稳定的状况意味着她们有时被迫在产量较少的土地上工作,并被排斥在农业培训之外。较少预测得到的降雨、更加频繁的洪涝和干旱以及次数更多的歉收都意味着需要对技术或肥料给予更多投资,这些都是妇女比男子更难得到的资源。农业推广服务对帮助农民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发展更能适应气候的做法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但它们对妇女提供服务的记录不佳。当农作变得更为劳力密集时,增加的工作在许多情况下都落在妇女身上。与气候有关的健康风险进一步增加了妇女的无酬工作,因为她们是家庭的主要照护者。这影响到妇女的健康和福祉,并减少了她们能用于其他创收活动的时间。随着更少资产依赖他种收入来源和得到这种资源的程度有限,气候变化对大多数粮食不安全的人而特别是妇女的影响极端不利,使其更难逃脱承担产量低的工作、贫穷和粮食不安全的困境(Skinner, 2011年)。

185. 对农家女性成员及农村、城郊和都市没有土地的劳工而言,食物权大都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工资——Sen(1982年)称之为“交换权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情况严重,妇女似乎比男子更会在工资低和没有提供适当社会保障措施的行业工作。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有酬工作,有时出于“万不得已”,这都与负债增多或家庭其他成员失去收入有关(粮农组织, 2011年)。即使在相对较新的行业,例如在拉丁美洲的智利和墨西哥以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肯尼亚和乌干达等若干国家用于出口的园艺生产部门,妇女在随叫随到的临时工中,也占了绝大部分(Barrientos 和 Evers, 2014年)。

186. 尽管妇女的收入能作出关键性的差异,使其家庭摆脱贫穷,但非正规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所具有的各种不利条件并不能使妇女拥有将其工资和收入换得体的生活标准,包括适当和可持续的食物供应。此外,对妇女控制她们的收入以及决定如何使用也有与性别具体有关的制约(Kabeer, 2007年)。如果要使这种交换权益能够运作,对监管低工资和非正规工人的薪金和收入作出努力是关键所在。鉴于地方工会在农村地区的运作范围有限,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不过,在乌干达,花卉女工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全世界妇女工作组织——的支持下,成功展开了要求提高加班费、改善工作时间和自由结社的运动,尽管由于2010-2011年通货膨胀率高,她们的实际工资依然很低(Barrientos 和 Evers, 2014年)。

187. 从性别观点而言,一个相关问题是家庭中的食物分配问题。这可能不易产生政策影响力,但减轻对粮食不安全的家庭的压力,不论是否通过给予一般性收入支助、食物津贴或学校餐点方案的办法,它都能减轻家庭中在分配食物方面性

别偏见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反，当家庭无法获得充足食物时，这种偏见可能会得到加强，对妇女和女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会产生严峻后果。因此，在目前食物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削减食物津贴作为紧缩措施的一部分，这种作法令人深感忧虑(Hossain、King 和 Kelbert, 2013 年；妇女署，2014 年)。政府和民间社会应进行一项范围广泛的工作，促使大家认识到妇女和女童的食物权，并增强她们诉求这项权利的能力，在家庭分配食物时，要求不受性别偏见和歧视。

188. 上述这些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制约，结合下节讨论的粮食体系和市场的变革驱动的新挑战，将在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各种情况下，影响到粮食不安全的人和家庭。不过，它们将对小农造成特别严峻的影响，正如已经指出的情况那样，这些小农也是粮食不安全人口中最大的群体。

D. 新出现的挑战：全球粮食体系

189. 二十一世纪的粮食生产和分配体系与上世纪的体系明显不同，对粮食安全而特别是对贫穷国家的贫穷家庭构成新的威胁，这时常会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后果(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1 年；von Braun, 2014 年)。

190. 发生中变化的第一个理由是全球市场已经发生巨大变化。1970 年代、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呈现了丰富的生产和低廉的国际粮食价格，而目前的情况则是上升和起伏波动的世界市场价格以及对生产的各种制约。对农业提供的发展援助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急剧下降，这种下降到 2000 年代才停止。在此同时，国际金融机构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减少国家在农业和农业研究的投资范围。这已造成收成低特别是热带农业收成低的现象和土地产量的下降。在同一时间，更开放的贸易机会和农人提高市场走向已促使放弃种植更适宜本地生态和社会条件的粮食作物，而改种需要购买投入的经济作物。在农业投入的公共供资减少的情况下，农人特别是女性农人只能听任种子和肥料大公司、销售商和放款者的摆布(Ghosh, 2010 年)。这些因素已经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农业危机。

191. 自 1970 年代以来享受了几十年的低价以后，世界粮食价格从 2000 年代初开始上升，并在 2007-2008 年期间快速达到顶点。虽然国内价格并不一定反映国际价格的趋势和价位，但 2007-2008 的价格飙升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粮食价格的快速上升(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1 年)。世界市场价格的增加因此威胁到贫穷家庭的粮食安全。例如，2011 年各种基本谷物的价格都有上升，这意味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购买每公斤麦子的成本加倍，从大约 0.15 美元上升到 0.30 美元——这对每日以略多于 1 美元过活的人来说，存在关键性的差异(von Braun, 2014 年)。在贫穷国家的贫穷家庭中，食物是一笔大开支。在亚洲和非洲有数据的国家中，在 2007-2008 年危机以前的 2000 年代初期，食物开支一般占支出的 50% 以上(例如，肯尼亚占 76%、巴基斯坦占 75%、菲律宾占 63%)，而西欧和北美占 10% 到 25% 之间(例如，法国占 24%、美国占 18%、荷兰占 11%)(粮农组织，2013 年 a)。

192. 尽管在理论上，高价格能增加收入和刺激生产，但在现实生活中，当农人缺乏必要的投入和资源时，他们难以能够对这种价格刺激作出反应。此外，高价格也不会轻易推倒农作门槛。家庭通过各种方法作出调整，以适应购买食物的能力的下降，包括改买较便宜和种类较少的食物，而这类食物时常欠缺对孕妇和幼童至为重要的基本维生素。对有数据的 11 个国家的研究显示，在 2007-2010 年期间，其中 8 个国家营养不良的人数开始增加或营养改善的情况趋于减缓(von Braun, 2014 年)。妇女扛起解决粮食不安全的沉重负担，时常为了其他家人减少她自己的口粮，并使用更多时间准备和加工食物，这又加重了她们无酬照护工作(Quisumbing 和其他人, 2008 年)。粮农组织估计，2007 年至 2009 年间，营养不足的人数约增加了 1.73 亿人(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 2011 年, 第 11 页)。

193.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全世界的生产能力，从而影响到产量和价格。各项研究一致指出对最脆弱环境中的农人产生的各种极端不利后果(Nelson 和其他人, 2009 年)。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2 年)指出，粮食安全的脆弱性既源于生物物理因素，也源于社会经济因素：“以前就存在的脆弱情况在社会、经济和农业环境状况随着气候变化而更趋严重时，使穷人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1975 年以来，各种灾难已经夺走了超过 220 万人的生命，而与气候有关的暴风雨、洪水、干旱、热浪和其他与天气有关的现象占灾难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的三分之二(联合国, 国际减少灾害战略(秘书处), 2009 年)。

194. 温度上升、降水模式改变和极端天气事件都会增加歉收、减产和虫害肆虐及杂草丛生的可能性。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进行的状况研究作出预测，大多数粮食不安全区域的麦子和玉米都会大幅歉收和减产：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Nelson 和其他人, 2009 年)。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 40% 以上的世界人口和 6.5 亿以上最穷和粮食最不安全的人住在这里 - 的旱地农业，特别易受气候变化和变异尤其是旱灾影响。在世界一些地区，大量农业生产是在目前人口密度高的低洼沿海地区进行。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是盐水入侵、海平面上升和洪水增加(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 2012 年)。假设不对气候适应作出投资，到 2050 年，儿童营养不良的人数可增加 20%，抵消了前几十年取得的成就(Nelson 和其他人, 2009 年)。这些后果可能对女性小农特别严峻，因为她们最不具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大部分是由于她们在得到信贷、信息和促进采取适应性生产战略的投入等资源方面所遭遇的制约(Agarwal, 2012 年; Quisumbing 和其他人, 2008 年)。

195. 气候变化以及高收入国家减缓排放的要求已导致生物燃料工业的兴起；生物燃料的生产自 2000 年代初以来，已经急剧增长。例如，在 2000-2002 年至 2007-2009 年期间，美国和欧洲联盟(欧盟)的乙醇产量增加了 5 倍多，巴西也翻了

一倍以上。尽管欧洲联盟、美国、巴西、中国和印度是生物燃料的最大消费者，但生产主要在美国和巴西两国，它们的合并产量占全球乙醇供应量的 75%，而欧洲联盟利用油菜籽生产大约 80% 的生物柴油。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 (2011 年) 指出，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大规模的公众支持：津贴、减税和在汽油中强制添加使用，[这]在 2009 年……在欧洲联盟和美国达到约 80 亿美元，——而同时它们减少了本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以及它们对贫穷国家的海外援助”。

196. 导致这种改变的第三个因素是粮食作为全球贸易的商品，已经结合到更加复杂的金融市场，它不仅与燃料密切关联，也与金融市场的其他力量交织在一起。2007-2008 年的价格暴涨与 2008 年的燃料和金融危机有关。尽管它们不是推动价格的唯一因素，并且供求的转变也解释了许多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向上压力，但许多人认为，投机活动也可能在推动一些商品价格暴涨方面起到作用(Ghosh, 2010 年；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1 年)。

197. 这种现象的第四个方面是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环境发生了不均衡的转变。在二十世纪，通过各种政策干预措施、公共投资和价格支持及稳定措施，包括保持储备库存的方式，全世界生产者得到本国的国家支持(De Schutter, 2011 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作为自由化和结构调整措施的一部分，取消了这些干预措施。不过，农业政策的转变在经合组织国家并不剧烈，这些国家继续维持对其农人的支持结构。发达国家惠及农人的出口津贴和农作收入补助压低了世界市场的价格和对贫穷农人及贫穷国家造成不公平竞争。这种市场压力可对粮食安全造成特别严峻的后果。

198. 1994 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和一系列多边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对本国农业补助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农业协定中对扭曲贸易的本国补助措施施加限制的规定一直争论不断。发展中国家一直对这些规定提出质疑，指出这些措施与粮食安全和减少贫穷的目标大相径庭(De Schutter, 2011 年)。这项争论在 2013 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九次部长级会议达到顶点，小农人数众多的 33 个发展中国家提出一项改革这些规定的提案，要求同意政府能以合理的价格向本国生产者购买用于公共储备的粮食。

199. 导致这种改变的第五个要素是，在世界粮食市场波动加剧和价格上升的刺激下，时常被称为“圈地”的对农业土地的投资，自 2006-2008 年粮食和商品价格上涨以来，一直快速增加(Borras 和其他人，2011 年；GRAIN, 2008 年)。投资者包括外国金融实体，例如对冲基金和分散投资组合的退休基金等，以及旨在保障人民粮食供应的各国政府。这些投资一直是 1990 年至 2007 年间发展中国家每年开拓约 550 万公顷耕地的重要因素(Deininger 和 Byerlee, 2011 年)。它们使贫穷和边缘化的农人以及牧民难以保有他们的土地，并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他们失去土地。这些农人，特别是妇女，拥有的土地权大都不稳定。他们可能世代都在这

些土地上耕种，但由于没有登记或土地权属不明，时常被解释为只有使用权(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国际劳工局，2010年)。对农业土地的大规模投资可能积极惠及国内总产值的整体增长、国家粮食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它们也可能为农业部门打开新的市场和促成新的技术，这种作用也可能惠及小农(Deininger和Byerlee，2011年)。然而，显而易见，它们对失去土地处于边缘化的农人产生的后果似乎至为不利。此外，近代和历史的经验持续提供了失去土地对妇女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教训：对重新安置计划缺乏作出决策的力量；歧视性竞争；不得使用她们极度依赖的共有财产资源；和她们的福祉和地位普遍恶化(见方框三)。

方框三

“圈地”造成的性别效应

虽然各国一直以发展为名，使农村人民放弃他们的土地，但所谓的“圈地”现在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注意。在全球层面的圈地行为正在增加；它们正在改变性质；并正在产生重大的政治反对意见。估计数字显示，在1980年至2002年间，中国有5 000万人至6 600万人失去他们的土地，在印度，自1947年以来，约有6 000万人失去土地。过去20年间，这种失去土地的速度正在增加，占世界不拥有土地的人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不拥有土地面积的人的绝大多数)。在二十世纪，大部分“发展导致的流离失所”都是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造成的，包括公共部门的水坝、矿场和重工业。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国际农业综合企业、金融资本和外国都在购取大片农业用地。

对全世界若干圈地和占地的个案进行研究之后显示，由于排斥和性别不平等，大都只能得到少量和有限的成果。在有发展项目的情况下，失去土地的消极后果经常发生，而不论项目类别和社会状况为何。首先，在研究的个案中，没有一个妇女对项目的规划或谈判重新安置和复原方案的细节有任何决策权力。第二，歧视性的补偿和重新安置几乎普遍表明妇女没有拥有土地的权利，或在她们实际拥有这种权利时，破坏这种权利，而将赔偿的土地或地块分配给家中男性户主。除了土地之外，国家也将其他形式的赔偿，不论是现金或工作，交给男子，从而破坏了妇女对分配所得的影响。第三，在大多数农村环境中，由于妇女的工作和收入最依赖公共财产资源，她们受到圈地的影响最大，这破坏了共有土地，导致牲畜的丧失。第四，尽管失去土地和家庭暴力和酗酒之间的因果关系仍不十分明了，但几乎在所有关于流离失所群体的研究中，都可观察到家庭暴力和酗酒这两种状况的增加。第五，由于失去土地导致人们非自愿地离开土地，国家时常使用暴力推动项目的进行，这造成妇女的身体安全处于特别危险的状况。发展导致的流离失所的记录充满着性暴力和警察、军队和雇用的打手侵犯人权的劣迹。最后，在所有案例中，妇女普遍认识到失去土地对她们的福祉构成或最终造成的威胁，并在公开和秘密反对圈地的行动中发挥重

要作用。

尽管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后果对男子也普遍不利，但总体而言，不论妇女的劳动力处于边缘化或在失去土地之后更易遭到剥削，在所有案例中，没有一个妇女的福祉和社会地位由于她们放弃土地的发展项目而有所改善。事实上，在家庭中和家庭外与妇女工作有关的性别和社会关系的歧视程度似乎都在增加。

这指出迫切需要维持和捍卫民主决定的公共商品的定义，限制强迫取得对穷人而特别对贫穷妇女有普遍利益的公共项目所需的土地并将事先和知情的同意作为需要土地的私有项目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这种同意必须得到受影响群体每一名成员的认可(包括没有正式土地权的人)，而不是只得到家庭户主的同意：这也有助于确保只有妇女能够预期会得到好处的项目能够得到进行。

资料来源：Levien，2014年。

E. 国家为保障食物权作出的努力

200. 尽管认识到全球环境对实现食物权造成不利，但发展中国家政府确有政策选择可选。对本国政府而言，当促进食物权的政策可能与宏观经济目标和国际贸易规则发生冲突时，要优先关注人权就需作出各种困难的选择。(De Schutter, 2011年)。食物和营养政策部门对一些优先促进作为公共商品的粮食安全的核心政策达成广泛协议：(a) 改变对农业投资的不足并对小农给予补助，例如，推动研究和推广服务，并确保它们惠及女性农人；(b) 在获得土地和农业服务方面排除性别歧视；(c) 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措施，以加强家庭购买力；和(d) 作出社会投资，改善健康和营养，特别是妇女的健康和教育，并从而改善营养。如下所述，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增加制定加大政府干预的措施。

201. 目前，大家普遍同意，政府需要对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作出投资。落实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指出，国家层面增加粮食体系复原能力的政策也极有可能促进对气候的适应，认为增加用于适应措施的开支最好针对增加可持续粮食安全的全面开支，其中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特殊挑战给予特别关注。这种办法与特定地区特别有关，应该运用农人包括女性小农的知识。高级别专家组(2011年)已经指出，“没有小农的参与和发起，就没有环境上可持续的农业”。

202. 推广服务常常未能有效地针对妇女，这需要彻底加以改革，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结合女性农人的具体关切，并推动知识和良好做法的交流。各国政府也应利用这个机会排除妇女获得信贷和微额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障碍，使她们能够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为保证获得食物改变耕作方法(落实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

组，2012 年)。社区层面的良好做法，包括改善水的管理，例如建造更高效的灌溉和水的收集、储存及使用系统；采用维护土壤湿度、有机物质和养分的做法；和建立社区种子和谷物银行。例如，在马拉维，若干社区的女性小农已经发展出克服食物严重短缺的战略。她们利用符合生态的耕作技术，使她们能够运用改变中的降雨季节种植第二季玉米作物(Skinner, 2011 年)。

203. 在试图推动可持续的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做法时，需要调动妇女的能动力和知识。妇女促进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变革组织是一个横跨 83 个国家的全球性专业人员和农人网络，它为这项工作如何进行提供了一个重要例子。这个网络专门致力于加强妇女获得资源和控制资源和使两性平等纳入农业政策。它在社区一级工作，但也致力于使国家政策、方案和体制更符合农村妇女的需要和潜力，并将她们更有效地结合到政策的设计、执行和监督。这类性质的论坛至为重要，因为研究显示，轻易认定女性农人的利益完全符合地方和国家层面关于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的政策会是一种误导(Agarwal, 2014 年)。因此，妇女参与审议政策选项是关键所在。

204. 提供价格支助和投入补助以稳定生产和收入、管制基本食品价格以控制家庭食物开支以及利用政府食物储备以缓和价格波动等措施都是发展中国家常用的措施，但在 1980 年代推动农业自由化方案后，现在已经停用。不过，最近在一些国家已经重新考虑采用和修订这些措施，将其作为减少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政策工具，其中许多经验都已取得积极成果。

205. 例如，发展中国家在 1980 年代大都停止提供作为结构调整改革的一部分的肥料和种子投入津贴。批评这种津贴的论点指出，它们扭曲了价格，时常产生负面的分配效应，惠及富裕的生产者和农业企业。不过，最近的各种辩论导致在 1990 年代后期开始转变方向，开始提供更具针对性和能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惠益的“巧”津贴(Tiba, 2011 年)。加纳、肯尼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最近已经采用了新的投入补贴方案。

206. 另一种逐渐获得重视的政策是由政府向小农进行采购，以解决他们在进入市场和获得公平价格方面受到的体制性制约，而女性农人遭遇的这类制约特别普遍。这类政策同时向学校、医院、食堂等各种社会方案提供质量更高的食材，并有助于利用新鲜农产品制作各种餐饮。这是印度在 2013 年启动的新的粮食安全政策的关键部分。巴西广泛利用这种政策方针作为该国 2003 年以来执行的全面粮食安全政策(“零饥饿”计划)的主要内容，这项政策已经持续减少了农村地区而尤其是女性持家的家庭的饥饿状况。这项方案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若干国家得到仿效实施。

207. 建立公共粮食储备是二十世纪采用的粮食安全政策之一，但在 1980 年代推动的结构调整改革中，大都不再实施。批评者认为，这类政策效率不高、成果不

彰、管理费用昂贵和手续复杂，并且扭曲了能对更有效地抵消供应价格波动的私有储存的刺激措施。不过，大家也普遍认识到，粮食储备一直对稳定价格和刺激农业增产至为有效(粮农组织，2011年；Crola，2011年)。亚洲许多生产稻米的国家长期使用缓冲库存以及垄断性的进出口和公共采购机制作为稳定价格的补充工具。不久之前，布基纳法索、印度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已经采用了有效的库存方案(Crola，2011年)。此外，目前还在讨论将国际粮食储备作为抑制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暴涨的机制的提案(Wright，2012年)。

208. 通过社会转移(例如，通过政府直接提供补贴食物等实物转移的办法)是使拥有足够的食物的权利得到保证的另一种机制。小农和佃农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如果气候的快速变化没有完善的相应社会保护措施的配合。许多政府在农村和城市都提供食物津贴，以增进粮食安全。担心粮食可能遭到浪费和津贴可能“漏到”并不穷困的人已导致对这些方案重加考虑，有时还认为应以现金转让来取代这些方案。尽管现金转让可能在管理上易于处理，但缺点是在食物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这种现金转让的购买力随之下降。从性别观点而言，另一种担忧是这种现金转让可能用于家中其他优先项目或需要，例如烟酒等用品。特别为了确保女童和妇女的粮食安全，直接提供负担得起的食物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是针对居住在新德里贫民窟的女性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强烈表示的愿望(Ghosh，2011年)。

209. 巴西的经验在这方面再次具有指导作用。受到讨论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采购、粮食储存和价格补助，都是“零饥饿”计划的要素。这些要素加强每一项权益(生产、交换和转让)，使家庭能够通过这些权益获得粮食。这项方案还支持小农信贷、投入和其他资源、现金转让(大都针对妇女的家庭补助金方案)和政府从家庭农场采购、增加社会投资和自2003年以来已经增加超过一倍的最低工资。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中，粮食安全都是这些政策的优先工作，包括巴西的贸易政策以及在多边政策论坛上的立场。

210. 农业协议对国家农业补助措施作出了规定，并根据一组复杂的准则，设定了最低允许水平的“贸易扭曲”措施。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对发达国家比对发展中国家宽容。发达国家仍对农业提供大力支持，这显示政府提供大量不属于贸易扭曲因此允许提供的津贴(Demeke和其他人，2012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定强有力的粮食安全政策受到更大的制约，造成这种制约的理由部分是因为农业协议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制定的，当时发展中国家都受到鼓励，将其农业部门自由化以刺激生产。贫穷国家和家庭的粮食安全不是主要关切事项。许多补助措施都属于“灰色地带”，并且采取这些措施和可能遭到诉讼的贸易后果都使这些国家处于不确定情况(De Schutter，2011年)。

211. 除了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造成整体负面效果之外，这些贸易措施也与终止高到无法令人接受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明显不一致。支持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发展中国家小农的产量能有助于实现实现这项目标(De Schutter, 2011 年)。第二个重点是全球贸易规则中的不平等状况, 其中提供给欧盟和美国农民的收入补助没有遭到像提供给印度消费者的津贴同样的限制。在价格被压低和生产丰富的年代, 贸易规则配合了发达国家用于压制生产的各种措施。对这些措施需要作出改变, 以满足二十一世纪的需要, 这个世纪的挑战是高昂的价格以及气候变化、造成污染的技术以及对燃料的争夺对产品可能产生的新压力(De Schutter, 2011 年)。

212. 食物权依然是一项尚未兑现的人权和一项迫切的全球挑战。粮食安全政策应解决人们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无法获得食物的结构性原因。通过供应驱动的框架不能适当解决使妇女和女童无法通过多重渠道——不论是通过自行生产、收入/食物交换、家中分配或社会转让——获得足够食物的结构性不平等。在可持续发展中关于粮食安全的新纲领需要重新关注人们对拥有公共产品和对决定能否获得食物的关键问题的能力和权利。如果可持续发展将性别平等作为其中心议题, 则获得和权利这两项问题以及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制约它们的结构性力量必须得到彻底解决。如果要使这项进程获得成功, 妇女的能动力、领导力和决策力将是关键所在。

五. 人口、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

A. 引言

213. 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中, 人口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人口的增加和减少、都市/农村的位置、迁徙、性别和年龄的组成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健康、环境和今世后代的前景产生影响。人口的各种动态能大大地影响到是否实现社会正义和达到两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议题引发了有关人类与自然之间、男女之间、老少之间和贫富之间关系的各种辩论。人口政策时常是妇女健康、生殖和性问题的核心。人口模式常常使过多的人口陷于贫穷; 是人口增长造成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匮乏以及穷人进行不当管理的原因; 和将减少妇女生育连接到减轻气候变化或防止环境破坏(开发署, 2011 年)。

214. 在一个气候变化、金融不稳定和日益不平等的年代, 人口过多成为一个重要的关切事项。人口增长确实影响到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过, 将人口增长作为主要关注重点会转移对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和程度的注意, 特别是各国之间和本国国内资源分配和消费程度上的巨大差异。人口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与具体情况有关, 并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左右。

215. 严格地说, 将人口过多视为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 这常会导致采取不妥的政策措施, 特别是从性别平等的观点而言。采用胁迫性手段减少生育率的人口

政策损及人的福祉、尊严、个人身体完整性和自主性并且不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1994 年以来，全球政策和规范框架都有了重大改变，已将妇女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视为人口和发展政策的基础。《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⁹ 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² 及嗣后审查会议的成果都确认性保健和生殖保健以及生殖权利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最近 20 年对《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进行的审查进程着重指出，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以人权、不歧视、性别平等和性及生殖保健和权利为其基础(见 A/69/62)。

216. 要达到人人实现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目标，就需要制定政府落实它们作为责任承担者的义务和个人诉求其权利的新社会契约。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包括人人有权得到关于性、关系、怀孕和安全分娩等问题的关键信息、教育和服务。这包括承认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权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子女数目、间隔期间和怀孕时间并有作出这项决定的信息和手段。妇女的人权包括她们有权控制和自由及负责任地决定与其性生活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有关的事项，而不受胁迫、歧视和暴力。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包括在整个生命周期有权得到优质的性和生殖保健服务，其中包括安全和有效的计划生育方法和紧急产科护理以及承认妇女和男子有权获知和获得他们选择的安全、有效、负担得起和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³² 推动这项纲领遭遇的阻碍包括充斥在大众媒体、环境教育以及卫生、保护环境和气候领域的政策辩论和决定中将人口增长与环境退化连接在一起的各种论述。这些论述影响到目前人口动态与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政策设计有关的方式。

217. 本章探讨就人口过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的各种辩论，并促使决策人员不要受到人口过多这种模式的限制，以便对造成全球各种问题的复杂相互关系取得更好的了解。这意味着对造成环境挑战的最大驱动力作出回应，包括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及程度，并坚定地将可持续发展与人权结合在一起，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

B. 人口动态

1. 目前的人口状况

218. 今天的人口状况即使与 50 年前的人口状况相比，都非常不同。世界人口在二十世纪几乎增加四倍——从 1900 年 16.5 亿人增加到 2000 年约 61 亿人(联合国，1999 年；2001 年)。不过，这种被称为“人口爆炸”的趋势现在正在趋缓。世界人口的增长率自 1960 年代末期以来持续下降，出生率的下降远比预期的速度快。人口较少的家庭正成为全球的常态。

³²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6.IV.13)，第四章，决议 1，附件二，第 96 段和第 97 段。

219. 目前,依照《世界人口前景:2012年订正本》的数字,³³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以总和生育率计算的每名妇女平均生育数估计为2.53(联合国,2013年c)。这个数字没有呈现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9个国家,其总和生育率超过4,其中10个国家:安哥拉、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索马里和乌干达的总和生育率超过6。³⁴不过,其中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特别是在都市地区。其他国家,主要是东亚和东欧国家,其生育率已远低于每名妇女生育2名子女的更替水平生育率。不过,由于人口惯性³⁵的缘故,其中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尚未下降,但如日本等一些国家却是人口转型最快的国家(Fischer,2014年)。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更替水平生育率低的75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48%(联合国,2013年c)。

220.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全世界人口经历了巨大差异:“与生育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相关的人口变化,加上人类活动的轨迹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给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和分布空间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A/69/62,第760段)。

221. 《世界人口前景:2012年订正本》估计,2014年目前的世界人口约为72亿人,将在2025年达到81亿人,2050年达到96亿人和2100年达到109亿人。这些都是采用最通用的中位变差预测计算的结果。这次预测的全球人数比前一份2010年订正本预测的2100年将达101亿人的数字高,这主要是因为调高了一些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预计生育率(联合国,2013年c)。

222. 年龄结构发挥了作用。在人口组成中,大量生育年龄的人会产生人口惯性——有子女的人多于老年人。今天,以发达国家总体而言,23%的人口已经达到60岁或超过60岁,其所占百分比已经超过人口中年龄在15岁和15岁以下的人数(联合国,2013年c)。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较年轻,人口惯性因此比较大,但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他们也越来越多会面对人口老化的现象。

223. 世界人口可能会增长到大约110亿人的预测已导致各方呼吁需要对计划生育作出更大投资,以减少人口增长(联合国,2013年c)。不过,狭隘地关注避孕和计划生育问题就忽略了人口在向低生育率转变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

³³ 平均子女数是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妇女在其生殖期间结束时生育的子女人数:在其整个生命期间生育的子女符合特定期间的生育率以及没有面对过死亡的危险。表示这种生育率的方法是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联合国,2013年c)。

³⁴ 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4年),人口司,人口估计和预测科 <http://esa.un.org/unpd/wpp/Excel-Data/fertility.htm> (2014年6月16日查阅)。

³⁵ “出生率和死亡率未能达到平衡的状况在许多面临人口惯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明显。这种现象在国内大部分人口达到育儿年龄时就会发生。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达到更替生育率,即夫妇只生育足够取代他们死亡时的子女数目,但在几十年间,出生人数的绝对值仍将超过死亡的人数”,见 www.worldbank.org/depweb/english/modules/social/pgr/index02.html (2014年6月22日查阅)。

素的复杂相互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应建立在广泛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以及性别平等的框架之中，而不仅仅是关注生育率的下降。

2. 人口动态

224. 年轻和老年人口是人口动态，能引起重大的政策辩论。儿童和年轻人占全球南方国家的大多数，年龄在 15 岁以下的儿童有 17 亿人，年龄在 15 岁至 24 岁的年轻人有 11 亿人，这是历史上全球最大的年轻人组成。年轻人在被视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包括马里、尼日尔和索马里，这些国家也有最高的人口增长率(联合国，2013 年 c)。

225. 全球南方国家年轻人口暴增预期会产生世界范围的重大社会改变(A/69/62)。两种理论——人口红利和青年人口暴增——主导了年轻人将如何影响经济、政治和国际安全的学术讨论及政策研究。人口红利概念认为，人口中年轻人多可在适当条件下，包括加强年轻人的教育以及采取支持开放贸易的经济政策的方式，创造经济增长和发展。人口政策将是实现红利的关键工具，因为它影响到生育率并为受抚养的老年人和儿童创造了大量工作年龄的成人。

226. 相反，年青人口暴增理论预测，人口中年轻人增多将易于产生不同严重程度和剧烈程度的暴力和动荡。Urdal(2012 年)认为，青年人口暴增产生暴力并非必然是必然的结果，但这可归咎于人口压力与年轻人缺乏就业机会、资源和教育机会相结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通过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减轻或化解青年人口暴增造成的冲击。

227. 这种将青年人口视为或是红利或是暴增的二元理解导致将年轻人视为一个单一无差异的群体采取政策措施，而不认识到他们的不同。认识到年轻人之间不同的经验和愿望并尊重这种差异是设计能够实现人权和能力的政策的必要条件。

228. 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不同老龄人口的差异。人口老龄化正在在全世界各地发生，人口中的老年人增多，而年轻人减少。这种现象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例如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联邦等国，这些国家的老年人人数超过年龄不足 15 岁的人数。《世界人口前景：2012 年修订本》指出，到 2050 年，发达国家的老年人数目将比儿童数目约多两倍(联合国，2013 年 c)。发达国家日益下滑的生育率，加上老龄化的人口寿命变长，大家开始对经济停滞感到恐惧，认为未来将缺乏工作年龄的成人，而保健费用又将增加。老龄化的人口时常被视为是对国家经济的掣肘。

229. 大部分人将“年龄变老”的人口与经济下滑结合在一起，这忽略了老年人作为有酬工人和无酬工人——包括在照护经济中的无酬工人——以及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所能发挥的多种作用。老龄化人口作为国家经济的掣肘，加上对其规模和长寿的警惕和退休金的稀缺，这种说法已被发达国家作为将退休金私有化的

理由。不过，退休金私有化大都是由打开新的市场和增加资本流动的机会推动的。Minns 和 Sexton(2006 年)指出，“如果太多老年人是一种危机，那么目前和未来太多老年穷人就是这个危机。利用退休金供资发生的问题主要不是人口的改变，而是失业、低工资以及收入的分布从工资转到利润的缘故”。

230. 在此同时，人口老化还提出了现有照护体系(有酬和无酬照护)是否足够的迫切问题，特别是当他们微薄的储蓄和退休金无法使他们得到市场提供的照护服务的情况下。妇女在这个群体中的人数超过比例，因为她们的预期寿命一般较长、储蓄较少和获得缴费退休金的机会有限以及她们大都同比她们年纪大的男子结婚或同居；这意味着妇女更可能照护她们的配偶，而不太可能在她们年老时得到她们配偶的照顾(Abe, 2010 年; Arza, 2014 年)。在家庭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独居家庭和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老年人居住的家庭的比例增加)以及有时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力参与情况增加)，决策人员需要建立适当的照护体系，例如日本实施的长期照护保险系统，这个保险系统已经对减少家人——特别是女性配偶和女儿——提供长时间的无酬照护产生了小而重大的影响(Abe, 2010 年)。

3. 人口结构转型和计划生育

231. 人口结构转型是一种降低死亡率后随之减少生育率的进程。两者减少之后终将导致人口之中儿童人数的比例变小和老年人的比例变大(联合国, 2013 年 d)。人口结构转型的这种进程，由于自然增长，会导致人口经历一段人口增长的期间，并随之产生都市化和人口老化的进程(Dyson, 2010 年)。

232. 尽管人口学者最初认为，工业化将使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到 1960 年代，他们开始认为贫穷国家的快速人口增长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开始将生育率的下降视为顺利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而非工业化的后果(Hodgson, 1983 年; Szreter, 1993 年)。在这种情况下，从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出现了计划生育能够导致人口结构转型的政策措施。

233. 计划生育与人口结构转型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产生了一些进行人口控制的理论，包括对计划生育进行投资远比进行其他发展战略更符合成本效益的看法(Connelly, 2008 年)。计划生育方案和避孕药具作为许多影响生育下降的时机和速度的直接因素之一发挥了作用。不过，广泛的背景因素，包括即使在同一个区域内的各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都会影响到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形式和时机，而非只是计划生育的结果。

234. 死亡率的下降也要从性别的观点来看待。妇女和女童与男子和男童相比，她们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比在富裕国家更易死亡——女童和 60 岁以下的妇

女死亡人数约多 390 万人。³⁶ 在这多死的 390 万人中，五分之一女童死于婴儿期，五分之二女童和妇女死于生殖年龄和约五分之二死于产前性别选择的女胎流产(“失踪女孩”)，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在受到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国家，这个数目还在增加(世界银行，2012 年)。

235. 造成孕产妇死亡的原因至为复杂，并且各个地区情况各异。2003 年至 2009 年，73% 孕产妇的死亡都由产科原因直接造成(例如，出血、高血压疾病、败血症、栓塞)，包括 8% 由于不安全的堕胎造成的并发症导致的死亡，27% 由非产科原因造成(例如，与艾滋病毒有关、产前存在的医疗问题等)(Say 和其他人，2014 年)。因此，尽管计划生育是减少孕产妇死亡率的措施之一，但仍需采取更广泛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的政策纲领，包括获得优质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

C. 人口和环境：政策和后果

236. 对人口过多的关切是对可持续发展和政策应对措施进行的各种主要讨论的中心议题。这些关切讨论了对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关系已经证明有显著复原力的以前理论和模式。在这些概念中包括了与第一章讨论的“承受能力”有关的地球承载极限、与管理公共资源有关的“公地的悲剧”和穷人造成环境破坏的退化问题。

237. 有若干理由不断关切人口过多的问题。首先，即使历史证据已经证明这些论证的谬误(Ostrom, 2000 年; Boyce、Narain 和 Stanton, 2007 年)，但人口过多模式预测人口过多将对未来造成人口导致的资源稀缺。由于可持续发展采取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观点，这种预测有引人之处：它们似乎揭示了人类的前途。

238. 第二，人口过多论将饥饿、贫穷、环境退化以及甚至战争都视为是太多人追逐太少资源的必然后果。通过避免就资源的使用和控制进行政治谈判、竞争和冲突的方式，这种理论能将有力的实体和既得利益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嫁到穷人身上。

239. 第三，这些理论运用并加强了具有主导地位的关于妇女和男子的陈规定性观念。妇女问题只与繁殖人口的问题有关。在有些情况下，妇女的能动力受到承认，但范围有限，这种情况只有在开明的管理人员顾及自身的育儿率和本地环境时才会注意。两性权力关系以及妇女相互之间基于其他因素出现的差异大都遭到忽视。

240. 人口动态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下面提出的各种理论的问题是它们都忽略了这种复杂性，将人口动态简单地变成为胁迫性措施和狭隘的政策措施进行辩

³⁶ “某年女性多死的人数是指，在考虑到她们居住的国家的整体卫生环境之后，如果她们在前一年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就不会死的人数”(世界银行，2012 年)。

护的抽象法律运作。分析人口理论是为采取更有效的政策，重新思考性别、人口、动态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第一步。

1. 对人口、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问题的观点

241. 连接人口、贫穷和环境退化之间关系的论述在二十世纪末的政策辩论中日益受到关注，并对可持续发展领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些人口过多理论导致的主要后果是促成制定减少妇女生育的政策，包括在有些情况下，采用胁迫性的人口控制措施。尽管现在全球政策框架认识到人口政策必须以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为基础，但长期存在的对人口过多问题的关切继续影响着只关心减少妇女生育的人口政策。

242. 退化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人口压力加上贫穷是造成土地退化的主因。换言之，穷人应对破坏他们自己的环境负起主要责任(Fairhead, 2001年; Hartmann, 2010年)。这些论点都根植于殖民政策，这些政策为征用土地作出辩护，谴责当地采用的耕作办法和人口压力造成水土流失、砍伐森林和土地沙化(Fairhead 和 Leach, 1996年; Adams, 2004年)。之后，这些政策又被用来为外来干预作出辩护，例如自上而下地实施农村发展项目和人口控制方案(Williams, 1995年; Roe, 1995年)。

243. 退化的论述已经扩大到将对移徙的消极观点包括在内。这种观点认为，穷人在耗尽他们周围的环境之后，许多穷人移徙到其他贫瘠土地，继续推动相同的恶性循环。1990年代以来，这种观点包括了涌往已经拥挤不堪的城市的穷人以及最近所谓的气候难民——新的环境难民(Doyle 和 Chaturvedi, 2011年)。

244. 承受能力这个概念是指人口的增长超过地球生长粮食的能力并从而使环境退化和导致战争的观点。这种概念一直被用来影响限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政策努力(Sayre, 2008年; Vogt, 1948年)。同样，S-曲线这个概念认为动物、植物和人类数量都会激增，直到它们受到环境阻力之时才会停止，然后开始下降。这个概念也强调了达到饱和的观念，也就是在达到饱和点之后，人口不可能进一步增加(Odum, 1953年)。

245. 以关切地球承载能力为基础的“公地的悲剧”论点提倡人口控制和私有产权的办法，并一直对政策措施和辩论产生长远影响(Hardin, 1968年)。然而，数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合作管理共有资源，并能成功化解私利和公益和环境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对共有资源进行的工作已经记录了许多案例，其中个人创造的稳定自治机制制定和加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相互保护免遭风险的规则(Ostrom, 2000年)。

246. 两性关系时常是管理共有资源的进程的关键。Ostrom 指出：“肯定发生的情况是，当妇女积极参与制定规则和影响公共资源的运作方式时，它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可能会更好，也更可能取得平等的结果……在这种性别不平等状况减少的

情况下，肯定会对未来世代给予更大的考虑，而且较少顾虑眼前的金钱报偿” (Ostrom, May 和 Summerfield, 2012 年)。

247. 人口过多的想法和论述已对人口、卫生、发展、环境和移徙等政策措施产生长远影响——时常也对享有人权和性别平等具有重大后果。尽管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已经认识到不平等和其他各种要素的作用，但有些倡导者继续认为人口压力依然是贫穷和环境退化的最重要原因(Myers 和 Kent, 1995 年)。

248. 在这种背景下，1994 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性别平等倡导者和妇女运动作出努力，带头对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要求作出重大改变。该次会议代表了国际政策的重大转移，从控制人口措施转移到增强妇女权能和更广泛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生殖权利的纲领。会议通过的或被称为“开罗共识”的行动纲领得到世界大多数政府的核可，谴责在实施计划生育时采用胁迫手段，包括采用刺激措施和劝阻措施。与此相反，它推动进行自愿计划生育措施，将其作为包括孕产妇照顾、性教育和防治性传染疾病在内的生殖保健的一部分。

249.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行动纲领依然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是贫穷和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并认为降低生育率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同时，它倡导积极推动增强妇女的权能和扩大生殖保健方案，将其作为解决高出生率的办法，取代以往采取的从上到下、以目标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方案。

250. 尽管在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作出这些保证，但对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生殖权利的承诺后来并未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得到充分反映。最初，千年发展目标没有将推动生殖保健和生殖权利的具体目标包括在内，而列入了要求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目标 5(现在改为目标 5A)。2005 年，在进行五年审查时，添加了千年发展目标 5B，以推动普及生殖保健。然而，目标 5A 和 5B 缩小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范围，从推动广泛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生殖权利纲领改为强调生殖问题。然而，目标 5A 和 5B 缩小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范围，从推动广泛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生殖权利纲领改为强调生殖问题。通过只将重点狭隘地集中在孕产妇的保健问题，妇女的作用从行动纲领设想的“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权利的主体”变为“根据怀孕状况”的“生育者和照护者”(Yamin 和 Boulanger, 2013 年)。在对怀孕作出强调之后，已经稀缺的国际资金现在大都提供给妇幼保健，而提供给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权利的其他方面的资金，包括提供给避孕器具的资金，都已减少(Yamin 和 Boulanger, 2013 年)。

2. 消费和生产格局

251. 对人口过多论的拥护者而言，稀缺必成定局，而降低人口增长率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技术和市场的推动者就比较乐观。例如，以粮食而言，他们将他们的信心放在扩大农业贸易和生产上(见关于粮食安全的第四章)。不过，在这两种极端看法之间，还有许多值得在制定政策时考虑的问题。

252. 认识到与论述人口和环境有关的问题，这并不否认人口增长能对重要资源——粮食、水、卫生、能源、住房、工作、社会服务等——的供应造成真实存在的压力，特别是在快速都市化和气候变化的年代。根据一个综合模式，预测到 2100 年的人口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显示，减缓的人口增长将减少未来的排放：“本世纪末，缓慢的人口增长产生的效应将是……大幅减少矿物燃料的排放总量达 37-41%”。(O’Neill 和其他人，2010 年)。不过，此处的问题是较多的人口等同于较多的排放，而不考虑更重大的消费水平或消费分布问题。

253. 尽管碳遗产——来自个别妇女育儿产生的后代预计的碳排放量——与预计温室气体排放并列时可能很多，但一般而言，个人生育与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成反比。换言之，妇女生育子女最少的国家最可能是人均温室气体排放率较高的国家，即有最高的碳遗产(Murtaugh 和 Schlax，2009 年)。

254. 然而，从消费数字显示出，“人口增长(城市或农村)并不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而是消费人数及其消费量增加，才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Satterthwaite，2009 年)。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属于高收入阶级的人能消费最多的资源，例如供车辆使用的矿物燃料和家中用电，以致高水平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主要都是富裕的人。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也有相同的情况，富有家庭排放的碳远高于低收入家庭(Boyce 和 Riddle，2007 年)。

255. 发展中经济体有世界人口的 80%，在 2004 年占全球碳排放增长的 73%。但它们仅占该年全球排放总量的 41%，并只占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球累积排放量的 23%(Raupach 和其他人，2007 年)。这些观点指出，需要在消费和生产格局以及全球公平的情况下，评价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除了单纯的人数之外，人口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都必须对碳排放采取长期的观点，并注意改变中的生产和消费格局。事实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指所有国家共同有责保护环境，同时认识到需要考虑到不同的状况，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退化以及各国解决这个问题不同能力。

3. 减少生育率和“失踪妇女”

256. 从 196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降低穷国生育率是双边和多变机构政策和方案的主要部分，并且也得到发展中国家人口规划机构的有力推动。³⁷ 需要立即限制出生率的迫切性导致采取各种胁迫性的做法，例如，强迫绝育和强行要求或贿赂妇女使用高风险的避孕器具，而没有事前告知实情取得同意或提供医疗支助。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工具，而不是保护和促进“所有夫妇和个人均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的次数、生育间隔和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基本权利，以及实现性和生殖健康方面最高标准的权利”。⁹

³⁷ 见 Sen (1990 年) 的论文。失踪妇女是指在特定国家的女童和妇女超过世界得到相同照护的地方的妇女/女童和男子/男童的死亡率。

257. 从资源和环境压力的角度看待人口问题是使公众对通用的控制人口措施达成共识的基本要素(Connelly, 2008年; Hartmann, 1995年)。中国宪法授权政府推动计划生育并且夫妇必须付诸实施。1970年代末期推动的一胎化政策已经通过一套经济和社会刺激和劝导措施以及提供免费避孕服务的方式得到实施(联合国, 2002年)。由于有关执行的决定在省级作出, 因此, 实施这项政策的情况各省不同, 在农村和都市之间也有差异。例如, 在城市之外, 一般允许生二胎, 有些少数民族还允许生三胎(Hesketh、Lu和Wei Xing, 2005年)。在实施这项政策数十年之后, 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指出, 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中国少生4亿人, 每年减少了18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Xing, 2009年; Feng、Cai和Gu, 2013年)。越南在1980年代规定每家只准有两名子女。为推动实施这项人口政策, 越南采用了奖励使用避孕器具以及对违反计划生育的人进行处罚的办法(联合国, 2002年)。

258. 在明显重男轻女的国家, 一胎化和类似人口政策已导致男女性别比例的扭曲。人口数据显示, 中国男婴和女婴的比例是117比100、越南110比100和印度111比100(联合国, 2013年c)。生物学上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例是102至106名男婴比100名女婴(世界卫生组织, 2011年)。这些政策造成大规模的性别选择性堕胎以及弃养、藏匿和忽视女童。世界银行估计, 仅在2008年一年, 由于这些做法, 估计中国就少了100万名女童, 印度少了250000名女童(世界银行, 2012年)。一胎化政策也对男子产生不利的两性平等结果, 特别是对农村地区不能找到配偶以及被污名为“光棍”的贫穷男子(Greenhalgh, 2005年)。

259. 其他促成这种增强妇女权能和减少生育之间正面关系的因素包括妇女在家庭之外获得有酬职业和有机会个人拥有收入。根据国家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结果, 有充足的统计证据显示, 妇女受到教育与减少生育有关联(Sen, 1999年)。中国人口学者最近的研究指出, 中国大部分生育转变在1970年代实施一胎化政策以前的十年就已完成。由于死亡率下降、教育人数增多和社会及经济快速转变,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8, 并可能即使在没有一胎化政策的情况下, 继续下降(Feng、Cai和Gu, 2013年)。这个分析指出的是, “经济发展可能完全不是‘最好的避孕器具’, 但社会发展——特别是妇女的就业和教育——可以是非常有效的办法”(Sen, 1999年)。在印度南方各邦, 例如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 1979年至1991年间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分别从3.0下降到1.8和从3.5下降到2.2), 这是由于它们在妇女识字率、女性劳动力的高度参与率和相对较低的婴儿死亡率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以及推动积极但不具胁迫性的计划生育方案的结果(Sen, 1999年)。这与印度其他各邦以及其他国家的记录相反, 尽管它们采取了严厉的计划生育办法, 但却未能取得类似的结果。“印度国内各邦这种相异的结果有力地指出自愿(例如, 基于妇女积极和知情的参与)比胁迫的办法更为有利”(Sen, 1999年)。

260. 这些结果得到最近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评估的确认，其中显示妇女生育的显著下降与其受到教育和担任有薪职业有关。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过去几十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对妇女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经济机会都与总和生育率下降、女童和妇女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更大参与结合在一起。在孟加拉国，自 1980 年以来，经济规模几乎增加了三倍；总和生育率从 1971 年的 6.9 下降到 2009 年的 2.3；在学女童在 1991 年至 2005 年间占入学总人数的 33% 上升到 56%；和年龄在 20 岁至 24 岁的年轻女性参加劳动力的人数在 1995 年至 2000 年间几乎增加两倍半。在哥伦比亚，自 1980 年以来，经济成长了一倍半；总和生育率从 1986 年的 3.2 下降到 2005 年的 2.4；现在女性完成小学、中学和大专教育的人数比男性多；和在 1980 年至 2004 年间，13 个最大城市女性劳动力的参与人数从这个区域倒数第二上升到第二高。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 1980 年以来，经济几乎增加一倍；从 1979 年至 2009 年，它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从 6.9 下降到 1.8(低于更替率)；小学每一名男童入学就有 1.2 名女童入学、中学女童人数增加一倍和大学女学生的人数超过学生总数的 50% 以及占学习科学人数的 68%；女性占今日劳动力人数的 30%(世界银行，2012 年)。

261. 这些不同的国家例子说明对性别平等和实现妇女人权和能力采取全面办法的重要性，包括作为减少生育的有效手段，提供优质教育、保健服务和获得体面工作以及提供易于得到的计划生育服务。

D. 扩大人口纲领

262. 本章查明了长期存在的许多人口理论和模式构成的挑战，这些理论和模式都深植于发展的想法和做法之中。它们集中于妇女的生育问题，认为生育是造成严峻的全球问题的原因，也是解决的办法，这些问题从破坏环境和气候变化到经济动荡和政治冲突。狭隘地将人口过多作为造成环境挑战的驱动力，这偏离了对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格局和程度以及各国之间和本国国内各种不平等状况的注意。

263. 人口政策必须加以扩大，从减少生育扩大到实现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能力。除非所有妇女和女童在生命周期都能享有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权利，使她们能对性和生殖作出自由和知情的决定，否则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这需要制定政策和法律框架并需要加强保健体系，以便普及优质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和在整个生命周期提供信息和教育，包括提供现代避孕的安全和有效方法、安全堕胎、全面性教育和孕产妇保健。

264. 为了充分实现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及权利，各国政府都有责任在提供其他关键服务之外，向所有人提供可以提供、能够获得、可以接受和适当质量的保健服务。这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妇女和女童面对的结构不平等、污名化和限制得到保健服务的歧视的问题。确保获得各级优质教育和得到体面的工作也是扩大人口纲领的关键。

六. 对促进两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投资

A. 引言

265. 本章概述了特别强调本地优先次序、消除贫穷和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纲领。它延伸了前数章关于可持续发展应增进妇女和女童的能力，使她们能够“过她们认为值得过的生活——和有这种价值的理由”(Sen, 1999年)。能力类似于自由，就是过一种特定生活而不过另一种生活的自由。由于能力框架在福祉的成果之外，还强调选择(Nussbaum, 2000年)，因此它只与具体的商品和服务间接有关。然而，为了对妇女和女童提供实质性的改善，投资应在最能惠及她们的部门作出。“投资”是指作出财务、社会和体制努力，以期为人类及其环境创造未来的惠益。本章阐述对改变妇女和女童的生活特别具有巨大潜力的四个领域：家庭用水、安全卫生、清洁炉灶和家庭用电。扩大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能直接和具体改善性别平等，因为妇女不成比例地受到没有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痛苦(Antonopoulos 和 Hirway, 2010年; Anenberg 和其他人, 2013年)。例如，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煮饭、担柴和取水等体力劳动减少了妇女发挥她们自身潜力的能力和相对于男子具有的能力(例如, Cecelski, 1984年; Ray, 2007年)。

266. 获得家庭用水、清洁炉灶和电力是过上优质体面生活的支柱，也是能否据以作出其他生活选择的基础。然而，以全球的需要而言，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至为不足。这四个领域直接关系到环境的可持续性。例如，高比率的公开排便会造成水污染和健康危害，这与卫生设施不足直接有关。因此，为了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需要对这些领域作出更多投资。不过，并非在这些领域的所有投资都是可持续的和符合两性平等的。本章从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提出评估在这些领域投资的两个层面：

(a) 技术、创新和社会投资的风险和惠益，包括按性别分布这些风险和惠益的情况；

(b) 由于这些投资，妇女的人权和能力而特别是贫穷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能力能够(或已经)得到提高的程度。

267. 衡量妇女和女童的能力通过具体投资得到提高的程度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5岁以下女童死亡率得到改善和中学两性入学人数取得对等是评估和评价对用水、卫生、炉灶和电力作出的变革性投资的有用指标：它们对低收入社区或国家特别重要；它们是现实许多其他能力的先决条件；和它们在许多国家定期得到衡量。此外，也应根据投资对减少妇女和女童承担无酬照护工作的潜力和绩效进行评估。尽管这项指标并未定期加以计算，但许多国家都有用时数据，因此，能用来衡量取得的进展。如果以能力来衡量投资成果，那也应作出取得这些成果

的进程的决定来进行衡量。最重要的是，(本地或国家)可持续发展投资应确保承担干预风险的人也有权制定这种干预。

268. 尽管过去几十年这些服务核心的技术可能性已经作出重大进展——包括更加高效、更加低碳和成本更低——但它们无法只根据技术干预措施就扩大范围。此外，也无法保证供妇女使用的改良技术会自动改善妇女的生活。大量关于穷人获得基本服务的文献强烈认为，单凭自愿机制无法确保人人获得符合两性平等的服务(即通过市场或非政府部门)。因此，需要民间社会和国家采取强有力的公共行动，以便扩大所有人的能力和保护环境资源。

269. 本章探讨四种概念。B 部分讨论如何通过性别平等的检验来评估(事前)或评价(事后)可持续的发展干预的问题。根据关于风险和对风险的看法的文献以及关于能力和福祉的运作情况的文献，对社会变革性投资的一些评估标准提出了建议。在 C 部分对四个投资领域的每一个领域以及提供基本服务的技术和社会办法进行了分析。向低收入人口大幅提供服务，并在提供这种服务时，确保性别平等或环境完整性，这有相当大的政治和体制障碍。D 部分集中于可能推动进行可持续发展途径的体制规定。它着重指出需要以必要的规模作出社会投资的民间社会联盟的重要性。E 部分讨论了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的方法和途径。

B. 评估对性别平等作出的变革性投资

1. 评估投资风险

270. 创新技术和落实这些技术的方案始终都有风险。因此，对每一类发展投资而言，应该询问正在承担何种风险以及由谁承担潜在成本。世界水坝委员会(2000年)的权利和风险办法在这方面至为有用。对建筑水坝制定一个负责任的公共投资框架是有价值的做法，并能有用地适用于其他部门。世界水坝委员会清楚地将风险承担者和权利承担者分开，认为将风险加诸在它们(风险承担者)身上的机构时常没有作出与其风险相称的投资决定的权利。

271. 世界水坝委员会成员认为，社区之内和各社区间具有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和看法，需要受影响方和获得利益方进行透明的讨论，因为委员会认识到这两方可能并非相同，并且承认永远有可能存在不可预见的后果。各种有关技术和社会接受度的风险文献的确显示，不能单凭结果的概率分布来了解风险。人们作出的风险评估不仅具有技术的部分，也有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参考框架及其社会不确定性和恐惧。这些主观观点和情景观点并不只是更好地了解技术风险；它们需要对认为具有风险的多种准则进行分析(Stirling, 1998年)。为了可持续发展，权利和风险框架与其对风险的认识、风险的分布和风险的自愿或非自愿性质对大规模和不可逆转的投资特别重要。例如，以大型水坝为例，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受到影响和必须迁移的社区时常承担建坝的风险，但很少享有作出决定的权利或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的裨益。没有土地法定所有权的妇女和其他人不会分配到土

地，以补偿淹没的产权。世界水坝委员会认为，当风险承担者不是权利拥有者时，这种相对不利的性别结果可用于水坝(例如，道路)之外的许多投资。

2. 评估投资的结果

272. 重要的是要能以可能作出的投资对性别平等和本地的优先次序及最贫穷人民的需要来评价这些投资。如果在投资 Y 之外推动投资 X，就必须在投资之前有明确评估其影响或评价投资之后产生的影响的准则。作为一项核心准则，以可持续发展的名义进行的投资应以它能否增进妇女和女童的能力进行评估。如果这个发展方式降低了妇女的能力，这种发展方式就不能被视为是“可持续的”。因此，如果为穷人进行低碳和高效的能源项目投资而无意间增加了妇女的无酬照护工作，这就不是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途径。这不是否认目前明确和迫切需要减少全球经济产生的碳量，而是如第二章的论点一样，认为从本地发展或性别平等的观点出发，采用以减少排放为主或“地球承载极限”的观点的可持续性是不够的。根据能力准则来评估投资就需要改变使用“收入加环境足迹”的这种准则，而这项准则是最常被用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的。至今已提出若干衡量办法用来评估增加的能力。

273. 在衡量妇女的能力得到加强而同时使这种衡量方法切合实际和能够作出选择的一种可能办法是选用已经列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的部分指标数，例如预期寿命和性别偏见。³⁸ 人类发展指数是根据阿玛蒂亚·森有影响力的能力和功能办法推导而得的指数(Sen, 1985 年)，它们能被视为是落实能力的一种方法。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一个整体，大都符合一般通用和大范围使用的原则；显而易见，具体社会经济状况和优先次序决定了何种能力指标数最符合具体情况。例如，在社区对卫生的投资，教育指标数(例如，女童中学入学人数)或可作为评价的度量标准。对赤贫的家庭清洁能源的投资，女性和婴儿的死亡率可能是更适当的衡量工具。选用的这些指标数应该用来衡量整体人口，但也应用来衡量最低阶层的人。它们能在多种范围进行衡量，既能在作为整体的国家进行衡量，也能对单一的本地干预措施进行衡量。

274.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5 岁以下女童的死亡率和中学男女入学比例都可被视为是分析本章讨论的四个优先领域的有用能力衡量标准(Saith 和 Harriss-White, 1999 年; Unterhalter, 2013 年)。这些指标数能表明低收入社区或国家的状况。随同有关营养的人体指标数之外，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比例以及中学入学人数都是极其重要的能力，也都是实现其他许多人权和能力的先决条件。它们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指标数，因为儿童死亡率和入学人数的数据，尽管可能不完美，但却是大多数国家定期衡量的指标数。其他指标数也能用于这个用途。

³⁸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指数，<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hdi> (2014 年 6 月 27 日查阅)。

275. 入学指标数衡量男女入学比例，这直接表明男女入学的对等状况；不过，这种女童接受中学教育的简单比率也是一种可信的能力衡量标准。对中学入学人数的强调超过对小学入学的人数：文献令人信服地显示，在学年份越多，就越能了解她们拥有的权利，也越能使她们自己及家人不受疾病的困扰(Unterhalter, 2013 年)。

276. 用两个准则来衡量多个领域的性别平等可能是一个小数目。不过，这两个准则在于表明可持续途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充分的要素；选取它们完全与具体情况有关。实际投资预期将通过其他环境和经济准则作出评估。但有选择性和使用简单是指标数获得政策青睐的关键。事实上，根据投资前的基准状况，仅一个指标数就可能成为评估具体状况的良好准则。

277. 促进两性平等的发展确实重要，其指标数是减少无酬照护工作。每种经济都靠无酬照护经济(Razavi, 2007 年)维持，其中包括烹饪、清洗、照顾老年人、照顾儿童和社区自愿活动。在低收入经济体，照护工作还包括时常跋涉长途的担水和拾柴。无酬工作大都由女性承担，并可能由于表面上的持续干预措施，无酬工作的负担可能增多或减少。它们甚至可被认为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们依靠的是不列入统计的无酬工作；备受称赞的干预措施，例如收集雨水和在社区进行资源管理，由于这个理由而备受指责(Jackson, 1993 年; Kabeer, 2005 年)。如果妇女和女童要发展她们的全部能力，减少无酬照护工作而特别是低收入家庭中的无酬照护工作是其关键。这个指标数并不在人类发展指数中定期加以计算。尽管各国正在增加收集用时数据，但在妇女的贫穷经验、无酬照护工作、妇女参与各级决策和妇女获得、拥有和控制资产及生产资源等若干领域缺乏数据，这限制了评估性别平等中的妇女能力问题。会员国需要作出更大努力，有系统地优先收集、报告和分析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的一组最低性别指标数的数据。³⁹

C. 对促进两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投资的类别

278. 可靠的家庭用水供应、干净和有尊严的卫生设备、更清洁的炉灶器具以及家用电力服务均属基本类别。每一个人，不论年纪、性别或阶级，都需要喝水、呼吸、煮食、大小便和在黑暗中视物。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影响到每天每一个人，因此有助于落实能力和人权。它们是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生计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所谓的“贫穷阶级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基础(Martínez-Alier, 2002 年)。由于贫穷妇女在满足家庭其他成员以及她们自身的需要方面的责任，这些投资对贫穷妇女特别重要。因此，它们应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的中心。

³⁹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 2013 年通过的一组最低性别指标数为国家制作和国际编辑性别统计数据提供了指导。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统计司，《性别统计》，请查阅 <http://unstats.un.org/unsd/gender/default.html> (2014 年 7 月 16 日查阅)。

279. 所有这四个投资类别都能惠及使用者以及非使用者(例如,让妇女获得安全的卫生设备会增加社区的整体卫生以及高效的炉灶会改善家庭健康和家庭预算)。不清洁的水、不干净的卫生设备和固体燃料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约占低收入国家死亡人数的 11%(世卫组织, 2009 年)。所有这四项投资都以技术为核心,但只对技术进行投资无法确保作出的这些创新会达到变革规模。所有这四项投资都有重大的正面外部效应,这意味着从这些投资得到的社会利益都会超过私人利益。因此,市场大都不会提供过多的这种商品和服务,这使它们成为公共领域能够进行投资的对象。这并不排除私有部门的参与,而是呼吁采取协调的行动,将私有投资通过针对具体情况的津贴和监管,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对所有这四个类别作出的投资都可能沿着或许无助于性别平等的不可持续途径或沿着各种能力或许能够得到加强的更可持续和更加公平的创新途径进行。因此,将重点放在这些类别并不表示它们必能导致性别平等,或它们是为可持续发展唯一值得作出的投资。许多投资对消除贫穷和对性别平等都有变革性的作用,例如,良好的基础设施、用于发展的移动技术或为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提供金融普惠。受到强调的是可能会直接和具体改善性别平等而特别是改善贫穷妇女性别平等的投资,因为她们不成比例地承受着没有这种投资的恶劣卫生状况和无酬照护工作的重担(Antonopoulos 和 Hirway, 2010 年)。

280. 在南亚和非洲城市为降低厕所与使用者比例所作的卫生设备投资时常使妇女无法使用它们,因为上午队伍太长,晚上又无法走到厕所。在另一方面,肯尼亚和塞拉利昂等许多非洲社区主导的整体环境卫生举措显示妇女随时预备带头鼓励建造厕所和参与推动社区主导的整体环境卫生所需的社区动员活动(Hickling 和 Bevan, 2010 年)。在中国、印度和肯尼亚进行的若干炉灶改良措施同时改善了家中空气,并可能改善了妇女呼吸系统的健康,尽管这很难衡量。非常成功的一项方案是将在下文讨论的中国取代燃煤炉灶的“全国炉灶改良工程”(Sinton 和其他人, 2004 年)。

1. 水

281. 全世界约有 7.48 亿人无法得到改善的饮用水(世卫组织/儿基会, 2014 年)。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这是来自加盖水井、清泉、收集的雨水、井眼或自来水龙头的饮用水。水中的微生物(即使在“改善的”饮用水中)引起的腹泻每年夺走 160 万 5 岁以下儿童的生命(世卫组织/儿基会, 2006 年)。目前正在为改善水质研发和散布许多创新的办法。本节集中讨论为家中用水可靠地获得足够的改善水量。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首先需要基本供应。

282. 社会的期待使妇女和女童承担起家庭担水的主要责任;在超过 70% 必须担水过活的家庭中,妇女和女童都在担水(世卫组织/儿基会, 2012 年)。在农村水源很远时,妇女可步行多至两小时担水。在城市通过公用水管供水时,她们可能需要排队等候一小时以上(Ray, 2007 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 25 个国家进行调查的

结果显示，妇女每天共用去 1 600 万小时取水(世卫组织/儿基会，2012 年)；水源越远，家中用水越少。从全世界的个案研究显示，与取水有关的“时间匮乏”变成妇女损失收入和女孩损失入学时间(开发署，2006 年)。此外，当用水权利没有保障时，也造成严重心理压力。所有这些长期担水和取水的重活对颈、脊椎、背和膝盖都造成磨损；事实上，妇女的身体成为运水设施的一部分，发挥着水管的作用。

28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善水在城市的供应多于农村，并且对顶层阶级的供应多于底层阶级。这些趋势与 2006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一致，其中明确指出，无法得到水是不平等和缺乏权利的缘故，而不是一些普遍所谓的匮乏(开发署，2006 年)，这符合关于食物权的第四章中的分析。

284. 即使在获得水的百分率通常较高的城市地区，最低阶层获得水的可靠性、水质和能否负担等问题也完全没有保障。水管持续供水具有最高的健康效益和最低的劳役成本，但以技术和财政而言，只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才切实可行。要达到千年发展目标，从 2000 年至 2015 年，发展中国家每年为提供连接污水处理的自来水系统需供资 1 360 亿美元；为达到目标使用较便宜的供水技术，包括水井、便宜水管和收集房顶雨水等，而且在使用点不加装净水设备来改善水质，估计每年供资不到 20 亿美元(Hutton、Haller 和 Bartram，2007 年)。根据世卫组织/儿基会的饮水供应和卫生联合监测方案，⁴⁰ 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全球供水目标要在 2013 年达到，但这项目标未能达到人人有水可用、未能达到水可放心饮用、大都在城市而非在农村达到这项目标并且十分符合妇女持续“时间匮乏”和获得水的成本高昂的情况以及其他水匮乏的指标数(例如，水质不定、水源不可靠、取水和担水的体力负担)。

285. 在农村地区，少量的水不仅是消费所需，也是生计所需。Zwarteveen(1997 年)认为，在讨论妇女用水需要时仅侧重家中用水就忽略了越来越多女性为主的小农家庭，强调了妇女作为母亲的作用，而没有强调妇女也是生产者。属于“多次使用”的农村系统是指为饮用和小块耕地以及数只牛羊供水的系统，可能是最符合农村妇女各种基本需要的系统。这种系统最有可能回收成本，因为它们有助于创收，特别是如果有信贷的话。与此相反，提供饮用水为主的系统，例如加装水泵的水井，在使用周期可能需要每人每年 20 美元至 60 美元的成本，因此，少有机会在低收入的使用地区回收成本。从务实而非人权的观点而言，根据当今全球经济，捐助者和政府都更愿投资可能回收部分成本的系统，而不愿投资无法回收成本的系统。

⁴⁰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儿基会的饮水供应和卫生联合监测方案是联合国监测区域和国家在供水和提供卫生设备方面取得的进展的机制。它利用在全球和各国进行的家庭调查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因此，被认为是跟踪全球供水和卫生状况最全面的数据库。

286. 除了有储水槽的大型多用途供水项目之外,也存在着分离式小型供水设备,现在也已供应数百万台。许多这些小型设备也属于今天所谓的“多用途”系统。其中若干系统采用“现代化”的传统办法,时常都安装在社区内。为人所知的最好例子是雨水收集系统,这种系统在社区和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合作下受到广泛使用。另一个例子是脚踏水泵,用脚踏动水泵将浅水引入家中使用,以及浇灌小片农地和小片菜园。这些技术重获使用并使之现代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不断发生干旱,而另一部分原因是设法驳斥只有大型水坝才是唯一达到水安全的说法。但缺乏资金和政策关心不足使这些办法未能达到真正的变革性规模(见 Sovacool, 2012 年)。

287. 在任何地方,水是生活的同义词;让贫穷妇女有水可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高优先工作之一。在这层意义上,农村和城市以往失败的供水项目具有指导作用。时常提到的失败原因是在进行这些努力之前和期间忽视妇女的声音和看法;但妇女是用水者,因此她们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且利益攸关。因此,妇女的能动力、声音和领导力是以两性平等的方式可持续供水的关键,并且必须超越她们“象征性”地参与的状况。尽管认为妇女的领导力是社区内制定可持续供水项目的充分或必要条件是天真的想法,但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的许多案例已经显示,将妇女置于供水和卫生决定的中心更符合这方面的成本效益、使更多家庭有水可用和在水事供资方面较少腐败(Fisher, 2006 年; Chattopadhyay 和 Duflo, 2004 年)。

2. 卫生

288. 卫生是一项基本需要,但全世界有数十亿人无法得到改善的卫生设施。应当了解到,基于社会和生理的理由,男女面对的风险各异并对卫生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女童和妇女在使用室外共用设施时,可能会遭到性暴力;学校没有适当卫生设施也可能使女童不愿上学,特别是在月经期间。

289. 依照世卫组织和儿基会的规定,“改善的”卫生设施包括连接下水道的冲水马桶或抽水马桶、通风的改良式茅坑和堆肥厕所,通过使用这些设施,人体大都不会接触到病原性废物。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存在各种不同的厕所设计,从简单的蹲式茅坑到比较复杂但本地能够生产的(生态上)干式厕所(Nelson 和 Murray, 2008 年)。但超过 25 亿人仍然没有改善的茅房可用,其中 7.61 亿人使用共用设施,对此世卫组织和儿基会的供水和卫生联合监测方案并不认为得到了“改善”。露天排便的人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已下降(世卫组织/儿基会, 2013 年),但这仍是超过 10 亿人日常的如厕方法,其中 90%都是农村居民。

290. 露天排便严重危及公共卫生以及危害环境,造成普遍的腹泻疾病和水污染。与饮用水方案相比,以前遭到忽略的卫生方案现在日益受到更多注意,并得到保健研究人员、配合地方社区的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大力推动。目前依然存在的状况是在用于水事和卫生方案的每 4 美元经费中,只有 1 美元用于卫生(世卫组

织, 2012 年)。但近年已经发生极大变化, 开始认识到卫生也是实现健康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291. 干净、建造及维护都负担得起以及安全使用的基本卫生设备是对妇女和女童的能力作出的特别变革性的投资。由于社会规范, 妇女在使用厕所时需比男子有更多隐私、如厕时比男子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妇女如厕必须坐或蹲)、她们使用户外厕所时需要顾及人身安全和在月经期间可能需要多次如厕。由于这些理由, 获得卫生设施如获得清洁水一样, 与性别平等和尊严密切相关。如同获得清洁水一样, 在低收入国家获得卫生设备的情况也高度不平等; 如同清洁水一样, 城市提供卫生设施的比率大大高于农村提供这种设施的比率(世卫组织/儿基会, 2013 年)。即使在农村地区, 远离大路的社区获得卫生设备的比率最低。总体而言,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低收入国家最贫穷阶层儿童没有适当卫生设备的人数比率可多达同样国家顶层儿童的 20 倍。

292. 研究和推广卫生设施的新方向大都集中于通过开发新技术推广卫生设施、鼓励装设马桶、改善提供卫生产品的市场、鼓励非国家行为体发挥更大作用和不鼓励露天排便(Black 和 Fawcett, 2008 年; water.org; ⁴¹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若干捐助方作出的努力(例如, 盖茨基金会的“改造马桶”项目)和政府与社区作出的合作努力(例如, 社区推动的全面卫生运动)都侧重于推动穷人的可持续卫生。社区推动的全面卫生强调农村卫生, 这反映出这个概念源自于农村(Kar 和 Chambers, 2008 年)以及这个露天排便最常发生之地。这是一种不以提供津贴的方式推动卫生的社区动员办法, 它鼓励人们以本地资源建造自用的马桶/厕所, 停止露天排便。社区推动的全面卫生举措鼓励妇女发挥领导作用, 但同时也借助妇女作为家中清洁和整理者的传统身份再接再厉, 并能增加妇女现有的劳动力(Mehta 和 Movik, 2011 年)。但在南亚、中美洲和非洲南部城市也有利用卫生作为建立社区以及建造厕所的做法在社区中心利用社区领导力建立城市卫生的例子。这些方法曾经只是试点项目, 现在已成为主流, 它们代表着从以前以供应驱动和设施驱动的办法的重大变化。目前仍不清楚这种以需求驱动的办法能否长期在多种不同状况下得以维持, 或它们能否充分适应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以扩大这种办法的范围(Harris、Kooy 和 Jones, 2011 年, 关于越南)。

293.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 改善的(或改造的)厕所依然以硬件为导向, 如果是干式马桶, 在处理或排除污物时, 甚少谈及废水处理问题。从粪坑溢出的未经处理的污水和粪便排泄物污染力度强, 并且不可持续溢出。如果改善的卫生设备需要将污水处理之后才可排入环境, 则有 41 亿人而非 26 亿人没有可用的设备(Baum, Luh 和 Bartram, 2013 年)。因此, 可持续的马桶设计除必须考虑到减少露天排粪之外, 也要考虑到处理和回收使用病原性废物(Nelson 和 Murray, 2008 年)。为卫

⁴¹ 更多信息, 请查阅 <http://water.org/>。

生设施达到所需规模的供资仍是至今没有解决的全球挑战，对现有的成本估算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私人家庭的开支几乎没有估计（Hutton 和 Bartram，2008 年）。据估计，每年约需投资 360 亿美元(2008 年币值的美元)，连续投资 10 年，才能达到(和维持)减少半数没有改善的卫生设备的人口的千年发展目标。如果将初级处理马桶污物和长期维护的费用加在一起，提供“可持续的卫生设施”的成本可比仅仅建造厕所的成本高出 5 倍至 20 倍。安全地将人类排泄物转变为可再用的污泥或可再生能源的创新社会企业正在都市贫民窟进行大规模试用(例如，Sanergy)，⁴² 探究从生产性的再次使用回收成本的可能性，但这项努力仍在试用阶段。

294. 强调消除露天排粪绝对是关键所在。但这对可持续的或两性平等的卫生是不够的。清洁和安全的卫生能促进女童的教育、妇女的来往和妇女及女童的身体和性保障。不过，性别平等意味着厕所方案必须不止解决排粪和疾病管理的问题，而需同样严肃地对待隐私、安全和经期个人卫生管理的需求。经期个人卫生在国家和国际卫生推广工作中时常遭到忽略；到现在在 2015 年后发展目标中才认识到存在重大方案差距(世卫组织/儿基会，2013 年)。安全和隐私的卫生设施和产品使女童能留在学校，减少她们在经期的不适和羞愧。来自印度、尼泊尔、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证据显示，在经期没有卫生设施和干净衣物使女童不愿上学，而清洁和安全的马桶以及经期个人卫生教育使女童愿意留在学校。来自印度和肯尼亚的其他研究显示，恶劣的经期卫生和改变的设施使女童受窘、休息时不愿参加体育活动、愿意留在家里，而改善的和负担得起的卫生产品和隐私会提高她们的在学经验和整体生活质量(House、Mahon 和 Cavill，2012 年；McMahon 和其他人，2011 年；Shah 和其他人，2013 年)。简言之，男子和妇女由于生理和社会的理由，有非常不同的卫生需要。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必须根据这些切身需要和环绕这些需要的社会规范作为主要关切事项来设计和落实，因此，这意味着推动卫生的方案不能仅侧重于防止露天排粪。

3. 炉灶

295. 目前妇女仍在家中担任每日烹饪之责。这是无酬照护经济的主要部分。因此，妇女及其子女，特别是无时一刻不与母亲在一起的幼儿，不成比例地吸入燃烧生物质的炉灶排出的烟尘拾柴和捡炭在发展中国家主要也是妇女承担的工作，这项工作耗费时间，并对妇女以及对时常跟在身边的子女造成危险。此外，农村家庭在农忙季节人手高度不足，因此，用于拾柴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很高。

296. 妇女每天耗费许多小时拾柴和在排放有害烟尘的露天炉灶炊煮。因此，她们不成比例地受到不清洁和无效率的烹饪的影响并依赖生物质燃料(清洁炉灶全球联盟。2013 年)。在全球范围，约有 30 亿人使用固体燃料烹饪和取暖；根据人

⁴² 更多信息，请查阅 <http://saner.gy/>。

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组织的报告，其中有 78% 居住在农村(见 www.se4all.org)。使用生物质的传统炉灶(即使用木柴、煤炭、动物粪便或作物残余物的炉灶)，特别是在屋内使用时，是家中空气污染的主要生成者。在全球范围，这种污染造成超过 400 万人死亡，并且家中空气污染加上附近环境的空气污染现在是危害全球环境卫生的主要风险。在南亚和中国，固态燃料炉灶——在印度使用生物质，但在中国大量使用煤炭——是造成家中空气污染的单一最大生成者。从黑碳和吸入颗粒物等各种疾病造成的累计负担都呈现在呼吸道感染、肺肿胀、出生时体重低和心脏疾病(Fullerton、Bruce 和 Gordon, 2008 年)。

297. 如果家庭能够改用燃烧清洁和更加高效的炉灶就能有利健康和收入及节省时间，这对整体社会非常重要。如同用水和卫生的情况，这给予它们的外部效应远远超过对个别妇女的利益。例如，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环境颗粒物(并非只是户内颗粒)都是利用固态燃料炊煮造成的。

298. 大规模投资高效的固体燃料炉灶，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外围地区，既有助于促进两性平等，也是一项对可持续途径的投资。基于健康的理由和为了防止室内污染，最好的办法是停用炉灶和改用清洁燃料，例如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等，但这是一项目标更宏大的建议。

299. 与关于用水和卫生的数据相较，根据国家和社会阶层分类的关于使用高效炉灶的数据不多(见 Anenberg 和其他人, 2013 年)。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清洁炉灶刚成为公共开支或定期收集的公共数据的重要焦点。国家能源政策和扶贫战略文件惯常侧重于电气化而没有适当反映烹饪用能源的重要性。至今发生的例外情况是中国目前已经停止实施的大规模和有组织的国家改善炉灶方案，在这个方案实施之时，它推广了 1.8 亿具改善的炉灶(Sinton 和其他人, 2004 年)。

300. 尽管日益受到政策的关注，但对清洁炉灶的公共投资依然不足。影响对清洁炉灶提供支持的第一个要素是清洁炉灶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差异很大，有些在评估后认为没有作用，另一些只有微不足道改进健康的作用，其作用很难量化或无法如预期地降低对户内空气的污染(见 Anenberg 和其他人, 2013 年)。“清洁”炉灶自身的设计和燃烧效率也差异很大，从装有烟囱能将烟尘排到室外的炉灶到只是使用较少燃料但微粒污染仍留在室内的炉灶都有。高效炉灶对收入大都产生积极影响，因为许多改良后的炉灶比改良前的炉灶少用燃料 30% 至 60%；这对每月收入约 10% 用于能源的农村家庭是一笔很大的节省(Miah 和其他人, 2010 年)。

301. 第二个考虑是制作妇女愿意使用的炉灶以及向低收入家庭销售这样的炉灶并非易事。大多数改良的炉灶，即使对炉灶本身及其使用均感满意，但也有报道指出，愿意继续使用传统炉灶煮食(利用改良的炉灶煮出的食物味道显然不同)。此外，也有传闻显示，妇女不愿意放弃使用两个炉灶的方便之处，尽管持续使用

高效的炉灶有其好处。这种设备“堆放”的做法更难看到对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更难销售新的炉灶。在烹煮食物方面，男女对清洁炉灶的评价不同。有人认为，妇女比男子更看重炉灶的美观和无烟环境，而男子更关心是否按时供餐和有否传统风味。这些观点并不必然相互冲突，但它们对销售产生难题。目前估计，现在在 1.66 亿户家庭使用相对较便宜的改良炉灶，其中 1.16 亿户在中国和 2200 万户在南亚。尽管大规模的改变依然不可实现，但许多在亚洲和非洲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报道在接纳炉灶方面出现令人鼓舞的结果，其中包括实际行动组织、可再生能源组织、环境和团结组织(环境、可再生能源和团结组织)、柬埔寨和可能的能源组织等，并且妇女在炉灶的设计、测试和社会及传统销售方面都发挥了中心作用(全球清洁炉灶联盟，2013 年)。

302. 炉灶领域现在与减轻气候变化的辩论密切相关。大家普遍认为，清洁的炉灶能增强妇女权能、提高人类健康和减缓全球变暖，因此在气候、能源和贫穷三方面都有赢赢关系。减少使用固体燃料会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即使所有炉灶的排放只占全部排放中的一小部分(每个炉灶每年排放约 1 吨至 3 吨二氧化碳)(Lee 和其他人，2013 年)。比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更具重要意义的是黑碳(烟尘)作为空气污染物质的排放，它是促使全球变暖和造成区域气候变化的一种物剂，是生物质炉灶和燃煤炉灶生成的污染物并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变暖物质。在南亚，估计半数排放的全部黑碳都来自燃烧生物质的炉灶，这种排放中断了梅雨季节，从而严重威胁到水的供应。不过，应该注意到，对黑碳源的详细研究显示，以整体而言，住家使用生物燃料炊煮食物所产生的短期污染物也许会产生少许变暖效应，但即使有这种效应，其规模也极度不确定。住家烧煤有略高的短期变暖效应，但其“确定性还是很低”(Bond 和其他人，2013 年)。

303. 明显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使其有可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组织、清洁烹煮贷款基金会和其他新的创新式减碳组织等公私合作伙伴资助和销售炉灶方案。⁴³但这些数据只对减少燃烧生物燃料会在短期有意义地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作出少许保证。从使用清洁炉灶产生的所谓减轻气候变化的共同好处，例如更有益于妇女健康和降低燃料费用以及减少拾柴时间和/或财务费用，都超过气候惠益。对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好处以及减少她们的无酬工作量就对投资作为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部分的清洁炉灶提供了强有力的足够理由。

4. 电力

304. 变革性投资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电力。可靠、安全和负担得起的照明改变了生活。电力意味着男女在需要时可工作更长时间或更具灵活性的时间工作，儿童和成人能在夜晚灯光照明下阅读并且可对已经成为贫穷工人主要通讯工具的手机进行充电。电灯照明远比煤油灯或蜡烛照明安全。灯芯照明工具，例如蜡烛和

⁴³ 更多信息，请查阅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的网站：<http://carbonfinanceforcookstoves.org>。

煤油灯等，生成大量黑碳，但与燃烧生物质的炉灶不同，煤油灯几乎只排放黑碳，很少带有有机碳(Lam 和其他人，2012 年)。没有基本电力供应就自动将这个家庭放入“贫穷”类别，根据这种方法计量，超过 13 亿人仍属于贫穷级别。

305. 尽管千年发展目标没有设定电力(或能源)目标，但得到基本电力服务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先决条件，并且不只是为了整体发展而已(Cabraal、Barnes 和 Agarwal，2005 年)。促进性别平等的千年发展目标 3 的主要指标是消除在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得到电力供应能使所有阶层的更多妇女阅读和观看电视节目(Pereira 和其他人，2011 年，能源部门管理协助方案，2004 年)。时常由妇女经营的小企业也需要电力。获得电力会普遍改善健康照顾的基础设施，因为在日落后仍能看诊、保持疫苗冷冻收存和在黑夜接生婴儿。孕产妇的死亡率与有否电力供应特别有关(Sovacool，2012 年)。年龄在 15 岁至 34 岁的妇女占有不成比例高的孕产妇死亡率(联合国，2013 年 a)，以及没有灯光照明的接生已知是造成感染和死亡的重大因素。因此，提供基本电力是扩大妇女能力的关键。

306. 将现代电力供应提供给目前没有电力的人估计所需费用差异极大，但《世界能源展望》估计到 2030 年每年需要供资 490 亿美元(国际能源机构，2012 年)。这种差异取决于估计资本成本的方式，以及如何估计燃料价格和家电效率。目前使用的维护成本通常包括建立电网的成本，但时常不计算较小的家用或社区使用的系统。集中的电网延伸依然是人口密集的中等收入城市地区如中国和南非等地最高效的供电方式。但对资本成本的考虑以及对收益低的前景使私营电力部门都不愿进入低收入、人口稀少的农村市场(Bazilian 和其他人，2012 年)，即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基于效率但也基于理念已经朝向能源服务私有化的方向前进。

307. 应该考虑到目前将电力输往没有电力连接的用户与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传统提供电力的模式是将矿物燃料能源通过集中式网络提供。根据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组织的看法，总体而言，住在黑暗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村居民，他们支付能力低、需求高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考虑使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分散式系统成为提供可持续能源的主要政策建议。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分散式或微型网络系统类别内，有若干选项。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组织认为，这包括平均约为 10 瓦(“pico”)的极小系统，仅支持两个电灯和手机充电，或太阳能家用系统，支持风扇、四个或五个高效电灯和一台电视，平均功率约在 30-40 瓦；或提供若干社区服务的小型电网系统，这需要较高的前期投资，但产生的电力比家用系统成本低。在资源少的社区中，微型网络系统比集中式网络更易快速扩大和复制，但通过个案研究显示，在成本效益分析中，不能事后才考虑到不断维护所需的成本和能力。以社区或多个社区的规模，也可建立可再生能源-传统能源的复合式系统，将光电与风能结合或甚至与柴油机结合，提供电网般的可靠性以及家用之外的各种生产性应用(Guruswamy，2011 年)。

308. 基本电力供应目前定为是否在家中有接电。向目前没有电力供应的 13 亿人提供起码的电力，使其能有基本照明、使用一个风扇和一个无线电或电视，这只增加目前全球电力消耗的一小部分，但却能产生巨大的变革性作用。因此，向穷人提供基本电力不会立即造成气候变化的风险，即使它们的全部消费都由矿物燃料提供动力。但是将可再生能源纳入电力网络以及扩大分散式网络选项，以便尽量利用清洁能源减少对当地人民健康产生的影响及微粒污染的程度，都是防止锁定利用新的矿物燃料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步骤。提供基本服务只是一个开端。消除贫穷需要超出这个范围(Sovacool, 2012 年)。如同在炉灶领域一样，有关电力服务的可持续性应反映出集中式和分散式以及传统和可再生能源等各种选项对气候和对能力的相对影响。

309. 像所有干预措施一样，分散式的农村电力方案在有些地区取得成功，但在另一些地区，由于财务、政治和社会理由而归失败。尽管基本电力服务对可持续发展依然至为紧要，但没有一种技术——不论其成本为何——气候复原能力或传播模式能确保产生和使用的电力会改善性别平等。对妇女和电力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一旦有电灯，妇女就有更多时间与子女共处、更快完成家务和更多时间阅读。但对极小和有限的电力系统而言，烹煮、阅读和看电视竞相使用有限的电力(Jacobson, 2007 年)；家中电力分配决定了谁用电和为何目的(见 Agarwal, 1997 年)。因此，尽管成本较高，但需要比“微型”系统的电能高的系统提供电力服务，才能积极促进性别平等。因此，根据本章所建议的增加能力的准则，小型但不是微型的电力系统可能更具有推动可持续性的作用。

D. 投资的机构背景

310. 对可持续性和能力进行投资的机构背景毫无疑问是关键所在。在四个确定的优先部门中，每一个部门都取决于创新和/或负担得起的技术，而技术极自然地被视为是对用水、卫生、炉灶和电力的投资取得成功的主要成分。当技术在机构和金融背景下得到传播时，对有自身价值观和看法的使用者而言，以及在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内，技术只是任何投资策略的一部分。机构背景大大地决定了谁能获得技术和以何种条件获得。在用水、卫生和能源的许多项目现在都有妇女参与，从设计到销售到融资，每一级别都有。在市场导向的干预措施中，这种情况尤其真实，例如清洁炉灶或电网外的高效照明；对用水或卫生系统而言，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但是为 13 亿没有电力的人或为 25 亿没有卫生设施的人加大机构需求却是一项真正艰巨的工作。

311. 用水、卫生和电力历来通过公共部门的投资扩大规模，因为网络连接的水电供应传统都是垄断事业。19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服务都已开放给私有部门。私有部门参与的增多是因为公共部门不向低收入民众提供服务以及因为全球政治经济变得更加对市场友好和对国家持怀疑态度(见世界银行, 2003 年)。在此同一期间，民间社会行为体和权力下放成为这些服务部门的主流。炉灶部门

从来没有完全属于公共领域。炉灶一向被视为是单独的消费项目，尽管长期以来存在(和现在越来越成为)改良炉灶和利用沼气的国家和捐助方方案。

312. 发展中国家集中或半集中的水电服务导致的公私伙伴关系好坏参半(Bazilian 和其他人, 2011 年)。支持公私伙伴关系的文献时常认为, 这种伙伴关系是往前推动提供服务的唯一途径, 因为国家部门既没有资金, 也没有能力和公信力扩大服务。不过, 联合国关于包括卫生的所有淡水相关问题机构间机制(联合国水机制)和世卫组织最近在 17 个国家就用水和卫生筹资问题进行的全面研究显示, 用于这个部门 80%的(非家庭用)资金仍来自中央、区域和地方政府(世卫组织, 2012 年)。反对公私伙伴关系的论点认为, 私有化正在使国家沦为私有财产的持有者和私人合同的担保者, 而忽略了许多国家未能向穷人提供服务以及未能提供服务造成的影响。通过提供可靠和高效的服务, 从而减少应对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烦恼, 公私伙伴关系是否有利低收入妇女, 或规定可能没钱的妇女提供金钱和使用费用, 这些伙伴关系是否对妇女有害, 其结果仍不明确。

313. 尽管近几十年来一直强调政府运行的方案取得的成果有限, 并且尽管国家时常运作不良, 但有证据显示, 这些方案依然是作出大规模社会投资的关键。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中国农村清洁炉灶项目; 这个方案通过多个国家部委、多名国家和农村官员、农村能源公司和地方能源服务企业的协调努力, 向 1 亿多个家庭推广了改良炉灶(Sinton 和其他人, 2004 年)。一个国家主导的农村电力供应例子是南非在取消种族隔离后推行的国家电力方案。这个影响深远的方案至为成功, 在一段短时间内, 提供的电力超过一倍, 并使选定的私有部门特许机构致力于实现主要是公共部门的目标。

314. 如果没有国家发挥中心作用, 这种大规模的方案至为少见。私有企业、需求驱动的服务和供资、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试办项目的示范作用都是关键。但是许多关于私有部门行为体提供关键服务的重要性和创新性的文献认为, 如果要人人享有水和能源服务, 国家需要设定和落实有利的政策框架, 向最穷困的群体提供直接援助和导引集体商品的流动和目标。对未能扩大承诺的干预措施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例如国家补贴不足、基础设施欠缺、治理松散和监管不严等(Zhang 和 Smith, 2007 年; Bailis 和其他人, 2009 年; Pereira 和其他人, 2011 年; Harris、Kooy 和 Jones, 2011 年; Sovacool, 2012 年)。私有部门行为体不能享有附带效益, 或向赤贫用户提供服务, 或保证提供基本需求或环境完整性。这都不是它们的任务范围。

315. 在此同时, 私有部门参与用水、卫生和能源的性质快速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与最低收入阶层人们合作的提供者。它们并非大型企业实体, 而是小规模的非正式实体, 有时完全是商业实体, 有时也可能是社会及商业实体, 并且大都是灵活的创业性机构。重要的是, 公共部门在可持续发展努力方面与私有部门合作, 并对其进行监督, 而同时利用私有部门提供服务和开拓市场的潜力。然而, 监管

和监督能力可能是小国欠缺的能力，特别是在它们必须与资金雄厚的企业进行谈判之时。因此，监管和监督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也是民间社会及社会运动代表的工作。这些实体，尽管它们可能各不相同，但时常却是代表没有得到服务或边缘化的社区的有效压力团体和/或监督者。

316. 在这个复杂的体制环境，不同的提供者相互支撑运作，要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大规模投资，只能通过发展领域的所有行为体结成联盟。近期作出的努力显示，在用水、卫生和能源部门，建立这种联盟确有可能。Grameen Shakti 是孟加拉国不通过电网供电的主要私有(但非营利)部门行为体之一，已经安装了 100 多万个家用太阳能系统。它使用国际金融公司和孟加拉国政府提供的资金向购买者提供条件宽松的小额贷款(Pachauri 和其他人，2012 年)。印度广泛的雨水收集网络是 Tarun Bharat Sangh 和 Gravis 等团体首创的系统，在进行了数百次成功的示范之后，这个网络现在在政府支持下并有时在政府的主持下将扩大范围(印度水资源部，2012 年)。社区推动的全面卫生运动是一个不提供津贴建造和使用厕所的参与性办法，它在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的支持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迅速扩展(例如，Rukuni，2010 年)。炉灶项目与妇女团体、社区团体、社会企业和营利炉灶制造商正在与非洲、中美洲和南亚及东南亚数百万顾客合作。这些例子证明，变革性联盟能够和确实存在，并且国家-企业-社会结盟的新形式能够促进两性平等的可持续发展。

317. 尽管许多国家作出的努力都有缺陷，但历史事实证明，需要国家与其人民订立契约并至少兑现部分契约。这等同于一直被称为的“发展的国家”，其中国家与其他社会行为体协调一致，最终对所有妇女和男子负责(Evans，1995 年)。它符合要求国家实现它们对人权的承诺，其中包括性别平等和享有适当的生活标准。可持续和扩大能力的大规模发展需要一个积极和负责的国家。

E. 为投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

318. 在可持续用水、卫生和能源服务为有利穷人的两性平等的投资提供资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对人均国内总产值低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为这种投资大规模提供资金的困难必须得到确认，并且与保健、国防、教育、债务偿付和农业等其他部门相互争取预算的问题也必须加以面对。对最低阶层穷人的投资提供资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下清单的内容并不巨细无遗地包罗所有资金来源，但可作为显示在用水、卫生和能源服务方面提供资金的传统和非传统来源的清单，并能有益地用于和导向可持续性和性别平等。

(a) 中央政府的本国资源调动(例如，征收收入的累进税，包括征收企业部门的累进税)是任何有利穷人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新社会契约的核心；

(b) 地方政府和市政府提供的资金；

(c) 基础设施的公共筹资, 对此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和监测以及它的提供和供应都已承包出去或通过市场力量提供;

(d) 国际发展贷款脱离侧重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e) 债券和证券筹资(此种筹资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日益普遍, 使资金能在本国或国际筹集);

(f) 社区推动的发展筹资或社会资金(扩大的程度可能有限);

(g) 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 0.7% 用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在这个 0.7% 的供资中划定专款用于用水和卫生等优先部门);

(h) 通过对全球金融交易征税的方式调动资源;

(i) 减少许多现有的但时常是合法的避税途径;

(j) 在 20 国集团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取消矿物燃料津贴;

(k) 重新安排军事预算;

(l) 减少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 这种补贴如第四章指出的那样, 使贫穷国家的农人难以与之竞争;

(m) 依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义务, 通过绿色气候基金提供部分气候融资;

(n) 其他小型但可能具有关键作用的融资类别, 例如包括联合国关于降低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的合作方案和相关进程(降排和降排+)的适应和减缓融资、绿色小额融资和未来可能征收的碳税(应该铭记这些工具尽管重要但并不完美, 可能并不比传统政府融资更有利于穷人或促进性别平等)。

319. 多个行为者在执行和监测这种融资机制方面能发挥作用, 这些行为者包括各国政府、多边贷款者、区域发展银行、联合国实体、传统发展援助机构和私有部门。随着公私伙伴关系的增长以及私有部门加强参与其中, 需要有强有力的问责框架来确保人权标准得到遵守, 特别是公共资金时常用于吸引(或“加码”)私有投资之时。应该重点强调赠款的作用相较于贷款对社区内的用水、卫生和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对更广泛的适应措施的作用。提供贷款需要贫穷国家以及可能贫穷的社区偿还贷款。当这种还款导致社会部门缩小开支时, 妇女可能就需从事更多无酬工作。本章内列出的准则指出, 这种融资不适合推动可持续发展。

320. 总括而言, 要使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接受的人权规范, 性别平等必需成为任何选取的途径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变革性发展的投资应考虑将扩大妇女的能力作为必需达成的目标, 尤其是扩大最低阶层群体妇女的能力。这意味着全球或区域可持续发展必需转向到贫穷妇女能从中成为主要受益者的关键部门。在这种背

景下，用水、卫生、炉灶和电力已被认定是能够对促进男女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投资的优先领域。其中每一个部门都能对妇女和女童而尤其是对贫困家庭的妇女和女童的健康和尊严产生变革性的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投资的设计不能不分性别，而需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要，包括她们能够在其中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321. 事实上，对四个选出的领域的投资是对健康和机会的决定性因素的投资。选取务实、特定和相关的指标是关键所在，例如减少无酬照护工作，以便评估这些具体投资对妇女和女童的能力产生的影响。也可选取其他评估计量准则，例如水质或碳排放或有利穷人收入增长的数值，或与具体社会投资有关的类似衡量标准。不过，这种投资办法的确有异于为穷人对用水、卫生和能源的碳为最重要问题的投资办法，而没有对可持续发展的其他层面给予适当考虑。

322. 应该认识到，大规模的有效投资至为困难和不确定性高，并取决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对背景情况敏感的设计及融资(Schalatek, 2012年)。此外，这种投资需要决策人员、捐助者、国家和私有部门及民间社会结合成变革性联盟。大规模的投资(不论是否可以持续)需要国家提供接触和组织力量；并且国家需要具备动员力量和时刻关注集体行动及社会动向，以确保国家兑现它的承诺。可持续发展可由非政府组织、捐助者和私有部门来启动、示范和鼓励，但归根结底不能由它们来领导。作出基本但变革性的投资远不只是采用创新技术和使创新融资可以持续。此外，这些决定也必需得到妇女和女童的能动力和领导力的支撑，因为它们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中对妇女和女童的生活、生计和社区都极其重要。

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323. 这份《世界概览》审查了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性之间的重要联系。这份概览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版，而此刻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发展和增长的主要模式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都不可持续，并正在拟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纲领。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自其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的规定成立以来，一直都致力于拟定一份有关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案。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核心部分的巨大重要性一直是开放工作组讨论中极具重要意义和重复提出的主题。

324. 目前有关增长、就业、粮食、人口、用水和卫生以及能源的趋势显示出不可持续的发展和性别不平等是如何地相互推波助澜。经济增长的模式使性别不平等持续存在，迫使妇女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和依赖妇女承担无酬照护工作，而同时还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将粮食政策的重点集中在总体生产上，这不仅忽略了气候变化构成的严峻挑战，也忽略了人人获得粮食和享有食物权的问题，以及地方和全球粮食市场受到性别影响的复杂动态关系、家庭内的食物分配情况和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生产体系。狭隘地注重人口的政策可能

会动用胁迫性措施来减少生育，这对妇女享有人权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占有主导地位的人口模式转移了对消费和生产格局的注意，而它们在退化的环境中，比人口更具有重要的作用。无法普及环境可持续的和良好质量的用水、卫生和能源对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能力造成严重后果。

325. 性别关系中的权力不均状况——在行使权利、获得和控制资源、参与决策方面——持续严重阻碍了妇女全面和平等地促进和享有可持续发展的惠益。期待着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拟定，为实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努力应建立在人权之上，并应得到后世后代平等和正义原则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是确保当前和未来人类福祉和尊严、生态完整性、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326. 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所有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框架都必需包括对性别平等和实现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能力作出明确承诺。这需要纠正性别不平等、歧视和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状况并解决它们与其他各种不平等的交叉作用。妇女的集体行动和全面及平等参与与政策制定和监测有关的决策的所有方面必须得到支持并成为取得成果的核心。

327. 合并解决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问题是运用这两个目标之间协同增效作用的关键。性别平等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催化作用。承认妇女的知识、能力和集体行动会促使改善资源的生产力和效率；增进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和建立更可持续的低碳和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能源、用水和卫生及保健系统。妇女已经是并必须继续成为促进可持续性和绿色变革的主力。不过，利用妇女的知识和时间但不承认妇女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和惠益的作法能进一步加强性别的陈规定性观念和加深性别的不平等。

328. 实现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关切及目标方面取得一致。在谈判和取得一致方面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和折中取舍。有些途径推动了环境可持续性，但没有充分考虑到性别平等，而另一些途径促进了性别平等，但忽略了可持续性的关键部分。任何发展途径要有可持续性，它就必须增进妇女的能力、尊重和保护她们的权利并减少和重新分配无酬照护工作。

329. 就政策难题进行谈判，以便达成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这需要采用包容性的学习以及审议进程和方法，以监测排斥、取舍和未预期到的机会。在这些进程中，妇女、民间社会和妇女组织、社区及所有关心的个人积极参与、发挥领导力和创造力是关键所在。

330. 国家和所有人都需要重新订立社会契约，使国家落实它们作为责任承担者的义务和权利拥有者诉求和享有其权利。国家在兑现对性别平等的承诺、设定使用资源的标准和规则以及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和投资方面都具有中心作用。必须进行公共投资，以便扩大促进两性平等的各种公共商品的关键创新，例

如提供水的供应、适当的卫生设施和现代能源服务。推动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私有部门和民间社会行为体之间的联盟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尤其应该寻求和听取来自边缘群体的呼声和运动并对其采取行动，这些呼声和运动对基于性别平等和人权的变革和更可持续的未来提出了有力的他种替代办法。

331. 这份《世界概览》提出了三项准则，评估可持续发展是否符合性别平等和妇女人权：第一，遵守人权标准和实现妇女能力；第二，注意妇女和女童的无酬照护工作，特别是穷困和处于边缘化的家庭和社区的妇女和女童承担的无酬照护工作；和第三，妇女和女童全面及平等地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

332. 为使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努力满足这些准则，会员国应充分落实《北京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所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能力的承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缔约国应全面落实它们根据这项公约承担的义务。

333.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人权机制、私有部门、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不妨采取以下行动：

(a) 关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性别平等：

- (一) 根据性别平等、不歧视和人权的国际规范和标准，制定和落实可持续发展中有关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政策；
- (二) 推动过渡到可持续的低碳和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同时确保性别平等；
- (三) 确保妇女有权享有适当的生活标准，其办法是增加提供体面工作和提供男女平等、普遍提供和高质量的服务、社会保护措施和基础设施，包括教育、保健、用水和卫生及能源；
- (四) 促进国家和人民之间重新订立社会契约，确保提供资金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其中人人享有公共商品和服务及共用资源，特别是将此提供给妇女和女童的最穷困群体；
- (五) 认识到和减少无酬照护工作以及重新分配家庭中男女分担这种工作和通过扩大人人能够享有的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重新分配家庭和国家承担这方面的工作；
- (六) 尊重、保护和促进在整个生命周期人人而特别是妇女和女童享有性和生殖保健及权利；

- (七) 通过国家监督和多利益攸关方监管，保护公共财产并防止公私利益团体挪用和剥削自然资源；
- (八) 确保妇女和女童作为行为者、领导人和决策者全面及平等参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倡议；
- (b) 绿色经济、性别平等和照护工作：
- (九) 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在于创造体面工作和可持续生计并减少基于性别、年龄、收入、地理位置和其他与具体情况有关的不平等；
- (十) 优先制定以产生体面工作为目标的注重两性平等的政策，其中侧重于劳动力市场的隔离、两性工资的差距和家庭内以及家庭和国家间无酬照护工作的不公平分布；
- (十一) 确保绿色增长战略顾及两性平等和在社会、经济及环境上可持续；
- (十二) 确保绿色增长政策能使妇女而特别是贫穷和边缘化的妇女更加容易在可持续和低碳产业中得到优质工作；
- (十三) 对妇女的技能发展和教育作出投资，使她们易于获得绿色工作，包括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增加妇女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教育、就业和领导力；
- (十四) 将服务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包括有酬照护工作，通过符合体面工作的标准的具体政策和规则，转变为可持续生计和体面就业的来源；
- (十五) 通过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及制定和落实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政策以保证家庭工作的体面工资和条件的方式，促进和保护家政工人的权利；
- (c) 粮食安全：
- (十六) 在公平贸易规则、监管商品市场和大规模土地投资包括为生物燃料的土地投资等领域，为支持粮食安全和男女小农制定和推动全球标准和规范；
- (十七) 设计和执行促进男女平等和基于人权的全面政策，以确保人人能够公平和可持续地获得适当、安全、负担得起和营养的食物，并通过自行生产、工资交换和社会转让的方式，解决个人和家庭在获得食物方面面临的具体制约；
- (十八) 通过公共粮食储备、食物津贴和/或学校餐饮方案提供高质量食物来保证粮食安全，以减轻对食物无保障的家庭的压力以及减少家庭中食物分配上的性别偏见；

(十九) 致力于消除歧视性态度和行为，特别是通过具体和长期措施，消除对妇女和女童拥有的食物权和家中食物分配的这种态度和行为；

(二十) 利用农人而特别是女性小农的知识，以及促进交流作物和土地管理的知识和良好做法，增加农业和粮食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减轻和适应气候和环境的压力；

(二十一) 向女性小农提供价格补贴和优先向其进行政府采购，解决女性小农面对的体制性制约，例如排除在法律、政策和作法上有关获得土地、共同财产资源、信贷、投入、机械和牲畜、金融和推广服务方面的性别歧视，并特别注意处于边缘化的女性群体；

(二十二) 通过保证向每一个人提供体面的就业条件及防止对妇女进行歧视的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和就业政策，促进体面工作和农业及非正规工人适当工资；

(d) 人口：

(二十三) 将可持续的人口政策建立在性和生殖保健和权利之上，包括在整个生命周期提供优质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信息和教育，其中包括提供安全和有效的现代避孕方法、孕产妇保健、全面性教育和安全堕胎；

(二十四) 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都有可用的、可得的、可接受的和适当质量的保健服务；

(二十五) 设计和落实人口政策，以解决与妇女生育有关的所有措施，包括增加得到优质教育和获得体面工作的措施；

(二十六) 确保妇女参与关于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的所有级别的决策和发出声音；

(e) 加快实现性别平等的投资：

(二十七) 利用促进男女平等的成本和效益及它们对实现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和能力的风险评估在服务 and 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并特别注意到最穷困的群体；

(二十八) 确定投资的优先次序，以确保人人有水，并特别注意到距离、水质、能否负担得起和妇女用水方式，以期减少无酬照护工作；

(二十九) 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得到符合具体性别需要例如经期卫生的干净、私用和安全的卫生设施，和解决在使用卫生设施时的暴力风险；

(三十) 大规模投资高效的固体燃料炉灶或使用干净燃料的烹煮技术，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外围地区，并鼓励在推广炉灶方面让妇女参与炉灶设计、使用和社会销售；

(三十一) 向没有电力服务和/或服务不足的群体特别是农村群体提供基本和负担得起的电力的重要举措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期保健设施能够运作；支持创收和提供教育；和减少妇女的无酬照护工作，使她们能享受休闲时间；

(三十二) 确保妇女充分及平等参与和领导所有级别的决策进程，以决定在家庭、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级别对用水、卫生和能源技术的投资和使用；

(三十三) 发展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公共-私有-民间社会联盟，以保证人人享有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并同时确保遵守人权标准；

(f) 融资措施：

(三十四) 通过以下途径增加用于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的财政资源：发达国家兑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0.7% 用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对金融交易征收税金；减少目前的避税途径；20 国集团成员国和新工业化国家取消矿物燃料补贴；和减少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和出口；

(三十五) 通过对收入和企业盈利征收累进税、解决避税办法和非法金融流动以及转移军事预算的方法，为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调动本国资源；

(三十六)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绿色、有利穷人和促进男女平等的投资提供资金创造有利环境；

(g) 数据和统计数据：

(三十七) 通过金融和技术支助及能力建设，改善有系统地收集、传播和分析性别统计数据以及按性别及年龄分列妇女参与家庭决策、妇女在粮食生产和管理的作用、妇女获得土地和其他资源以及用时和无酬照护工作的数据和信息；

(三十八) 确保收集、分析和使用在个人和家庭层面关于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包括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关于对气候变化的复原能力及适应能力的准确和完整数据；

(三十九) 定期收集和散发统计数据并对统计委员会同意的一组起码性别指标提出报告；

(四十) 制定国际标准和/或方法，以改善关于无酬照护工作、妇女参与所有级别的决策以及妇女对资产和生产资源的拥有和控制的数据。

参考材料

Abe, A. (2010).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care diamond: the case of child and elderly care in Japa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Paper, No. 9. 日内瓦: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Adams, V., M. Murphy and A. E. Clarke (2009). Anticipation: technoscience, life, affect, temporality. *Subjectivity*, vol. 28, No. 1, pp. 246-265.

Adams, W.M. (2004). *Against Extinction: The Story of Conservation*. London: Earthscan.

Agarwal, B. (2014). Food sovereignty, food security and democratic choice: critical contradictions, difficult conciliation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网上出版).

(2012). Food security, productivity, and gender inequality. IEG Working Paper, No. 320. New Delhi: Institute of Economic Growth.

(2010). *Gender and Green Governa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Presence Within and Beyond Community Fores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Gender inequality, coop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FI working paper. Santa Fe, New Mexico: Santa Fe Institute.

(1997). Environmental action, gender equity and women's particip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28, No. 1, pp. 1-44.

(1992). The gender and environment debate: lessons from India. *Feminist Studies*, vol. 18, No. 1, pp. 119-158.

Anand, S., and A. Sen (2000). 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12, pp. 2029-2049.

Anenberg, S. C., and others (2013). Cleaner cooking solutions to achieve health, climate and economic cobenefit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47, No. 9, pp. 3944-3952.

Antonopoulos, R., and I. Hirway, eds. (2010). *Unpaid Work and the Economy: Gender, Time Use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rza, C. (2014).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pension systems. 为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编制的背景文件, 纽约。

Bailis, R., and others (2009). Arresting the killer in the kitchen: the promises and pitfalls of commercializing improved cookstov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7, No. 10, pp. 1694-1705.

Bain, C. (2010). Structuring the flexible and feminized labor market: GlobalGAP standards for agricultural labor in Chil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5, No. 2, pp. 343-370.

Barrientos, S., and B. Evers (2014). Gendered production networks: push and pull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n *New Frontiers i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S. M. Rai and G. Waylen, eds. New York: Routledge.

- Baum, R., J. Luh and J. Bartram (2013). Sanitation: a global estimate of sewerage connections without treatment and the resulting impact on MDG progres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47, No. 4, pp. 1994-2000.
- Bazilian, M., and others (2012). Energy access scenarios to 2030 for the power sector in sub-Saharan Africa. *Utilities Policy*, vol. 20, No. 1, pp. 1-16.
- Bazilian, M., and others (2011). Interactions between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a focu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Energy Policy*, vol. 39, No. 6, pp. 3750-3756.
- Benería, L., and M. Roldán (1987). *The Crossroads of Class and Gender: Industrial Homework, Subcontracting, and Household Dynamics in Mexico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rnanke, B. S. (2011). Global imbalances: links to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Statement to the Banque de France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Launch Event. Paris, 18 February.
- Black, M., and G. Fawcett (2008). *The Last Taboo: Opening the Door on the Global Sanitation Crisis*. London: Earthscan.
- Blecker, R. (2012).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U.S. trade deficit. In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B. Cynamon, S. Fazzari and M. Setterfield,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ecker, R. A., and S. Seguino (2002).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ducing gender wage inequality in an export-oriented, semi-industrialized economy.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 No. 1, pp. 103-119.
- Blumberg, R. (1991). Income under female versus male control: hypotheses from a theory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data from the third world. In *Gender, Family and Economy: The Triple Overlap*, R. Blumberg, ed.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Sage.
- Bond, T. C., and others (2013). Bounding the role of black carbon in the climate system: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vol. 118, No. 11, pp. 5380-5552.
- Borras, S. M., Jr. (2004). La vía campesina: an evolving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TNI Briefing Series, No. 2004/6. Amsterdam: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 Borras, S.M., Jr., and others (2011).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land grabbing: an editorial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8, No. 2, pp. 209-216.
- Boyce, J. K. (2011). The environment as our common heritage. Acceptance speech for the Fair Sharing of the Common Heritage Award of the Media Freedom Foundation and Project Censored. 8 February.
- Boyce, J. K., S. Narain and E. A. Stanton, eds. (2007). *Reclaiming Nature: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ondon: Anthem Press.
- Boyce, J. K., and M. Riddle (2007). Cap and dividend: how to curb global warming while protecting the incomes of American families. Working Paper, No. 150. Amherst, Massachusetts: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 Braunstein, E. (2013).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gender inequality as cause and consequence. 为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编制的背景文件，纽约。
- Braunstein, E., I. van Staveren and D. Tavani (2011). Embedding care and unpaid work in macroeconomic modeling: a structuralist approach.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7, No. 4, pp. 5-31.
- Braunstein, E., and J. Heintz (2008). Gender bias and central bank policy: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redu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vol. 22, No. 2, pp. 173–186.
- Braunstein, E., and M. Brenner (200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endered wages in urba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3, Nos. 3-4, pp. 213–237.
- Buckingham-Hatfield, S. (2002). Gender equality: a prerequisi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eography*, vol. 87, No. 3, pp. 227-233.
- Budig, M., and J. Misra (2010). How care-work employment shapes earning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49, No. 4, pp. 441-460.
- Budlender, D. (2010). What do time use studies tell us about unpaid care work? Evidence from seven countries. In *Time Use Studies and Unpaid Care Work*, D. Budlender, ed. New York: Routledge.
- Cabraal, R.A., D.F. Barnes and S. G. Agarwal (2005). Productive uses of energy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vol. 30, pp. 117-144.
- Carson, R. (1962).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ecelski, E. (1984). *The Rural Energy Crisis, Women's Work and Family Welfare: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to Action*.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EP 10/WP.35. 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Cela, B., I. Dankelman, and J. Stern, eds. (2013). *Powerful Synergies: Gender E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Chai, J., I. Ortiz and X. Sire (2010). Protecting salaries of frontline teachers and health workers. Working Bri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Chan, C.K-C., and M. Ching Lam (2012). The reality and challenges of green jobs in China: an explo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bour Research*, vol. 4, No. 2, pp. 189-207.
- Chattopadhyay, R., and E. Duflo (2004). Women as policy mak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Econometrica*, vol. 72, No. 5, pp. 1409-1443.
- Chen, M., and others (2005). *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 2005: Women, Work and Poverty*. 纽约：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 Coleman-Jensen, A., M. Nord and A. Singh (2013).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2*.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No. 155.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onnelly, M. (2008). *Fatal Misconception: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 (2012). 性别平等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决定案文汇编。

Corbera, E., and H. Schroeder (2010). Governing and implementing REDD+.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vol. 14, No. 2, pp. 89-99.

Corbera, E., and K. Brown (2008). Building institutions to trade ecosystem services: marketing forest carbon in Mexico.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No. 10, pp. 1956-1979.

Cripps, F., A. Izurieta and A. Singh (2011). Global imbalances, under-consumption and over-borrowing: the stat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future polici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2, No. 1, pp. 228-261.

Crola, J. D. (2011). Preparing for thin cows: why the G20 should keep buffer stocks on the agenda. Oxfam Briefing Note. Oxford: Oxfam International.

Dankelman, I., and J. Davidson (1988).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London: Earthscan.

De Benoist, B., and others, eds. (2008). 《1993-2005 年全世界贫血流行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贫血数据库》,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

De Schutter, O. (2011).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post-global food crisis agenda: putting food security first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活动报告。11月。

Deere, C., and others (2013). Women's land own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decision-making: evidence from Ecuador, Ghana and Karnataka, India. Research Brief Series, No. 2. Bangalore: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ininger, K., and D. Byerlee (2011). *Rising Global Interest in Farmland: Can It Yield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Benefits?*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Demeke, M., and others (2012). Stabilizing price incentives for staple grain producers in the context of broader agricultural policies: debates and country experiences. ESA Working Paper, No. 12-05. 罗马: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Doss, C. (2011). If 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how much of the world's food do they produce? ESA Working Paper No. 11-04. 罗马: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Doss, C., and others (2011). The gender asset and wealth gaps: evidence from Ecuador, Ghana, and Karnataka, India. Bangalore: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oyle, T. (2005).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Minority and Majority Worlds: 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Doyle, T., and S. Chaturvedi (2011). Climate refugees and security: conceptualizations, categories and contestation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J. Dryzek, R. Norgaard and D. Schlosberg,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essler, W., and others (2010). From hope to crisis and back?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global CBNRM narrativ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vol. 37, No. 1, pp. 5-15.
- Dr èze, J., and A. Sen (1991).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yzek, J. S. (1997).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yson, T. (201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London: Zed Books.
- Elson, D. (1996). Gender-aware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6th ed., K. P. Jameson and C. K. Wilber, eds. New York: McGraw-Hill.
- (1998). The economic, the political and the domestic: businesses, States, and households in the 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2, pp. 189-208.
- (2002). Gender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Gender Justice, Development, and Rights*, M. Molyneux and S. Razavi,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1). Economics for a post-crisis world: putting social justice first. In *Harvesting Feminist Knowledge for Public Policy*, D. Jain and D. Elson, ed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 (2014). Redressing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women's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and economic policy. 为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编制的背景文件：2015年世界妇女进展报告，纽约。
- England, P., M. Budig and N. Folbre (2002). Wages of virtue: the relative pay of care work. *Social Problems*, vol. 49, No. 4, pp. 455-473.
- 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2).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in the EU of Area K of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Gender Equ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处。
- Evans, P.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airhead, J. (2001).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conflict over natural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 *Violent Environments*, N. L. Peluso and M. Watts, ed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airhead, J., and M. Leach (1996). *Misreading the African Landscape: Society and Ecology in a Forest-Savanna Mosa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irhead, J., M. Leach and I. Scoones (2012). Green grabbing: a new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9, No. 2, pp. 237-261.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6).《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对六个国家的个案研究》，粮农组织粮食和营养第84号文件，罗马。

- (2011). 《2010-2011 年粮食和农业状况: 务农妇女-缩小发展的性别差距》, 罗马。
- (2012).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罗马
- (2013c).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粮食安全的多个层面》, 罗马
- (2013b). 《2013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 粮食系统促进改善营养》, 罗马。
- (2013a). 粮食安全指标, 查阅 www.fao.org/economic/ess/ess-fs/ess-fadata/en/#.U4yStPldXy0. 2014 年 6 月 2 日查阅。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国际劳工局(2010). 《农业和农村就业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摆脱贫困的不同途径 - 现状、趋势和差距》, 罗马。
- Feng, W., Y. Cai and B. Gu (2013).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litics: how will history judge China's one-child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8, Suppl. 1, pp. 115-129.
- Fieldman,G.(2011).Neoliberalism, the production of vulnerability and the hobbled state: systemic barriers to climate adaptation.*Climate and Development*,vol.3,No.2, pp. 159-174.
- Fine, B. (2012). Financial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Global Crisis and Transformative Social Change*, P. Utting, S. Razavi and R. Varghese Buchholz, eds. Basingstoke,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 Fischer,A.M.(2014).The social value of employment and the redistributive imperative for development.Occasional Paper.纽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报告处。
- Fischer-Kowalski, M., and others (2011). *Decoupling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from Economic Growth: A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Decoupl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anel*.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Fisher, J. (2006). For her, it's the big issue: putting women at the centre of water supply, sanitation and hygiene. Evidence Report. Geneva: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Collaborative Council.
- Folbre, N. (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New York: Routledge.
- (2001). *The Invisible Heart: Economics and Family Values*. New York: New Press.
- (2006). Demanding quality: worker/consumer coalitions and "high road" strategies in the care sector.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4, No. 1, pp. 11-33.
- Folke,C.,and others(2011).Reconnecting to the Biosphere.*Ambio*,vol.40,No.7,pp.719-738.
- Fukuda-Parr, S., J. Heintz and S. Seguino (2013).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heterodox macroeconomics meets feminist economics.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9, No. 3, pp. 4-31.
- Fullerton, D., N. Bruce and S. B. Gordon (2008). Indoor air pollution from biomass fuel smoke is a major health concer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vol. 102, No. 9, pp. 843-851.

- Galbraith, J. K. (2012).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A Study of the World Economy Just Before the Great Cri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reffi, G. (2014).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1, pp. 9-37.
- Ghosh, J. (2011). Cash transfers as the silver bullet for poverty reduction: a sceptical no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6, No. 21, pp. 67-71.
- (2010). The unnatural coupling: food and global finance.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0, No. 1, pp. 72-86.
- Gillespie, S., J. Harris and S. Kadiyala (2012). The agriculture-nutrition disconnect in India: what do we know? IFPRI Discussion Paper 1187.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Global Alliance for Clean Cookstoves (2013). *Scaling Adoption of Clean Cooking Solutions through Women's Empowerment: A Resource Guide*.
- Gough, I. (2011). *Climate Change, Double Injustice and Social Policy: A Case Study of the United Kingdom*. Occasional Paper No. 1. 日内瓦: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GRAIN (2008). Seized: the 2008 landgrab for food and financial security. GRAIN Briefing. Barcelona.
- Greenhalgh, S. (2005). Glob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governance in China. In *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Aihwa Ong and Stephen J. Collier, eds.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ing.
- Grown, C., D. Elson and N. Cagatay (2000). Introduction. Special issue: growth, trade, finance, and gender inequality.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7, pp. 1145-1156.
- Guerrero, N. M., and A. Stock (2012). Green econom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Policy paper.
- Guruswamy, L. (2011). Energy poverty.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vol. 36, pp. 139-161.
- Haddad, L. J., J. Hoddinott and H. Alderman, eds. (1997).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dels, Methods, and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ammouya, M. (1999). *Statistics on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Methodology, Structures and Trends*. Working Paper SAP 2.85/WP.144. 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 Hammerton, S., ed. (2013). *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ers: Toward the ratification of ILO Convention 189 in Kenya, Namibia, Zambia and Zimbabwe*. Brussels: Solidar 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s.
- Harcourt, W., ed. (2012). *Women Reclaim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Spaces Lost, Spaces Gained*. Basingstoke,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pp. 1243-1248.
- Harris, D., M. Kooy and L. Jones (2011). *Analysing the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Service Delivery*. Working Paper 334.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 Harriss, B. (1995). The intrafamily distribution of hunger in South Asia.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Selected Essays*, J. Drèze, A. Sen and A. Hussain, e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rriss-White, B., and N. Gooptu (2001). Mapping India's world of unorganized labour. *Socialist Register*, vol. 37.
- Hartmann, B. (1995).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Wrong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Population Control*.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_____ (2010). Rethinking the role of population in human security.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Security*, R. A. Matthew and others, ed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Heintz, J. (2006). Low-wage manufacturing and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 model in the unequal exchange tradi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0, No. 4, pp. 507-520.
- Hernández Castillo, R. A. (2002). National law and indigenous customary law: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of indigenous women in Chiapas, Mexico. In *Gender Justice, Development, and Rights*, M. Molyneux and S. Razavi,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ren, H., and others (2012). *Green Jobs for a Revitalized Food and Agriculture Sector*. 罗马: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Hesketh, T., L. Lu and Z. Wei Xing (2005). The effect of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after 25 year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353, No. 11, pp. 1171-1176.
- Hickling, S., and J. Bevan (2010). Scaling up CLTS in sub-Saharan Africa. *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Action*, vol. 61, pp. 51-62.
- Hildyard, N. (2010). "Scarcity" as political strategy: reflections on three hanging children. In *The Limits to Scarcity: Contesting the Politics of Allocation*, L. Mehta, ed. London: Earthscan.
- High-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2011). *Price Volatility and Food Security: A Report by the High 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Rome.
- _____ (2012). *Food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A Report by the High 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Rome.
- Hoang, D., and B. Jones (2012). Why do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fail? Women workers and clothing supply chains in Vietnam.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 12, No. 1, pp. 67-85.

Hoddinott, J. (1999). Operationalizing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development projects: an introduction. Technical Guide No. 1.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Hodgson, D. (1983). Demography as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scienc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9, No. 1, pp. 1-34.

Hossain, N., R. King and A. Kelbert (2013). *Squeezed: Life in a Time of Food Price Volatility, Year 1 Results*. Oxfor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Oxfam International.

House, S., T. Mahon and S. Cavill (2012). *Menstrual Hygiene Matters: A Resource for Improving Menstrual Hygiene Around the World*. WaterAid.

(此处请按照英文版提示插入内容)

Hutton, G., L. Haller and J. Bartram (2007). Global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Water and Health*, vol. 5, No. 4, pp. 481-502.

印度，水资源部 (2012). National Water Policy 201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3).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T. F. Stocker and other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2).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2*. Paris.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3). Global Hunger Index database. 查阅 www.ifpri.org/book-8018/node/8058. 2014年6月2日查阅。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2008). *World of Work Report 2008: Income Inequalities in the Age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ur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9). Green jobs and women workers: employment, equity, equality—draft report.

国际劳工组织(2007). 《女工权利和性别平等简介》，第二版，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2012).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在绿色经济中体面工作的机会和社会包容性》，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2013). 《全世界家政工人: 全球和区域统计数字和法律保障的程度》，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2014). 《2014/2015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 建立经济复原力、包容性发展和社会正义》，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2013). 《2013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 改变中的全球环境》，巴黎: 经合组织出版处和教科文组织出版处。

Jackson, T. (2011).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London: Earthscan.

- Jackson, C. (1993).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Women and environment in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1, No. 12, pp. 1947-1963.
- Jacobs, M. (2013). Green growth. In *The Handbook of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 Falkner, ed. Oxford: Wiley-Blackwell.
- Jacobs, S. (2010). *Gender and Agrarian Reforms*. London: Routledge.
- Jacobson, A. (2007). Connective power: solar electrif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Keny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5, No. 1, pp. 144-162.
- Johnsson-Latham, G. (2007). *A Study on Gender Equality as a Prerequisi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斯德哥尔摩: 环境部, 环境咨询委员会。
- Kabeer, N. (2005). Gender in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1. *Gender and Development*, vol. 13, No. 1, pp. 13-24.
- (2007). Marriage, motherhood and masculin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reconfigurations of personal and economic life. IDS Working Paper, No. 290.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Kabeer, N., and L. Natali (2013). Gender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s there a win-win? IDS Working Paper, No. 417.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Kar, K., and R. Chambers (2008). *Handbook on Community-Led Total Sanitation*. London: Plan UK;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Khan, A. (2014). Paid work as a pathway of empowerment: Pakistan's Lady Health Worker Programme. In *Feminisms, Empowerment and Development: Changing Women's Lives*, A. Cornwall and J. Edwards, eds. London: Zed Books.
- King Dejaridin, A. (2009). Gender (In)equality,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 92. 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 Lam, N. L., and others (2012). Household light makes global heat: high black carbon emissions from kerosene wick lamp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46, No. 24, pp. 13531-13538.
- Leach, M. (1992). Gender and the environment: traps and opportunitie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2, No. 1, pp. 12-22.
- Leach, M., R. Mearns and I. Scoones (1999). Environmental entitlements: dynamics and institutions in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2, pp. 225-247.
- Lee, C. M., and others (2013). Assessing the climate impacts of cookstove projects: issues in emissions accounting. Working Paper No. 2013-01.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 Lee, Ching Kwan (2005). *Livelihood Struggles and Market Reform: (Un)making Chinese Labour after State Socialism*. Occasional Paper No. 2. 日内瓦: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Levien, M. (2014). Gender and land dispossession: a comparative survey. 为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编制的背景文件, 纽约。
- _____ (2012). The land questio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spossession in Indi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9, Nos. 3-4, pp. 933-969.
- Li, T. M. (2011). Centering labor in the land grab debat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8, No. 2, pp. 281-298.
- Longhurst, R. (1988). Cash crops,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DS Bulletin*, vol. 19, No. 2, pp. 28-36.
- Lund, F. (2010). Hierarchies of care work in South Africa: nurses, social workers, and home-based care worker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49, No. 4, pp. 495-510.
- Mart ínez-Alier, J. (2002).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A Study of Ecological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May, A., and G. Summerfield (2012). Creating a space where gender matters: Elinor Ostrom (1933-2012) talks with Ann Mari May and Gale Summerfield.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8, No. 4, pp. 25-37.
- McAfee, K. (2012). The contradictory logic of global ecosystem services market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3, No. 1, pp. 105-131.
- McMahon, S., and others (2011). "The girl with her period is the one to hang her head": reflections on menstrual management among schoolgirls in rural Kenya. *BMC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vol. 11.
- McMichael, P. (2009). Food sovereignty,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Peasants and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Economy,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A. H. Akram-Lodhi and C. Kay, eds. London: Routledge.
- Meadows, D., and others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 Mehta, L., and S. Movik, eds. (2011). *Shit Matters: The Potential of Community-led Total Sanitation*. Rugby, Warwickshire: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 Mehta, L., G. J. Veldwisch and J. Franco (2012). Water grabbing? Focus on the (re)appropriation of finite water resources. *Water Alternatives*, vol. 5, No. 2, pp. 193-207.
- Mellor, M. (2009). Eco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olitics of money. In *Eco-Sufficiency and Global Justice: Women Write Political Ecology*, A. Salleh, ed. London: Pluto Press.

- Miah, M. D., and others (2010). Rural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pattern in the disregarded villages of Bangladesh. *Energy Policy*, vol. 38, No. 2, pp. 997-1003.
-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ynthesi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Minns, R., and S. Sexton (2006). Too many grannies? Private pensions, corporate welfare and growing insecurity. The Corner House Briefing No. 35. Sturminster Newton, Dorset: The Corner House.
- Mkandawire, T. (2005). Targeting and universalism in poverty reduction. Soc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Paper, No. 23. 日内瓦: 社会发展研究所。
- Muro, M., and others (2011). *Sizing the clean economy. A national and regional green jobs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
- Murtaugh, P. A., and M. G. Schlax (2009). Reproduction and the carbon legacies of individual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19, No. 1, pp. 14-20.
- Myers, N., and J. Kent (1995). *Environmental Exodus: An Emergent Crisis in the Global Arena*. Washington, D.C.: Climate Institute.
- Natural Capital Committee (2013). The state of natural capital: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measurement and valuation.
- Nelson, G. C., and others (2009). *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Agriculture and Costs of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Nelson, K., and A. Murray (2008). Sanitation for unserved populations: technologies,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vol. 33, pp. 119-151.
- Neumayer, E., and T. Plümper (2007). The gendered nature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impact of catastrophic events on the gender gap in life expectancy, 1981-2002.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7, No. 3, pp. 551-566.
- Nussbaum, M. (2000).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dum, E. (1953). *The Fundamentals of Ecology*.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Closing the Gender Gap: Act Now*. 巴黎: 经合组织出版处。
- O'Neill, B. C., and others (2010). Global demographic trends and future carbon emis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07, No. 41, pp. 17521-17526.
- Oostendorp, R. H. (2009).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nder wage gap.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23, No. 1, pp. 141-161.

- Ortiz, I., and M. Cummins (2013). The age of austerity: a review of public expenditures and adjustment measures in 181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New York: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Geneva: South Centre.
- Ostrom, E. (2000).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 3, pp. 137-158.
- Otzelberger, A. (2011). Gender-responsive strategies on climate change: recent progress and ways forward for donors.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DGE.
- Pachauri, S., and others (2012). Energy access for development. In *Global Energy Assessment: Toward a Sustainable Future*, T. B. Johansson and other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xenburg, Austri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 Peng, I. (2012). The boss, the worker, his wife and no babies: South Korean 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y of care in a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rigidities. In *Global Variations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y of Care: Worlds Apart*, S. Razavi and S. Staab, eds. New York: Routledge.
- Pereira, M. G., and others (2011).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access to electric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 China, India and Brazil.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vol. 15, No. 3, pp. 1427-1441.
- Quisumbing, A., and others (2008). Helping women respond to the global food price crisis. IFPRI Policy Brief, No. 7,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Raupach, M. R., and others (2007). Global and regional drivers of accelerating CO₂ emis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04, No. 24, pp. 10288–10293.
- Raworth, K. (2012). A safe and just space for humanity: Can we live within the doughnut? Oxfam Discussion Paper. Oxford: Oxfam International.
- Ray, I. (2007). Women, water an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vol. 32, pp. 421-449.
- Razavi, S. (2007).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y of care in a social context: conceptual issues, research questions and policy options. Gender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Paper, No. 3. 日内瓦: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2009). Engender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chang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6, No. 1, pp. 197-227.
- Razavi, S., and others (2012). Gendered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employment and social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Brief, No.13. 日内瓦: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Razavi, S., and S. Staab (2010). Underpaid and overworked: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care worker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49, No. 4, pp. 407-422.

- Razavi, S., and S. Hassim, eds. (2006). *Gender and Social Policy in a Global Context: Uncovering the Gendered Structure of "the Social"*. Basingstoke,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 Rival, L. (201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Policy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Occasional Paper No. 7. 日内瓦: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Robertson, T. (2012). *The Malthusian Movement: Global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ocheleau M., D. (1988). Gender,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rural landscape: implications for agroforestry and farming systems research. In *Gender Issues in Farming Systems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 V. Poats, M. Schmink and A. Spring, ed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Rockström, J. W., and others (2009). Planetary boundaries: exploring the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Ecology and Society*, vol. 14, No. 2.
- Rodda, A. (1991).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Zed Books.
- Roe, E. M. (1995). Except-Africa: postscript to a special section on development narrativ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6, pp. 1065-1069.
- Rukuni, S. (2010). Challenging mindsets: CLTS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Zimbabwe. *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Action*, vol. 61, pp. 141-148.
- Saith, A. (2011). Inequality, imbalance, instability: reflections on a structural cri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2, No. 1, pp. 70-86.
- Saith, R., and B. Harriss-White (1999). The gender sensitivity of well-being indicator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0, No. 3, pp. 465-497.
- Samson, M., ed. (2009). *Refusing to Be Cast Aside: Waste Pickers Organising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 Satterthwaite, D. (2009). The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for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vol. 21, No. 2, pp. 545-567.
- Satterthwaite, D., D. Mitlin and S. Patel (2011). Engaging with the urban poor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for poverty reduction and urban governance. Issues paper. 纽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Say, L., and others (2014). Global causes of maternal death: a WHO systematic analysis.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vol. 2, no. 6, pp. e323–e333.
- Sayre, N. F. (2008). The genesis, history and limits of carrying capac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8, No. 1, pp. 120-134.

- Schalatek, L. (2013). The post-2015 framework: merging care and green economy approaches to finance gender-equitab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 Seguino, S. (2000).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7, pp. 1211-1230.
- _____. (2010). Gender, distribution,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e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2, No. 3, pp. 373-404.
- Seguino, S., and C. Grown (2006). Gender equity and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18, No. 8, pp. 1081-1104.
- Sen, A. (1982).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82, No. 4, pp. 169-221.
- (1990). More th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37, No. 20 (12月20日)。
-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 Sen, G., and A. Nayar (2013).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human rights: a paradigm in the making. In *Powerful Synergies: Gender E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B. Cela, I. Dankelman and J. Stern, eds. 纽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Sepúlveda, M., and C. Nyst (2012). *The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Social Protection*. 赫尔辛基: 芬兰外交部。
- Shah, S. P., and others (2013).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with new menstrual hygiene practices among adolescent tribal girls in rural Gujarat, India.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vol. 21, No. 41, pp. 205-213.
- Sidner, S. (2011). Solar panels power profit in Bangladesh. CNN.com, 12 April. 2014年1月25日查阅。见 <http://edition.cnn.com/2011/BUSINESS/04/11/bangladesh.solar.power.kalihati>.
- Sinton, J. E., and others (2004). An assessment of programs to promote improved household stoves in China.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8, No. 3, pp. 33-52.
- Skinner, E. (2011).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Overview Report*. BRIDGE Cutting Edge Pack Series.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Sovacool, B. K.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ergy poverty: a review of key challenges.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16, No. 3, pp. 272-282.
- Statistics South Africa (2013).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2012*. Pretoria.
- Stern, N. (2006). What is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World Economics*, vol. 7, No. 2.

Stiglitz, J. E.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Stirling, A. (1998). Risk at a turning point?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vol. 1, No. 2, pp. 97-109.

Stockhammer, E. (2013). *Why Have Wage Shares Fallen? A Pane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 No. 35, 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Strietska-Ilina, O., and others (2011). *Skills for Green Jobs: A Global View—Synthesis Report Based on 21 Country Studies*. 日内瓦: 国际劳工局。

Szreter, S. (1993). The idea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e study of fertility change: a critical intellectual hist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4, pp. 659-701.

Tiba, Z. (2011). Targeting the most vulnerable: implementing input subsidies. In *Safeguarding Food Security in Volatile Markets*, A. Prakash, ed. 罗马: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Tomlinson, I. (2013). Doubling food production to feed the 9 billio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a key discourse of food security in the UK.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29, pp. 81-90.

联合国 (1975), 世界粮食大会的报告, 罗马, 1974 年 11 月 5 日至 16 日, 出售品编号: E.75.II.A.3。

(1999). 《60 亿人的世界》, ESA/P/WP.154 号文件。

(2001). 《世界人口前景: 2000 年订正本》, 第一卷, 《全面图表》, 第二卷, 《性别和年龄》第三卷, 《分析报告》, 出售品编号: C.91.XIII.8、C.XIII.9 和 C.1.XIII.20。

(2002). 《堕胎政策: 全球审查》, 第一卷《阿富汗到法国》, 第二卷《加蓬到挪威》和第三卷《阿曼到津巴布韦》, 出售品编号: C.01.XIII.10、C.01.XIII.18 和 C.02.XIII.5。

(2009).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 妇女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获得财政资源, 包括小额供资》, 出售品编号: C.09.IV.7。

(2010). 《世界妇女: 趋势和统计》, 出售品编号: C.10.XVII.11。

(2013b). 《2013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不平等状况》, 出售品编号: C.13.IV.2。

(2013a). 《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出售品编号: C.13.I.9。

(2013d). 《2013 年世界人口老龄化》, 出售品编号: C.14.XIII.6。

(2013c). 《世界人口前景: 2012 年订正本 - 重要成果和进度表》, ESA/P/WP.227 号工作文件。

联合国, 国际减少灾害战略 (秘书处) (2009), 《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日内瓦。

-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 (2014). 《性别平等和全球经济危机》，研究报告，纽约。
-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与玛丽·罗宾逊气候正义基金会 (2013). *The full view: advancing the goal of gender balance in multilateral and intergovernmental processes*. New York and Dublin.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 《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性别和人类发展》，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联合国千年项目，饥饿问题工作组 (2005)，《饥饿减半：我们能做到》，London: Earthscan.
- (2006). 《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消除匮乏——电力、贫穷和全球用水危机》，Basingstoke,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 (2011). 《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可持续性平等：共享美好未来》，Basingstoke,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 (2013b). 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纽约。
- (2013a). 《被分割的人类：迎战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纽约。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09). 《全球绿色新政：政策简报》，内罗毕。
- (2011). 《迈向绿色经济：通往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道路 - 决策者的报告汇编》，内罗毕。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 (2008). 《绿色工作：在可持续和低碳的世界得到体面工作》，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0). 《2010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就业、全球化和发展》，出售品编号：C.10.II.D.3。
- (2013a). 2013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作出调整以适应世界经济不断变化动态》，出售品编号：C.13.II.D.3。
- (2013b). 《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出售品编号：C.13.II.D.5。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8). 《2009年世界儿童状况：产妇和新生儿保健》，出售品编号：C.09.XX.1。
- (2013). 《改善儿童营养：对全球进步必须采取的措施》，出售品编号：C.13.XX.4。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央财政研究所(2011). *Protecting the new harvest: an analysis of the cost of eradicating hunger in Guatemala 2012-2021*. Bulletin, No. 4. Guatemala.
-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2009)，《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评估报告》，日内瓦。
- Unmüßig, B. (2014). *On the value of nature: the merits and perils of a new economy of nature*. Berlin: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Unmüßig, B., W. Sachs, and T. Fatheuer (2012). *Critique of the Green Economy: Towar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quity*. Publication Series on Ecology, No. 22, Berlin: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2010). *Combat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Structural Change, Social Policy and Politics*. Sales No. E.10.III.Y.1.

(2012a). Inequalities and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Research and Policy Brief, No. 15. Geneva.

(2012b). Social dimensions of green economy. Research and Policy Brief, No. 12. Geneva.

Unterhalter, E. (2013). The MDGs, girls' educ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tructural and policy constraints in achiev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or women and girls. Mexico City: October.

Urdal, H. (2012). A clash of generations? Youth bulge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Expert Paper, No. 2012/1. 纽约: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人口司。

Vanek, J., and others (forthcoming). *Statistics on the Informal Economy: Definitions, Regional Estimates and Challenges*. WIEGO Working Paper (Statistics), No. 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Vaughan, G., ed. (2007). *Women and the Gift Economy: A Radically Different Worldview is Possible*. Toronto: Inanna Publications and Education.

Vizard, P., S. Fukuda-Parr and D. Elson (2011). Introduction: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vol. 12, No. 1, pp. 1-22.

Vogt, W. (1948). *Road to Survival*. New York: W. Sloane Associates.

Von Braun, J. (2014). Aiming for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in a changed global context: strategy to end hunger. In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Post-2015 Era*, J. A. Alonso, G. A. Cornia and R. Vos, eds. New York an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Von Grebmer, K., and others (2013). *2013 Global Hunger Index: The Challenge of Hunger—Building Resilience to Achieve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Bonn: Welthungerhilfe;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Dublin: Concern Worldwide.

White, J., and B. White (2012). Gendered experiences of dispossession: oil palm expansion in a Dayak Hibun community in West Kalimanta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9, Nos. 3-4, pp. 995-1016.

世界卫生组织 (2009). 《全球卫生风险: 死亡率和能归咎于某些主要风险的疾病负担》, 日内瓦。

(2012). 《联合国水机制全球卫生与饮用水年度评估: 2012 年报告: 扩大和持续提供服务的挑战》, 日内瓦。

- (2011). 《防止有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人权高专办、人口基金、儿基会、妇女署和世卫组织的机构间声明》，日内瓦。
-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6).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全球水和卫生设施的目标：当前十年城市和农村的挑战》，日内瓦和纽约。
- (2012). 《环境卫生和饮用水方面的进展：2012 年最新情况》，日内瓦和纽约。
- (2013). 《环境卫生和饮用水进展：2013 年最新情况》，日内瓦和纽约。
- (2014). 《环境卫生和饮用水进展：2014 年最新情况》，日内瓦和纽约。
- Wichterich, C. (2012). *The Future We Want: A Feminist Perspective*. Publication Series on Ecology, No. 21. Berlin: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 Wider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2012). WANTO: Women in Apprenticeship and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 Act. Fact Sheet. Washington, D.C.
- Williams, G. (1995). Modernizing Malthus: the World Bank, population control and the African environment. In *Power of Development*, J. Crush, ed. London: Routledge.
- Wiltshire, R. (1992).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grassroots' women's perspectives. Barbados: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 Women Organizing for Change i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others (2013). Scoping study of good practices for strengthening women's inclusion in forest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ectors: joint regional initiative for women's inclusion in REDD+.
- Women's Major Group (2013). *Gender Equality,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Prioriti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opos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 Wong, S. (2009).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y: re-linking poverty, gender, and governanc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vol. 17, No. 1, pp. 95-108.
- 世界银行 (2003). 《2004 年世界发展报告：为贫困人口提供的服务工作》，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1). 《性别和气候变化：三件你应该知道的事》，华盛顿特区。
- (2012).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和发展》，华盛顿特区。
- (2014). 《2014 年世界发展指标》，华盛顿特区。
-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2000). *Dams and Development: A New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The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London: Earthscan.
- Wright, B. D. (2012). International grain reserves and other instruments to address volatility in grain market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27, No. 2, pp. 222-260.
- Xing, Li (2009). Population control called key to deal. 《中国日报》，查阅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12/10/content_9151129.htm, 2014 年 6 月 22 日查阅。

Yamin, A. E., and V. M. Boulanger (2013). Embedd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in a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framework: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DG targets and indicators.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vol. 21, No. 42, pp. 74-85.

Zhang, J., and K. R. Smith (2007). Household air pollution from coal and biomass fuels in China: measurements, health impacts, and intervention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vol. 115 No. 6, pp. 848-855.

Zwarteveen, M. (1997). Water: from basic need to commodity: a discussion on gender and water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irrig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 No. 8, pp. 1335-1349.
